

Zhou  
Lü  
Qiang

周履鏘

---

文存





## 目录

### 往事

- 2 听彭述之讲课
- 7 意因同志
- 24 杂忆《冬至》

### 杂稿

- 34 浩气如虹 ——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 36 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的信》的断句
- 39 公理与强权 ——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
- 44 绿叶上的诗 ——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
- 50 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 57 《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60 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63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 年》跋

## 书简

- 78 与王凡西通信  
172 隔海书简

## 贺寿

- 212 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214 贺百岁

## 缅怀

- 218 与周仁生同志的情谊
- 226 缅怀李永爵同志
- 230 根叔 —— 纪念王凡西同志
- 239 缅怀王凡西同志 —— 谈王凡西同志二十多年前的建议
- 243 悼念赵青音大姐
- 248 悼父母
- 250 悼弟弟
- 254 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 记慧初病故前后
- 256 解连环 —— 悼亡
- 258 悼亡妻慧初
- 260 江城子 —— 悼亡

- 262 卅年祭
- 265 悼亡儿
- 270 自撰简要年谱



# 往事

· 听彭述之讲课

· 意因同志

· 杂忆《冬至》

## 听彭述之讲课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从此每周一次听彭述之讲课，延续了约一年左右。

陈人白先生，约五十多岁。那个年代，五十多岁的人都已经被视为老头了。陈先生讲一口很难听得懂的湖南话，他用烟斗吸烟，不吸时空烟斗也端在手上。参加哲学班的人员约五、六十人，大都是青年人。大家带一本英文书，对外称是英语补习班。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

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记得第一次去听课时，讲的是哲学。以后陆续听了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大革命史等课题。每门课都有参考书，哲学是伏尔弗逊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经济学用河上肇著的《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好像是用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学》。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听课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年代久远，许多情节都记不起来或记不确切了。我不知道在我去听课之前曾举行过多少次，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是讲唯心论与唯物论。彭述之认为，原始人类不能驾驭自然，了解自然，宗教迷信产生了，就以为人类最早的思维是唯心主义的。彭述之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人类有了思维，有了哲学的萌芽，唯心论与唯物论就同时产生的。他举希腊的初始唯物论为例。后来讲辩证法。我的哲学知识很少，之前仅读过壹本《大众哲学》，所以彭述之的讲述，对我都是新鲜的知识。我只是似懂非懂地灌到脑子里去。

讲社会发展史，指出人类社会可分成：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彭述之较详细地讲了原始共产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不能认为是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倒退，就社会的发展，就生产力的

发展，由较公平的原始共产社会进入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讲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其论述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讲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发展了，必然要转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彭述之的论述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完全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即将暴发，革命即将成功。这些论述已经过了五、六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论断已经八十多年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在发展，苏联及东欧自称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垮台了，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这些现实与当年的愿望大不相同，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当时受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和革命理想。

每月还举行一次座谈会，内容在《青年与妇女》上发表。选题每次不同，大都有关“青年”的问题。朋友们都争先发言，但我一次也没有发言，主要是我水平低，性格内向的关系。最后总是陈碧兰、彭述之作总结发言。

有一次听课的人比平时多，上午讲课提前结束，全体乘大客车到江湾叶家花园，举行联谊活动，名义是为李永爵、罗莉萍结婚开派对，实际是托派多数派战后大聚会，据说人气之旺是空前的。午餐很简单，是现买的热馒头加上带去的牛肉（美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牛肉罐头）。大家吃得很开心，三五成群，有说有笑。下午举行大会，几十年后还记得有一位越南托派同

志讲演，刘家良担任翻译。讲的内容完全忘记了，但刘家良的开场白始终还记得，刘说：“越南，中国人过去叫安南，越南人对‘安南’的称呼很反感。”原来，“安南”“镇南关”等都是侵略者镇压少数民族与邻近弱国的称号。彭述之作了长篇报告，可惜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也已成了耄耋老人。我是受了彭述之的教育，最后成为“顽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当年参加的人有些作古了，也有些改变了信念。

1948年夏天开始，育才中学的哲学班迁到海宁路大公小学，位于国际电影院旁边的弄内，那时小学生放暑假，借校址继续办班。不管叫哲学班或其他名称，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机构，类似于党校的性质。通过学习，原来已是托派的人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一般受影响的人成为托派党团员。我就是上了哲学班之后，于1947年夏天成为S.Y的。

海宁路大公小学的讲述内容与育才中学已有不同，偏重于建党文件的学习。就在这一年，托派多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

大公小学有一事值得一记，就是召开了一次托洛茨基被害纪念大会。到会的人比平时多，会场挂一张托洛茨基的素描画像，不知是那一位朋友的杰作。会上彭述之的女儿莉莉的诗朗诵很精彩。有一位广东老太太发表讲演，我虽听不懂，但老太激动的神态，振奋的言词很使人感动。纪念会开得很成功。

叶家花园的集会和大公小学的老托受害纪念会，是托派多数派战后两次较大型的集会，也是战后托派发展实力的检阅，显示了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

到了 1948 年下半年，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胜利已成定局。托派不得不作应变，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等离沪南下，哲学班等也停办了。

在哲学班中，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从不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很少与人打交道。但听课是很认真的，对彭述之的讲话，由开始时听不懂湖南口音，到逐渐能听懂。我敬佩彭述之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我除了班上听课之外，与彭述之本人还有个别接触，彭述之多次到周仁生家，有时我也在场。还有一次彭述之陈碧兰等开会，借用我在武进路的住所，他们开会，我在外望风。

## 意因同志

年青时喜读意因的文章，但不知道意因是谁，过了几年，才知道意因就是郑超麟。

在郑超麟同志的晚年，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最后五、六年写的文章，大都由我整理抄写。1998年8月1日，郑老与世长辞了。他的几位侄子对我说了许多感谢我帮助他们伯父的话。我说：不能说我帮助郑老，而是我与郑老相处的几年中得到很大的教益。

郑超麟同志对信念的坚定，他对写作的认真仔细，复核时的一丝不苟，一个半盲半聋半残的曲背老人，“此身犹在战未休”的干劲，他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这些“意因精神”，我深为感佩。他的“虞渊追夸父，渴死亦甘休”，“祝新旗插遍千千屋”“锦绣人寰身不见，终必现”，“伴随坎坷登百岁，直到此身也不留”的诗句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意因同志去世了，在他身后，我能写什么呢？与其写颂扬的悼文，不如写写相处的情景和感受吧！

### （一）初识郑超麟

1947年春，我来到上海，每周去听彭述之讲课，后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这一年秋，我进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与温州来的另二个学生，成立了师专S.Y支部，在校内进行反蒋活动。S.Y是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我们除了阅读马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多数派的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也读少数派的刊物《新旗》，意因写的《不断革命论ABC》，《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我还读过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四本油印的小册子，汇编当年论争时多数派的文章，主要是彭述之和刘家良的文章。我们读过不少署名意因的时论和译著，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但没有读到当年论争时少数派的文章。我们支部的几个年青人，萌发了想面见郑超麟的念头，通过联系，约定在虹口公园见面。

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公园僻静的草地上，郑超麟与我们谈了半天。谈话的内容已无法记得，无非是少数派争论的问题。但有二点印象始终未忘。其一：当年郑超麟约五十岁左右，看上去是一个体魄强壮，风度不凡的学者，戴一付与众不同的眼镜——远近两用眼镜，深度近视

镜下半部有一小块半月型的老花镜。其二：我们原先很爱读意因的文章，逻辑条理周密，文笔精美流畅，总以为他是一位谈锋锐厉的宣传鼓动家。但交谈之后，觉得他的谈话，虽然逻辑性很强，但欠宣传鼓动的魅力，一口福建腔，说得急了还有点口吃。

## （二）重逢

1952年12月22日，我在福建和周仁生、黄禹石、赵青音同时被捕，我被判刑七年。1955年押到内蒙古劳改，1959年期满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先后三十五年，我几乎与世隔绝，一个老朋友的信息也没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政协增补郑超麟为特邀委员，我猜测老朋友的境况有所好转了，1987年我退休返回上海，才逐渐找到几个老朋友。历经多年劫难，相逢各有许多遭遇诉说。几个人谈起，要去看望郑超麟。我和沈云芳找到李培，由他领我们去见郑超麟。那是我们相隔几十年后的重逢。沈云芳1949年以前与他接触较多，那次大部份时间是郑老与沈云芳交谈。我与郑老仅见过一面，他已记不起我的姓名。

重逢给我的印象是，郑超麟体型与当年判若二人。但一谈话，记忆、思维、逻辑仍不减当年。

后来知道，几十年的监狱囚禁，他的思想立场始终坚贞

如一。

从那以后，每年去看望他几次，有时李培替他抄写的文稿忙不过来，将一部分交我抄写。

### （三）李培去世

1979年在石泉新村分配给最后一批释放的托派住房，他们住得邻近，相互有些照顾，生活也很安定。政府安排郑超麟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蒋振东、喻守一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黄鉴铜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熊安东等人在民政局领生活费。但大家毕竟都是老人了，蒋振东，黄鉴铜，喻守一相继去世，郑超麟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在搬进新居后不久就安然长眠。郑老生活无人照顾，他的侄孙女郑晓芳从老家漳平来到上海照料他的生活，替他抄写文稿。郑超麟年已高龄，有白内障，行走不便，晓芳上班后，李培成为他的助手，替他读书报，抄写文稿，邮寄信函，与外界联系，甚至日常饮食起居，都由李培负责。

1993年9月下旬，李培突然发病，到9月30日就逝世了。郑超麟得知李培死讯就惊叹：“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那段日子，郑超麟的心情是很忧郁的。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总想在有生之年，为传播革命思想竭

尽全力，他常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忘我的，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们仅存的几位朋友在考虑今后怎办。郑超麟的能力和影响，是无人可代替的。李培死了，但决不能让郑超麟处于无助的境况。

李培在世时候，他有时太忙，曾将郑老的文稿交我抄写，但我和郑老接触不多。李培死了，住在邻近的二位老友身体欠佳，周仁生希望我能协助郑老。于是我开始走入郑家，做了一点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工作，相互接触多了。下面所写，就是这几年共处的点滴感知。

#### （四）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从不隐瞒观点

听朋友说，中共中央决定释放被关押的最后一批托派犯人时（判无期徒刑或关押几十年未判决的）。除了郑超麟少数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口头上都表示认罪的。有些干部对释放不认罪的郑超麟有意见，周恩来为此请示毛泽东，毛很爽快地说：郑超麟不认罪，再关下去也是不会认罪的，放了罢。《郑超麟回忆录》初版上有一简短的“出版说明”：“郑超麟，现任上海政协委员……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从上述传闻和出版说明，足见郑超麟从

被捕及至关押二十多年，始终是不“认罪的”，释放后任上海政协委员，仍然公开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96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把上引的那段说明删去了。这当然可以视为思想开放的一种好现象，但郑超麟反而不高兴了，他的思想确实是够“顽固”的，宁愿人家公开指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1952年12月22日，中共逮捕了大陆内的所有托派。在狱中各人的表现怎样？我一无所知。近年来接触了部分老朋友，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像郑超麟那样公开抗拒是少有的。大部份被关押的托派，包括一些过去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帝国主义逮捕，曾受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的人，在共产党狱中，即使思想上没有改变，口头上都“认罪”了，不惜将污水往自己头上猛泼。

为什么革命者能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而在“自己人”狱中自污呢？俄国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一代布尔雪维克，在沙皇狱中很坚定，而在共产党的监狱和法庭上，什么罪名都承认，包括叛国、谋杀等罪名。中国共产党高层干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也往往认罪。这个历史现象，值得学者深入探讨。

郑超麟本人始终坚贞如一，但他对待一些狱中表现不佳者，甚至曾批斗他的人，仍然持谅解的态度，郑超麟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 (五) 生命不息，笔耕不已

郑超麟将近百岁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近于失明，曲背弓腰，行走不便，然而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他自己无法找参考资料，没有一位专职的人帮助他。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却是他创作的旺季。近年的文章除了已出版的《怀归集》，又编了一册《鳞爪集》。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出版的。但郑超麟曾说：“这些年我的文学性的文章，回忆性的文章能够发表，但理论文章就因我的观点不同无法发表了。”他把那些编成册留待后人去处理。

二年前，郑超麟说：“我出生于1901年，与世纪同龄，快活到一百岁了。目睹或参与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我要写一篇论文，对本世纪的事件进行思考和分析。”又说：“写大文章需要资料，可惜我老了，无法寻找资料。”他是希望我帮他查找资料的。可是我忙于打工糊口，每周只抽一天时间帮助他，这一天也只能处理一周内的来往信件及其他文稿，一直没有为他找资料。

郑超麟同志对马恩列托的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人，常能记起主要的论述。对卢森堡的经济理论亦很有研究，能叙述其主要论点。但写文章就不能单凭记忆，必须根据原著。马恩列全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家中都有收藏：托洛茨基的著作，当年被作为罪证搜去了，近年才觅得其主要著

作《俄国革命史》等书；但最主要的参考书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遍寻无着。去年，清华大学教授刘贵生（刘静贞之侄）来沪看望郑超麟时，请他在北京寻找。刘贵生回京后，不久就寻到此书，且复印一册寄过来了，超麟喜出望外。为了便于阅读，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一章，放大复印出来，超麟就能亲自阅读了。

1997年夏天，超麟居然着手写他的论文了。他是在无人帮助，克服视力的困难，行动的不便，独自艰难地翻阅马恩列全集，托史的文集及其他资料。到10月，写出了长达八万字的论文。他题为《最后的论文》，我对他说：不能称最后的论文，你还要活下去，还要不断地写文章的。后来，他自己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他将原稿交给我，嘱我抽空慢慢地整理。

我断断续续地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交给超麟同志亲自校订。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核修订，有时还补充或修改了相当多的内容，交给我再抄。到97年底，只整理毕前四章。1998年元旦后，郑超麟患病住院，当时他自以为不治了，写信向王凡西告别。在病榻上嘱咐我：“就算我的遗嘱，我的《最后的论文》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时，一定要说明，前四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十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医院用多种方法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根据医生的建议，回家疗养。这位望百高龄的老人，记忆思维始终非常好，仍能看书写信。于是我加紧整理，争取在老人有生之年，亲自审核全稿。我每晚工作到深夜，一周整理二、三章，送去请他审核。到98年4月15日，郑超麟同志98寿辰之前，他亲自全部完成抄正稿的校订。老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认真的，我抄正的文稿他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核订，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审核时常有大段大段的修改补充，有几章整章重写，嘱晓芳连夜赶抄出来。

这项“巨大工程”完成后，郑超麟同志非常高兴，不过他还说这只是初稿，还要仔细修改。

生日过后，他又着手再校改，到5月24日基本完成。次日嘱晓芳去复印三份，晚上晓芳拿来复印件后，才告诉她，肝脏痛得厉害，明天去医院检查，并叫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当晚去见他。

我赶去后他对我说：“一份复印件给你保存，要从头看一遍，编一份勘误表。”老人对能亲自完成二校很高兴，不过他还想待我勘误表出来后再校第三遍。

郑超麟同志的这篇《最后的论文》，其内容不必叙述了，不过我要指出，他的论文，是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照郑老的原话：“我们试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帮助二十一世纪的人去更好地进行革命。”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官方认同，就连老朋

友，也许有人对他的某些意见持保留的态度。但毕竟这是郑超麟同志的思考结晶，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善言”，后辈应该研究汲取。

老人一次对我说，《最后的论文》年内能发表。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当时没有详说，我也没有细问。过了许久，他告诉我，范用替他出《晚年文选》，将《最后的论文》也编进去了。对范用先生，郑超麟是非常感谢的，曾多次对我说：“我不知怎样感谢范用才好，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发表不了的。”

郑超麟强忍病痛，亲自编定三卷《郑超麟晚年文选》的编目，亲笔写了一篇自序。还为他早年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的再版写了一篇逻辑性很强的序。不断地与友人通信，一直笔耕到7月20号突发脑溢血昏迷失去知觉为止。

## （六）“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朱正给郑超麟96寿辰贺电：“一身可征一代史，百世当钦百岁人。”郑超麟爱沈吟古僧人的诗句“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现在“名人”传记很吃香，长篇巨册，比比皆是。但所有的传记，包括死后的悼词，都是溢美之词。有些把传主神化，写成从孩提开始，就是伟人了。还有本是十恶不赦的蒋介石

四·一二屠杀革命者的元凶，也作为传奇人物立传赞美。如此下去，岂止传中人物半非真。

郑超麟近年来也写了不少人的传记，有中篇《记尹宽》，更多的是短篇《记×××二三事》等。写尹宽，陈乔年，陈延年，汪泽楷，何资深等人，是郑老怀念老友主动写的，也有一些是应人之请写的。

郑老写的人物传记，一部分收入已出版的《怀旧集》，还有几篇编入《鳞爪集》。他写的与坊间常见的完全不同，既不溢美，也不恶意攻击，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实事求是。”读了他写的传记，得到的人物印象是活生生的，既有优点，贡献；也有缺点，失误。完全是“信史。”

现在写几件我所知道的事例。

一次，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戴晴访问郑老，戴称郑超麟为伯父，说她是郑老伯老朋友的女儿。郑老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戴晴从包内拿出《郑超麟回忆录》，说：“我是读了你的回忆录，才知道你是和我的父亲一起从苏俄回国的。”翻到79页，指着“傅大庆”三个字。戴说：“我就是傅大庆的亲女儿。”郑老仔细端详戴晴后说：“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戴回京后，跟母亲谈了见到郑超麟的情景，后来戴给郑老信，说她的母亲想请郑老写一篇关于傅大庆的文章。郑老写了《记傅大庆》，写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生活，写傅的为人和性格，写回国，写在狱中传递营救胡志明的讯息，写傅的牺

性，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友的深情和缅怀。

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要打倒、整死刘少奇，到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派人找到当时还在押的犯人郑超麟，威逼、利诱郑超麟证明刘少奇在武汉时出卖工人的利益，充当工贼叛徒。郑超麟处在当时的逆境下，顶着压力，硬是不肯顺着诱供写刘少奇是叛徒工贼的证词。后来，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当时郑在狱中写的材料，证明在武汉时期，刘少奇是捍卫工人利益的。郑的当时难能可贵的证词，实是刘少奇最可贵的一段，同时也显现郑超麟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与郑超麟旅法时同是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十八个创始人之一，回国后曾共同战斗在革命战线上。邓小平是郑超麟旅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曾住在同一工棚。为庆祝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拍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派人访问郑超麟，用意是很清楚的，希望郑谈一些颂扬的话。但郑超麟始终不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说话。后来播放的记录片《邓小平》第一集中郑老出现三次，但都不是那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一个自称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境外电台以此诋毁周恩来的形象。我为此问郑老，周恩来有这个私生女吗？郑老说没有此事。但郑老又说“周恩来曾有过一段浪漫史，但那是个人的隐私，我不能对人说。”我了解郑老的脾气，就没有再问了。总之，郑老对位居高层的人物，也不去吹捧，可也不攻击，不揭与政治无关的绯闻，完全做到“实

事求是”。

中央筹备纪念《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文献组了解到王若飞和郑超麟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派了二人专程乘飞机来上海采访，打算请郑老谈谈，他们写采访记。一接触，郑老答应亲自写一篇文章，于是二位客人先回去，郑写成后交我抄正，电传到北京。来访者要将郑老的文章编入《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当然想得到歌颂的文章，可是郑超麟写了《王若飞轶事》除了叙述当年二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之外，着重写了三点：（1）王若飞是陈独秀派；（2）王若飞在六大的活动；（3）王若飞帮助托派，在莫斯科时，曾将住所白天让王凡西关起门翻译托派文件。后来北京传来信息，王若飞的儿子不同意该文收入纪念册。这原在郑老意料之中，所以毫不介意。现在此文已收入《鳞爪集》。

### （七）郑超麟论卢森堡

波兰民族中有二位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一位是自然科学家居里夫人，一位是社会科学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

郑超麟非常推崇卢森堡，不仅崇敬她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为革命英勇献身，还仔细研究过卢森堡的经济学说，他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充和发展，她提

出的理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郑超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算式，可是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却有漏洞，马克思始终没有解决。卢森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只能“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扩大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能够“扩大再生产”的，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过去的，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配合着发展的，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所积累的钱，能够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多余的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以此来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困难。

资本主义是依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迅速，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消灭得愈迅速。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就因无人购买其过剩生产资料不得不窒息而死了。

这就是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纠正和发展，因之，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列宁之上。

郑超麟说：过去斯大林党以马、恩、列、斯为领袖，现在斯大林已臭不可闻了，没有人再提他了。我们托派历来提马、恩、列、托。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并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郑超麟强调说：“我认为，应该提马、恩、卢、列、托”。

## （八）未了的心愿

郑超麟心跳停止时，眼睛似闭未闭，仍是死不瞑目。

郑超麟生前多次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给 1952 年肃托案平反。定托派为反革命的主要依据是“汉奸”和“特务”。毛选新版注释已指出托派是抗日的，还有什么理由不予平反呢？但多次上书，似石沉大海。郑超麟说，只要我还活着，还要继续上诉，不得平反，死不瞑目。不过我们不忍心使老人死不瞑目，按摩了他的眼眶，让他闭上了双目。毕竟他已见到毛选新版删去了对托派诬蔑性的用词。他还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至于何日正式法律上平反，后人只有拭目以待了。罗马教皇数百年后才给伽里略平反，我们能待到何日呢？

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求平反，并不是争论政见的是非，只是法律上定托派为反革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托洛茨基政见是否正确，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郑超麟还有一个心愿，要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有一次对我说，由他出面向民政部门申请，争取成为合法的学术组织。他的这个愿望，在其有生之年未曾正式提出。

## （九）待人一例

郑超麟待人很宽厚，对人的观察很深刻。但也妒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一生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凡是叛变投敌，特别对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非常痛恨。郑超麟对于顾顺章、马玉夫、刘仁静从来不屑一提。

纪录片《邓小平》播出后，国内外郑超麟当年的朋友，知道他尚健在，有来叙旧，也有来信问候。一位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严灵峰，当年曾是托派且与郑老相识。他通过北京的友人打听到地址，来信联系，郑老不予答复。我对他说，此人赴台几十年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宜与之写信。郑老对我说：“你不了解，此人投敌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当一名处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福州市长，不管后来怎样，我决不与之伍。”

郑超麟就是这样一位器重革命气节的人。

## 后记

1996年，靳树鹏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郑老的资料，后来我写了《意因同志》寄去，他据此并参考其它资料，写了一篇《郑超麟先生ABC》。

郑老去世后，我将《意因同志》前半部分加以修改，删去了后半部分，重写了第四节以后的内容，成了这篇《意因同

志》。还有许多话可写，终因我写作能力太差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超麟同志高尚的品德，坚强的信念，“战未休”的斗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思考，应该称为“意因精神”。几个月来，我一直想用简洁的几句话或一段话，来表述“意因精神”。苦思冥想，始终未能叙述出来。深盼陪伴郑老二十年的晓芳和其他老朋友，能恰当地叙述这个不朽的“意因精神”。

1998年11月20日

## 杂忆《冬至》

1952年12月22日，冬至。中共在这一天，逮捕了大陆所有的托派成员，史称大肃托运动。中国1949年以来，土改、镇反、反胡风、反右、文革等运动无数，在各种传媒所列各类运动名单中，就是找不到肃托运动。原来1952年肃托是不公开的，不仅逮捕、审问、宣判没有公开，甚至在二十多年后，最后一批被释放都没有公开。为什么这样呢？其中原因我们无法猜测，可能是不让人知道有这一思想的存在吧。1949年前，解放区以托派的罪名杀了不少人，王实味就是这样被杀的，山东老区一批共产党员也以托派罪名被杀，但后来证实他们并不是托派。解放后，温州杀了托派青年连正炎，逮捕了老托派曾猛。上海等地没有动静，全国其他地方情况不清楚。但1952年，全国大肃托时，逮捕了上千人，有老托派，中青年托派，同情者，甚至有无辜受累者。

当时，我只知道在福建和我同时被捕的有周仁生、黄禹石、赵养性、赵青音，1954年底宣判，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黄禹石15年、赵养性8年、周履锵7年、赵青音5年。后来我被押到内蒙古劳改，7年期满后又强制留劳改农场就业，又与世隔绝了28年。35年之后才逐渐知道一些老朋友的情况。

据说大肃托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的，还听说毛决定“一个不杀”。但被判决十年以上重刑的很多。不少人被判无期徒刑，据我后来所知，有何子瑜（何资深）、藉云龙、周仁生、刘平梅、王国龙、熊安东、杨博、蒋振东、杜畏之、叶春华等人。还有郑超麟、尹宽、黄鉴铜、喻守一、曾猛等人关了二十多年，始终未判。曾有被判无期的人问当局，他们为什么不判，答道：你们都判无期了，也判他们无期，你们能心服吗？言外之意，不判决的人，随时可以拉出去枪毙的。被判刑关在狱中或送劳改队的不少人病死或劳累死，有曾猛、黄禹石、何资深、藉云龙、杨博、张维良、林松琪等人。

到了1972年，二十年过去了，被判有期徒刑的都已释放，狱中仍关押的只有十多人，据说也是毛泽东的释放全部在押的托派分子指示，这年9月28日全部获释。这时上海只有郑超麟等十二人，北京有杜畏之一人。但上海的十二人，没有释放回家，被安置在周浦和青浦二个劳改单位，等于受管制，但给不菲的生活费。1979年6月5日又被宣布恢复公民权。王国龙、周仁生、林华、刘平梅四人回到原籍，郑超麟等八人分配石泉

新村房子。还挂名任命郑超麟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蒋振东、喻守一为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黄鉴铜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北京释放的杜畏之回上海居住后也被任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 （一）儿童托派

1952年大肃托时，被捕的有老托派郑超麟、何资深、尹宽、曾猛、安明波等人；我仅24岁，不过是一个SY分子，可算青年小托派，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些比我小几岁的学生，但不会有小于18岁的人被捕。后来证实，我的估计错误。

1995年7月19日周仁生给我的信中说：

有一位名叫叶国光的，1952年冬至日大逮捕时，他还只有13岁，是一个最小的丁字碑下人，后来他也做点生意，生活好多了。他对胡振东说：“像老超这样的领导人，平生应该去看一趟。”请把这消息告诉老超，让他知道那时13岁被捕的小儿童（今年也已56岁了），他还在挂念老师。

13岁，不能算青年，甚至不能够算是少年，只能算是儿童。逮捕托派时竟对儿童都不放过。

### （二）婴儿入狱

1952年肃托大逮捕范围甚广，有正式托派党员，托派青

年团员，读书会成员，还有无辜波及的。

广东刘平梅被捕后，担心妻子胡洛卿会否被捕。刘平梅在狱中突然听到熟悉婴儿的哭声，他知道不仅妻子被捕，连他们还在哺乳期的婴儿也一起“入狱”了。

后来刘平梅被判决无期徒刑，胡洛卿十年。小女婴由刘平梅母亲领去养育。今年该有63岁了，现居住在香港。

我被捕时是有逮捕证的，13岁儿童托派叶国光也会有逮捕证，这个小婴儿入狱有逮捕证吗？

### （三）在娘胎中入狱者

1952年大肃托时，还有比刘平梅胡洛卿女儿更小的人入狱，不过是在娘胎中和其母亲一起入狱的。

我原只知道沈云芳的妻子翁淑青1952年12月22日，在上海宝隆医院（现长征医院）住院候产时被捕了，在狱中生下女儿。

后来我知道席时佳也在狱中育下一女，福建还有一位受牵累的青年女子也在狱中育子。2001年我写了一篇短文《监狱之花》记述此事，并将手稿寄给翁淑青请她修改。她来信说：

“我和云芳都想到，还有方则正的妻子夏秀婵，夏建勋的妻子王崇媚也在上海监狱中产下女儿。现在方则正夫妻在美国，无法联系。夏建勋在温州，我已和他通电话，询问当年情况，他

说妻子 1953 年 7 月在上海监狱产下女儿，只说那时很苦，其他不愿多谈。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我们这些身历过这灾难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苦味”。

这只是我所知道的五例，全国有多少同样的人，就知道了。

2013 年，方则正夫妇从美国来上海探亲，会见了老朋友，他们看到我写的小文，颇有感触，但说：“育的不是女儿，是儿子”。

周履锵凭记忆而写

2015 年 3 月 9 日

年初收到段跃寄来的诗《冬至咏叹》，写得很好，可惜我无诗才，不能吟和，但有所感写下这些杂忆。

## 附：1952年冬至咏叹（一组）——段跃

2004年夏，偶然机遇结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其人生遭际唏嘘不已，始以当事人口述为其历史存照，共采访15人。

1952年冬至夜，留在中国大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举秘密被捕，定罪反革命。

大肃托所捕何以计数？一说五百余，一说千人。档案未解密，无准确数据。世人误以为托派在中国已灭绝，空留一顶帽子而已。

然，人在事实在，幸有存活者至今。

一夜之间，百千人生落千丈，或瘦死囚牢，或终身监禁，或以低贱之身居市井苦撑，每遇运动必优先挨整，有甚者劳疾而亡。

幸存者至1979年后恢复公民身份，未正式平反，至今。1988年4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当年对托氏的“指控毫无根据”，为此案“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有更正曰：托匪汉奸的提法是由共产国际内部流传的“一个错误论断造成的”。

观此辈人生，饱经三十年风雨，青丝成白发，风华化风烛，九十以上高龄者不乏其人。每与诸老谈起人生悲悔，其仪态淡定，纵横宇宙时空，俯瞰人类历史，对一己之痛含笑了之。

2014年，采访工作已届10年。余无力脱俗，对其口述的

整理仍未完成，中有几位未及见文即辞世，呜呼哀哉！

如下数句虽拙，以表余对诸托洛茨基主义者之敬意，谢意，  
愧意。

阖家煮饺暖冬节，夜半羈车鸣树寒。<sup>①</sup>

书生起身迎來客，一纸诛辞入狱监。

堪知狱祸非无故，主义原来是异端。

军机定罪“反革命”，谎语讥言废卅年。<sup>②</sup>

乱世硝烟觅正途，山河社稷启民先。

背负污尘笃马列，阁楼微火待燎原。<sup>③</sup>

---

① 据广东刘平梅老人口述，1952年冬至他与妻儿老母食罢冬至水饺后，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独自回中山大学值班，当夜被捕；数日后，他在牢房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才知妻女也在狱中。

据上海周履铮老人所知，当时因托被囚后，有5位妇女在狱中产子。

②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被捕两年后宣判，宣判书以军事法庭落款。刑期满后，释放证落款改为法院。至今不明军法、民法、政治犯诸概念如何在托案转换。

另，据传大肃托之举来自中央秘密指令，无证。联想起清王朝的军机处。

③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基本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终身为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反对斯大林，认为其以马列之名，行法西斯之道。托氏被斯大林驱逐后，屡遭诬陷，终被暗杀。有史论称，中国托派是“亭子间里的革命者”。“阁楼”即指“亭子间”。

长夜空廖数繁星，从无精卫海填平。  
血汗不惜铺砖瓦，无期昭雪目难瞑。<sup>④</sup>

已忘寒凝几度来，青春梦断蜡烛残。  
敢问人生悲与悔？笑谈极夜岂无边！<sup>⑤</sup>

---

④ 温州邱季龙等老人感言，出狱后安贫乐道，正直做人，“杜门怕说鹿为马”；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铺砖添瓦；以扎实的工作、无私的奉献洗刷泼在托派身上的污尘。

⑤ 据天文科学考：“12月22日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白昼达到最短，黑夜达到最长，北极圈里出现极夜现象，太阳终日无法升起。



# 杂稿

- 浩气如虹——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 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信》的断句
- 公理与强权——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
- 绿叶上的诗——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
- 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 《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 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年》跋

## 浩气如虹

——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1995年开馆的刘海粟美术馆，除了展出美术大师刘海粟的传世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刘海粟先生生前收藏的历代书画艺术瑰宝。其中有一幅陈独秀赠刘海粟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我不谙书法，但站在此联前，那苍劲的行草，丰富的内涵，陷入沉思。

这幅对联，也收入由萧克将军作序并题写书名，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编著的《陈独秀诗集》。编者的注释，采用访问刘海粟的谈话记录，道出了有关这幅对联的一段故事。刘海粟说：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1935年秋，我刚从欧洲回来，见到蔡元培、杨杏佛。他们想去监狱看望陈独秀，但不便去，就跟我说：你是无党无派，你去吧！我是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去的。见到陈，紧握他的手，说：“你伟大！”他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

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陈在狱中没有忧忧不乐，很自然，有气派。我们谈话一个小时，临别时，我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下了这幅对子。在十年浩劫中，我把它辗转藏匿，才得以保存下来。

读了这幅对联和注，对陈独秀的革命气节，在反动派狱中的坦荡胸怀，激昂情绪，使人萧然起敬。这幅对联也是陈独秀的自画相，画出了革命家陈独秀的自信，自尊和自重。

陈独秀的伟大气魄，不只是表现在这幅对联中，现在留下的有《金粉泪五十六首》、陈独秀自己写的《辨诉状》等，这些掷地有声的诗篇文章，无不显示这位伟大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 附记：

对联墨迹，展览会上不能拍照。后来陈独秀的亲属吴孟明（陈独秀外孙）等去刘海粟美术馆，两位副馆长亲自从珍品库内取出原件，挂起来让他们拍照。吴孟明给了我一张彩照，我放大复印送给朋友。

原载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动态》11期

## 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的信》的断句

1937年8月2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陈独秀时，炮制了一个“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呈文。陈独秀本就无罪，何来“深自悔悟”，于是他给上海《申报馆编辑部》写信发表声明。当时《申报》没有发表。

1980年，上海档案馆将收藏的此信原件提供给《党史资料》丛刊发表，世人才见到了这篇逻辑严密，铿锵有声，且极富文采的重要文章。

原信无标点，《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8月）发表时也不加标点。

随后出版的陈独秀文集及众多陈独秀传记等，都收有此信。为便于阅读，都加标点断句。但读了经断句后的信，有些地方反而费解。如将“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断成“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陈独秀传》下册和《陈独秀著作选》)。读来实在无法理解。有些作者大概也觉此不通，干脆将“周内”改为“固内”，但既非原词，也无法读通。为此我持陈独秀的手迹向吴孟明老先生请教。吴先生是陈独秀大姐之孙，从武汉到江津，一直伴随其外祖公陈独秀。

近日接吴先生来信，寄来经他断句的陈独秀的此信，他认为上述费解的一句应该断为：“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来信针对“周内”一词特加注指出此词出自《汉书·路温舒传》，指罗织罪状，故意陷人于罪。

经吴先生断句，使我读通了陈信。陈独秀信中写着：“……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如此工整的对仗，更显其逻辑和文采。

现将经吴孟明断句的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的信予以发表。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sup>①</sup>，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  
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动态》23期

---

<sup>①</sup> 内（Nà）通纳。周内，谓罗织罪状，故意陷人于罪。（见《汉书·路温舒传》）

## 公理与强权

——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

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

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仲甫朱印）

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

这幅题词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曾在上海档案珍品展上展出，1994年12月（第3期）《档案与史学》封二上登载彩色影印件。刊登时下注：“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第76页文字说明称：“陈独秀在狱中给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题词”。档案馆保存这件珍贵的文物，并使之面世，对研究陈独秀抗战初期的思想，提供了一件重要的证据。

《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为“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按署年旧时有二种表达法：一为公元，一为民国。二六年指的是民国廿六年，即公元1937年，所以认定的年份是正确的。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出狱，9月乘轮船赴武汉。如把月份认为（三）月，当然还在狱中。但我们较为了解情况的人，对此认定存有疑问。一二两个字竖写成三横，看起来像“三”字，但第一横偏左，且与下二行分开，其实是一、二两个字，即十二月。据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说，这是他的舅公陈独秀的一种习惯写法。所以可能是陈独秀在武汉时所书。

吴孟明先生少年时随祖母和陈独秀在武汉，后来同船入川，避难江津，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一直陪伴在身边。吴记得在武汉时曾有不少人请陈独秀题字，那时王凡西住在陈家。要确认这幅题词的日期、地点和甲原先生的情况，最好向王凡西询问。所幸王凡西老人尚健在，现在客居英国。于是我将这幅题词复印给王老先生，向他请教。1999年6月22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得独秀遗墨的影印，欢喜之至，此事本有很多话说，目前只好算了。吴甲原是我的小同乡兼朋友、画家，他与丰子恺一起开过画展。吴极富正义感，但从来不涉及政治，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一个艺术家。我当年和他来往，在《双山回忆录》中曾略提及，（见《双山回忆录》第270页），写不下去了，等我精力好转后，给你写详细的信。

1999年11月27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早几时你寄来的独秀给吴甲原写的字不知你是怎样得到的，盼告。我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此事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因吴求独秀写此字句时，我们正准备到军队中去。

我回信告诉王老这幅题词藏上海市档案馆，我是从其馆刊中复印的。我请他确认题词的日期。他于1999年12月31日来信：

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里，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年青朋友（吴所认识的），也乘机求独秀的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这是在新的局势中，重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强调的“公理与强权”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反映他设法让我们进入军队去实际参加抗战的愿望。本来，为此我可以写篇文章，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

王凡西老先生见到这幅墨宝欢喜之至，也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我们也甚盼读到他写出来的详细说明当时的情景及题词内含深刻哲理的精辟文章。无奈王老

毕竟已是望百老人，著述困难，诚如他来信所说：“现在有心无力了。”所幸王凡西五十年代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一章《抗战初期的陈独秀》，记述当年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原来陈独秀早在出狱之时，就对抗战起草了七条根本意见，主张广泛团结抗日。九月到了武汉以后，两次在青年会发表主张抗日的演讲。他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军方联系，拟将一些托派成员送到部队中去；二是与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共同目标。陈独秀与当时在武汉养伤的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交往，“独秀和何基沣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几经商定，决定王凡西、濮清泉等人随何基沣到师部去，王凡西是秘书长，濮清泉为参谋。陈独秀赠甲原的这幅题词，正是这个时候写的。

何基沣拟带王凡西等回师部，“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将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据我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他和独秀的往还让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侦知了，于是便先发制人。”（见《双山回忆录》第273页）。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成果，对此本文不详细叙述了。

一九三六年画师刘海粟到南京监狱中拜访陈独秀并索题

词，陈独秀即席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无独有偶，一年后，另一位画师吴甲原，在武汉请陈独秀题词，陈又写下了此“公理与强权”相赠。一位革命家与艺术家的交往，为后人留下了两幅极为珍贵的墨宝，成为佳话流传久远。

至于《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是赠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现经题词时亲在场的王凡西先生来信确认，甲原先生是当时在武昌铁路局供职的浙江籍画家。而上海工商界人士中，如有张甲原或李甲原者，都不是陈独秀这幅题词的承受人。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香港也出了一个版本。上文所注页数是港版页数。）

上海《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 绿叶上的诗

——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

读《瓠风》第三集得知诗人莫洛（马骅）已于2011年六月辞世，乡贤仙逝，不胜感哀。

找出一本马老赠我的诗集《我的歌朝人间飞翔》，翻开首页，有马老赠书的苍劲娟秀的题字。重读诗篇，感受甚深。这本书的附录收有一首郑超麟七绝古诗（第210页）。原来是郑老将莫洛的散文诗《绿叶上的诗》的古译。现代人只有把古文、古诗译成语体文，而郑超麟竟将散文诗反其道译成旧体古诗，真是一个创举。

郑诗：

读莫洛先生新书，戏将书中一首新诗之意改写为旧诗，以博一粲。

野游得句无写处，  
绿叶权宜作小笺；

晨露任它滋笔迹，  
朝曦照字更鲜妍。

1996，2，17. 玉尹老人

（此小序收入郑超麟自编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时改为：“莫洛先生有一首散文诗《绿叶上的诗》，写得很好，戏改成一首七绝。”第三句“晨露”改为“晨霜”。）

玉尹老人就是郑超麟。

莫洛先生原诗：

绿叶上的诗

（我的诗句写在绿叶上……）

初春明净的天空，袅动丝丝微云。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送来早开的梨花的馥郁。淡黄的阳光从高空泻下，蜜浆一样浸淹着树木。我的诗句像在贪婪地吮吸奶汁，它吮吸着绿叶上阳光的色彩。

清晨晶莹的露珠，缀上绿叶的边缘，滋润着我的诗句。太阳高高升起，一颗颗把露珠收去。我的诗句受到阳光和露珠的爱抚，既有露珠的沁凉，又有阳光的温煦。

（细雨沐浴着我的诗句……）

夏晚的南风，微微地吹，轻轻地拂，绿叶快活地左右上下

摇摆。我的诗句像摇篮里的婴孩，在绿叶上吟哦低唱，合着微风的节拍。

细雨蒙蒙如烟，无声地降落在绿叶上。我的被沐浴过的诗句。不沾一点尘土，如同初醒孩子的眼睛，闪动智慧的光泽，映出纯净的思慕。

（我的诗句随同黄叶飘落……）

深秋的西风打树梢上驰过，绿叶慢慢变成了焦黄。我的诗句随同黄叶一起纷飞，飘坠到铺着衰草的地面。蛭螂伏在土穴里一动不动，蚰蚰儿也停止了弹拨琴弦。落地的黄叶化成了泥土，紧紧掩护着我的诗句。

我的诗句在大地的柔怀里休息。——休息不是怠惰，也并非无所作为。我的诗句殷殷恋念着绿色的希望，和泥层下的种子一起私语欢谈。

（我的诗句从冬梦中醒来……）

寒冬的日子昼短夜长，天空凝冻着片片彤云。北风骤然刮起漫天飞雪，像无数白蝶在游戏追逐。赤裸的枝条吹响哨子，觅食的麻雀啁啾在檐头。我的诗句埋在土里并未冻僵，它梦见如茵芳草，梦见解冻的河水丁冬响。

田垅上簪着冰花，树干上积着残雪。栏里的胡羊在咀嚼干草，屋顶的炊烟在冷风里盘旋。我的诗句打个哈欠醒来，很快掀开雪的被盖。它要在残冬放声唱一支辞岁曲，曲调的每个音符，都染有春天里吮吸来的阳光的色彩。

(我的诗句自晨至暮，自春徂冬，经受过春阳，夏雨，秋风，冬雪……)

1983年7月8日夜于温州

这篇附录，最后还有一附记。这“附记”实际上是一篇纪念郑超麟的文章，其中有二段：

郑老深度近视，又患严重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我赠他的书，只能请人读给他听。他对拙作《绿叶上的诗》颇感兴趣，听后将之改写成一首旧体诗。他握笔写字甚为困难，竟亲笔将此诗写于纸上，托人带来给我。

我收到郑老的诗以后，吟诵再三，深觉郑老的改作远远胜过我的散文诗原作，实在钦佩，喜不自胜，又极为感激！

我对此事比较清楚，因为莫洛送给郑老的书，是经由周仁生（任辛）寄给我，由我送给郑老，并读给他听的。郑老的译诗，也是我抄正，连同手迹寄给周仁生转送莫先生。当时我并没有将详细经过告诉他们，所以莫洛以为“听后将之改写成一首旧体诗。”其实郑老并不是在听后，立即改写成旧诗的。

郑老的阅读和写作的方式与一般老人不同。他早年近视，老年反而不老花眼了，他是能看清字的，不过必须在强光之下。他用放大镜把灯光集成一个光点照到字上，几乎鼻子碰到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读。平时大都由我读给他听，但是他总觉得听别人读书印象不深，喜欢自己慢慢地读。他写字从不伏案，

只是坐在靠窗的椅上，手拿一块夹纸的小木板书写，因为他看不清自己写的字，只能凭意念盲写，所以写出来的有时串行，他喜用自来水笔，有时没有墨水只留下一道划痕。他写的书信文章，大部由我抄写，读给他听，核对后才发出去。郑老的这首译诗是经过数天亲自阅读原诗，反复思考，认真写成的。

郑超麟（1901 — 1998）福建漳平人，早年与邓小平等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后留俄。回国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曾任党刊《响导》编辑，《布尔什维克》实际主编。大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共坐牢三十四年，晚年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出镜三次，讲述邓小平三个不同时期的生平。

莫洛先生自己说：“我和郑先生既缘悭一面，亦未通信。”我每次回温探亲时，也未去拜访马老，聆听教导。但我对二位老前辈是很敬重的。现在他们已仙逝，我记下当年他们这段不平凡的交往，以作纪念。

#### 附记：

莫洛先生与郑超麟的交往是通过周仁生和我的，我记得周仁生给我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于是我找出旧信，发现有两封曾有提及。摘录如下：

1996年2月10日信：

今寄上马先生的诗作，请转交老超，这是老马的一片心意，他对老超非常敬佩，实在难得。

1996年3月1日信：

前天接到你寄来的两本书，一是《玉尹残集》，内有给莫洛的信及老超的新诗古译，二是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玉尹残集》、信、七绝都已送给莫洛。他的欢乐心情，难以言语表达。他对老超的这一青睐，表示无限感激。他早已了解老超的知名度以及他在老党中的地位，因此格外珍惜老超的墨宝，他几乎把每一个字都加以揣摩，他认为你抄的“新诗第一首”，应为“新得的第一首”，还有“足迹”二字未必抄对，可能是“书迹”或“笔迹”，不管怎样，总之，莫洛先生非常重视。

2014年10月《瓠风》第八集

## 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是一部世界名著。作者原计划写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三个人的传记，先写了《斯大林政治评传》，接着写成《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列宁传未写成作者就逝世了。

《斯大林政治评传》中译本早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历史真相的大白，国内出版界对出版有关托洛茨基著作已经开禁。托洛茨基本人的原著《我的生平》、《文学与革命》、《斯大林传》等都已由中央出版部门出版，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的经济学著作国内已出版了十多部。所以出版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湖南省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朱正先生向郑超麟提议，如果将《先知三部曲》译成，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郑老手头只有原文第一卷，他本人视力近盲，

无法亲自翻译，郑老把第一卷交给王国龙翻译。后来王凡西寄来原文三卷，于是大家决定周任辛译第二卷，喻守一译第三卷。王、周、喻三人曾合作翻译《国际事务概览》，（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的第二次合作。不久，朱正先生因故被迫离职，他的出版承诺无法实现了。出版希望的渺茫，虽然没有停止翻译，但进度放慢了，王国龙和周任辛化了六七年时间才译完了第一、二卷。喻守一译的第三卷只完成了一部分因病逝世，译稿被他的亲属拿去留作纪念了。后来第三卷由王国龙和周任辛分担继续翻译。

90年代，王国龙和周任辛一面译书，郑超麟、李培、周履锵着手到处找出版社，向国内多家出版社发函，寄去《先知三部曲》简介和各卷的序言译文。但大多被拒绝或没有回音。也曾考虑由港台出版，但即使出版了，也无法在大陆发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决定拟在大陆用自费出版。

大陆出版界有一种怪现象，畅销书出版社当然乐意出版，有些质量不高，甚至近于黄色的书也大量出版。可是一些有价值的书，包括专家学者化毕生精力写出来的学术著作，却无法出版。想出版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号，自负出版费用。上海学林出版社就是这样的自费出书的单位，而且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书。例如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就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学林原领导人曹宇庭与郑超麟认识，郑老决定：与学林联系，计划自费出版。具体联系工作先由李培负责，李培逝世

后，由周履锵继续。经多次商谈，其中一次周履锵陪同王国龙到曹宇庭家中面谈，大体谈妥，约需自负出版费（包括买书号）十多万元。周任辛还筹措了五万元，其余拟请港友帮助解决。

过去中国出版译著，大都不尊重知识产权，现在不行了，所以欲出版，须取得原作者或原出版社的授权，这一工作学林出版社要我们自己进行。过去日本翻译出版《先知三部曲》时，多伊彻夫人健在，经多夫人授权免费出版日文译本。王凡西与多夫人相识，但此时多夫人去世了，无法再与原作者联系。我们仅知道《先知三部曲》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郑超麟写信给王凡西，请他托英国里兹大学 Gregor Benton（汉名班顿或班国瑞）教授联系，牛津的答复为：多伊彻的著作权属于其代理人，并告知其通讯处。班顿再与多著代理人联系。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出版界的实际情况，以为出书能有很大的利润，提了我们根本无力承受的条件。班顿继续与之商谈，介绍在中国出版此书，甚至要赔钱的，请求免费让我们翻译出版，或者待出版有收益后再按一定比例付版费。最后英国代理人答复班顿，此事与其远东代理人，驻在台北的安宝林商谈。于是班顿和王凡西相继给安宝林去信，请求给我们免费出版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文译本。远东代理人可能较了解大陆出版界的情况，1994年11月24日复信给班顿，并寄来《西书中文版授权提议书》。提出了一个先付1000元人民币，以后视销售按一定比例付版费的条件。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至此，

版权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李培由于出书心切，在知识产权、出书具体费用等问题未完全落实之前，就写信给老朋友，希望帮助解决出版费用。1993（？）年戈兄携款到上海，先找到章涛的妹妹，再通过叶春华与郑超麟联系，企图帮助办成《先知三部曲》的自费出版，结果使戈兄大失所望，因为当时连译稿还未最后完成，根本谈不上出版。戈兄无果而返。这次他的到沪，还引起叶春华的反感和恐慌，认为是组织活动。戈兄受到威吓，临行前还担心能否平安回去。

李培去世后，在郑超麟的主持下，周履锵继续与学林出版社曹宇庭联系，决定自费出版。其间还受到叶春华的阻挠，一次，叶春华约周履锵到他家正式谈话。叶很严肃地说：“自费出版《先知三部曲》，千万不能用香港的钱，那是香港组织的钱，万万不可使用，否则后果不得了”。后来周履锵将此事告诉周任辛，任辛说：“那是蓉秋等私人的钱”。

正当谋求正式出版无望，自费出版又受到“自己人”的“劝阻”时，出现了转机，周任辛的一位在北京的学生为出版奔走，但也没有结果。1996年2月，她发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由世文图书发行公司总经销。她抱着试探的态度，去联系《先知三部曲》的出版。意想不到的世文公司听说我们已有译稿时，一口答应愿意出版。当时王国龙和周任辛正在上海，她打电话到上海。通过她起的

作用，1996年6月，郑超麟决定，由周履锵出面直接与世文公司总经理袁亮和编辑室主任施用勤联系，世文公司来信，请我们送稿到北京，旅费都他们负担，我们去信，因年事已高，请他们来取稿。

1996年7月7日，施用勤来到上海周履锵家，第二天周领施到郑超麟家商谈出版事宜。当时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只用你们的第一、二部的译稿，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三部的译稿，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当时拿出第三部的打印稿给我们看。郑超麟稍一思考，马上拍板同意。接着谈了具体事项，译费定为每千字35.00元，（当时算是较高的），送样书30套。最后由周履锵和施用勤签了正式合同。于是我们交了译稿，并告诉施用勤知识产权问题已有了着落。后来我们将得到的著作权的授权资料也交给施用勤。当天在郑家共进午餐。

事后我们知道，世文公司和我们一谈就成功是因为：第一、他们原有出版计划，已有了第三部的译稿，有了我们的译稿，他们就不必译第一、二部了；第二、他们尚无法找到外国著作人的授权，而我们已经找到了，而只需先付1000元简直是象征性的小数目，我们将授权关系转给他们，解决了他们最大困难。

从1996年7月8日签约，到1999年1月出书，约经过二年半时间，期间的联系工作全部由周履锵负责。施用勤回去看了稿子后，来信说，原稿须请人抄写，在稿费中扣抄稿人

工费7元，后来又来信提出译文须请人校对，要付给校者30%的稿费，周履锵与郑超麟商量后马上去信表示同意。其间来往信件没有事先征求王、周两位译者的意见，只是事后写信告诉周任辛。1998年8月1日郑超麟逝世后，联系中涉及到的问题周履锵才事前与周任辛商量决定。

世文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没有出版权的独立企业法人，它自我的介绍写道：“世文公司诚愿以任何方式保持与各出版机构的良好合作，并承诺尽心代理其各类出版物的国内发行”。所以《我的生平》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世文公司总经销。经过施用勤的二年的努力，《先知三部曲》最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和世文公司经销。书籍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在国内问世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并被评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

这次《先知三部曲》成功出版，1、省去了我们自负的出版费至少十多万元；2、以中央编译出版社名义比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社会效果大不相同；3、译者还可以得到稿费。

出书后，我们得到样书30套，用稿费购买了七、八十套，全部送人。虽也花了不少邮寄费，但比之拟付的出版费，少得使我们很满足了。王、周两位译者，收到首付的3000元稿费后，世文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未付，后来用书250套代替稿费。也大都送人了。

2005年09月24日

**说明：**

最近王国龙写信给戈兄，要我转交给他，并要我“致戈兄信中有关《三部曲》出版经过，叙述零乱，乞代再加整理，更正错误，还要把你经手的事补充进去”。因为不是几句话的改动能说得清的，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当然没有必要发表，只供想了解情况的朋友参考。

## 《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2001年1月王凡西同志来信说：

……

谈谈有关我的札记的事。从1989年2月起直到1995年3月止，我曾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因我从80年代开始，完全没有力气写比较郑重的文章。但世事多变，脑子里感想极多，闷积在脑，不吐不快。于是在子春的催促下，我以日记方式写了一些看报或读书的感想，随便想到，随便记下，无论内容或文字都无甚么可取之处。

……

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遗下的文稿，才又想到这批札记……但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因其中有些确无价值）。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

先把这堆乱稿理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废稿能与某些读者见面。

今后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好转些，拟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札记》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管了。

（王老给我信本第 29 页）

我一直在等待王凡西同志亲自删定后的《札记》。约半年时间过去了。到 2002 年 12 月 30 日，王凡西老同志在英国病逝。《札记》终未收到，我思忖，王老虽有亲自删定的意愿，但已无力完成了。王老逝世后，我致信班顿 (Gregor Benton)，请他将王老的遗稿《札记》寄来。2003 年 4 月 15 日，班顿来信云：“关于王老的札记遗稿，我尚未读过，目前在《先驱》同志们的手上。”遗稿已有着落，我也放心了。

从王老来信，我领会他的本意是：1，希望《札记》在他身后能得以出版；2，内容需要删节，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3，他嘱咐我替他整理，然后请朱正先生在国内出版。

多谢《先驱》的同志们将《札记》打印出来，并寄来让我校正。王凡西写的文稿虽比郑超麟的「甲骨文」好认得多，但尚有一些难辨认的「蝌蚪文」。我对照原稿，作了订正。

这次校订，只按原稿改正，未做整理与删节。按《先驱》朋友的设想：1，照原稿打字复印，朋友间传阅；2，日后争取出版。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供朋友阅读，校改后的打印稿就可

用；以后正式出版，照王老的遗言，应该重新整编的，我的意见应着重保留王老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和分析（如苏东崩溃，波斯湾战争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述可以删去，出一集王老思想的精选小册子。

2003年8月

## 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1、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翻译，是周仁生直接与康兄联系的，我一直没有过问其事。仁生去世后，我以为译稿早已全部寄给康兄了。

2、去年康兄来信，说他未收到译稿。嘱我寻找，我写信向赵青音询问，她也无法提供译稿。后来听邱季龙说，周仁生的晚年学生虞争鸣的电脑中可能有储存，辗转找到虞兄后，他将电脑中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和《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译稿给我，我以为是上下两卷的全部译稿，制作了电脑光碟寄给康兄，还自以为完满解决了。

3、今年初，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英文版两册，一对照，大吃一惊。原来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的译稿，只是《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原书第13-150页的译文，而《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的译稿，也只是《托洛

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第 215-353 页的译文，也就是我寄给康兄的光碟，仅仅是原著上卷的局部（缺第 151-214 页的译文）。《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1934-40）的译文，连影子也没有。

4、我再次请赵青音寻找，她表示一个人无能为力，于是我于 2006 年 4 月 17 日动身到温州，拟与赵青音一起寻找。到温后先见到虞争鸣，将原书给他看，询问他电脑中存有下列卷的译文吗？他说：没有见过《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1934-40）的原书和译文。唯一的希望只能到周仁生家中寻找了。

5、仁生去世后，遗物全部由赵青音保管。去年附近工地施工，打桩震坏了房子，翻修房子时，仁生的遗物经过多次搬移。其间有人建议：留下的书本和稿子，都是没有用的，当旧纸卖掉。所幸赵青音和儿子坚决不同意，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过是杂乱地堆在一起。

6、我与赵青音共同对照原书寻找，花了几天的时间，总算基本上找到了。找到的有：（1）上卷的目录和序言译文；（2）上卷的上半部分和下卷的全部周仁生译的手稿 22 册；（因为是原始底稿，上面有反复修改，非熟悉仁生字迹是不易看懂的。可能只有赵青音和我两人全部看懂。上卷的下半部分，是虞争鸣翻译的，他直接输入电脑，所以没有手稿。）（3）下卷经赵青音抄清的稿子 15 册。

以上译稿等材料，经赵青音同意，全部交给我处理。

7、因打字工作量很大，我的速度很慢，承虞争鸣答应，下卷由他请人在温州打字。

8、我于4月30日回到上海，着手整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我做的是：（1）将目录和序言补上；（2）把所缺的第151-214页的译文补齐；（3）将原来周、虞两人译文加以统稿，下半部分未在正文中标明注释的序号、一些英文缩写及人名未译出来的，尽量补上去；（4）版面重排，基本上采用原著英文本的版式。我已基本上完成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整理工作。

9、《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由虞争鸣请人打字，2006年9月22日，虞争鸣电邮寄来下卷的打字稿，因为是多人分别打字，版式不一致，且差错较多，我利用周仁生留下的翻译原稿，对照英文版原书加以统稿、校对。现已完成，但一个人的校对，难免差错。

10、整理后的上下两卷，共A4打印纸444页，相当于原先寄给康兄的三倍。包括全部正文。原书有注860条，共131页，索引25页，仁生都未译出。这些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著，以后采用全译、摘译、或不译，请康兄决定。

11、SUPPLEMENT可译为补遗、补编、外编等，周仁生开始用补遗，后来也用外编。用何名称，也请康兄决定。

2006年10月15日

##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 年》跋<sup>①</sup>

《国际事务概览 1959-196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署 1986 年 6 月第 1 版，译者曾稣黎。

“曾稣黎”并无此人。其实译者是喻守一、王国龙、周仁生（周任辛）三个人，用曾稣黎为译者姓名，是译文出版社自行采用的，是否有用意不得而知。其实出版社是认可三人合译的，因为分别给了三人稿费。

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重刑犯，要犯。托派也关在那里。监狱组织犯人从事一定的劳动，其中还有一个犯人翻译组，集中人中外语水平很高的人，让他们翻译，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当

---

<sup>①</sup> 标题为编者加

时有托派杜畏之、郑超麟、喻守一、王国龙、周仁生等人，还有外语很好的教会人士，后来定居美国的牧师杨晓阳，还与郑超麟、周仁生通讯，回忆翻译组的生活。翻译的内容是狱方给定的。

郑、喻、王、周等 1972 年释放离开监狱放到青浦、周浦劳改单位过着类似管制的生活，1979 年获得公民权，王国龙、周仁生回到温州定居。

喻、王、周三人是 1972 年以前在提篮桥狱中翻译此书的，三人的具体分工我不知道，但最后是由郑超麟校对统稿的。能否出版及如何出版，三人都不知晓。1986 年出版后，译文出版社还派专人到温州给王国龙和周仁生各送稿费，详细数目记不清了，可能每人有 800-1000 元。在当时是不少数目字了。

小周 2014 年 10 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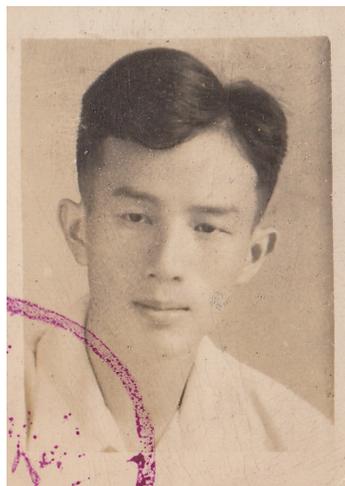




周履铨小学毕业照



周履鏞初中毕业照



周履鏞上海师专时期照，1948年



周履错钱慧初夫妇照，1949年

一家三口，1951年



周履鏞钱慧初夫妇照，  
1951年





周履鏘，1956年

一家三口，1962年



一家三口，1964年



一家三口，1971年





周履铨钱慧初夫妇，1975



周履锛全家福，1964年

前坐者：父周彦和，母徐静梅

站立者：从左到右周欣，吴秀珠，周履焯，周履锛，钱慧初，周大焯



周履鏞和他的父母、儿子儿媳，1981年

前坐：徐静梅，周彦和

后站：丁君娣，钱慧初，周履鏞，周大辉



周履鏞夫妇和儿子儿媳，1981年

前坐：钱慧初，周履鏞

后站：丁君娣，周大焯



# 书简

· 与王凡西通信

· 隔海书简

## 与王凡西通信

这里所收录的是王凡西同志从1996年至2002年12月30日逝世前写给我的47封信（可能有少数几封没有保存）。

我年青时读过连根的文章，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同志，他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代革命家，我给他的信称他“根叔”，他的来信称我为“兄”，开首惶恐得不自在，我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始终不改。后来想，这可能是老一辈的一贯作风，老先生陈独秀给王凡西的信也称他为根兄。

我给王老的信，随笔写下寄去，没有留底稿，只有少数几封，因为写得太潦草了，誊写后寄去，才留下原稿。

王老的信，竖书，繁体字。这里改为横书，简体字。个别认不出来的字用□号，可能错或遗漏的字放在[ ]内。

周履锵于2011年10月

三年前，我将老前辈王凡西给我的信整理打字输入电脑，曾给少数朋友阅读。去年一位在英国留学攻博，且专攻中国托派史的青年杨阳，到英国里兹大学寻找王凡西去世后交其保存的资料，意外发现有我致王凡西老人的信，他拍照后分两次给我，共三十多封，数量少于47封，可能只是我致他的信的一大半。现在我将之与王老给我的信配对，重新整理。原信内容照录，只更正几个错别字。这份资料也可称《王凡西与小周通信残集》。

周履锵于2014年10月

### （一）1996年8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我名周履锵，70多岁了，老朋友仍叫我小周。从李培去世后，我帮郑老做一些工作。您给他的信都读过了。不过我住得远且仍在工作，每周只能到郑老家一次，所以不能将他给你的信及时誊清，致使你有时看不清楚。

这次与世文公司施用勤先生洽谈《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事宜由郑老和我与之进行，具体联系由我做，但原则由郑老掌握。签约后，我们还送给他郑的《回忆录》《怀旧集》；并将你的《双山回忆录》和班顿的《山火》借给他；让他看《俄国革命史》和阿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等书，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我向他介绍《山火》时，说明这本书类似斯诺的

《西行漫记》，斯诺写的是红军长征，班顿写的是新四军的敌后斗争，他对我的介绍饶有兴趣。

最近施用勤给我来信，现摘录有关的几段：“王先生的《双山回忆录》我已拜读，觉得此书不仅对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有价值，对了解中共党史也是必不可少的”。“班顿先生的书我目前没有时间去读，不过，我觉得此书很有价值，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如果您与班顿先生联系方便的话，是否能请他授权出版中译本。如班顿先生同意的话，即使敝公司不同意出版的话，我可以联系其他出版社”。

请将此信息转告班顿先生。前几天你曾寄来班顿同意翻译的打印件，但那抬头写的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施用勤并不是那个出版公司的人员，而是世文公司的。《我的生平》只是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挂名出版，实际由世文公司出资并经销。《先知三部曲》也由世文公司出资经销，但挂名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所以请班顿另写一授权函，抬头直接写施用勤先生（Mr. Shi Yong-qin），授权出版中译本，版权由承印的出版社与加里弗尼大学出版社接洽。

《山火》只有送郑老的一本，现借给施用勤了。如仍有存书，请他再寄一本。

我上周给施寄去《俄国革命史》的《序言》和《译后小记》的复印件，建议他们出版《俄国革命史》。施来信说：“关于《俄国革命史》一书，我目前没有精力，待《先知三部曲》有头绪

时再考虑”。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争取出版《俄国革命史》。

这些事本应由郑老写信告诉你，怕他的字你看不清，以至误事，所以我先写就，待后天去见郑老时读给他听，他认可后附在他的信中。祝您

安健

小周于 8 月 17 日

## (二) 1996 年 12 月 19 日王老给小周信

周兄：

收到你寄来的勘误表好多天了。今天才有力气仔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好。此书如有机会再版，必须照此表改正后付排。我因终日头痛，眼力也差，此书出版后始终不曾从头至尾再读一遍。朱正指出了一些错误，你这次又指出了许多，书中也许还有错字，但相信已接近完善程度了。

你的校对很仔细。我粗心大意，脑筋又不能集中，以至错误百出。不过校对也实在难，所谓“校对如扫落叶，扫了还有”，诚然。

朱正勘误表就是你寄来那一份，此外没有了。现将原件寄回。

我躺着写的字，非常难认，希望你能看得清楚。问

好

弟根上 19/12/96

周注：1998年8月郑老逝世以前，王凡西老人与我没有直接通讯，来往书信，都是附在王凡西与郑超麟来往信中的。

### （三）1997年1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谢谢你的附信。我这里也给你拜年，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是农历年初一。孙洪伊应改为孙几伊，已通知班顿兄，让他在译稿中改正。大约在二三个星期前，寄上班兄写给“世文”公司施先生的信，谅早已收到，并已经转去了。未知对方的意见如何。班兄深知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他准备接受翻译时把一些“碍眼”的段落删去或改变。只是不愿见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他希望对方能事前比较具体地告诉他应删或应改的段落。

我身体还好，所苦的只是终日头痛，无法用脑，目力也越来越差，看书用放大镜，如果越过半小时，那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不见了。最近勉强校阅了《谢山诗词》，结果许多错字都漏校，深感不安。你若有时间，最好能再校一遍。祝新年如意

弟山上 31/1/97

### （四）1997年3月3日小周致王老信

凡西先生：

班顿先生给施用勤的信已经转去，今收到施给班兄的信，请你转交。据我所知，他们是打算出版《山火》的，而且着手翻译了。他们考虑的只是能够获得出版，一般是不会删改很多，只会在个别有碍审批之处稍加修饰而已。史实部份是不会改动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是大有好处的。

据施给我电话，《先知三部曲》今年上半年可以出版，现在已经校对完毕。经我们推荐，他们还准备出王观泉的《陈传》大陆版。待这几本书完成后，拟与之联系出版《俄国革命史》。

你给郑老的信都读到了，附给我的信也收到。我视为您对后辈的鼓励。郑老身体很好，经常要喝几杯绍兴酒，只是视力很差，他写的字连你这位老友都认不清了。

年前我去了一趟温州，见到一些老朋友，王国龙，周仁生（沈念）嘱我向您问好。祝您  
健康长寿

周履锵上 1997, 3, 3

#### （五）1997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三月三日的信，很高兴。班兄现在日本京都，尚未得他的通信地址，施君信当等他来信，并知道他的确实地址后转寄。知道《三部曲》今年上半年便能出版，非常开心。王著《陈传》（王观泉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如

能出版，当然也是好事，只是书中错字太多，事实方面亦间有不确切处，将来如能出版，当请著者把某些明显的事实误记处加以改正。

《俄革史》据以前超兄的信上说，“世文”方面认为译笔停留在“三十年代风格”。因此他们如决定出版，或请人另译，不知这看法最近是否有了改变。

所谓“三十年代风格”，据我猜想，大概见到译文中“底”字和“的”字的用法不同，以为我们的翻译也属于当时鲁迅和冯雪峰等提倡的所谓“硬译”作风了。其实我们的译法与所谓“硬译”“死译”完全不同的。

将来“世文”若终于重印该书，对我们说，自是大喜事，希望你终于能促成其事。

你编的《双山》勘误表，请复印一张给我。因香港的出版者想印一张夹在尚未售出的书中。

王、周（王国龙和周仁生）二位我记得都会过，祇是年份隔得太久，印象都很糊淡了。去信时也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有一个问题，关于连正炎的。他的事都是已故王国权告诉我的。他寄给我连的照片，写了他的生平。最初写的是连正祥，接着他来信改正，说连的名是正炎，不是正祥。但去年温州朋友翻译班兄的“访问记”时，把“炎”又改为“祥”了。不知究竟哪一个字对。有便请查问一下。问好。

超兄不另。

老王 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 (六) 1998年1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新春将届，向你拜年，祝你健康长寿。

今天我和吴孟明（独秀大姐之长孙，吴季严之侄）谈论了超老的健康情况，认为必须向你通报。

超老去年体检时，发现胆囊的肿块比过去增大，还怀疑肝区有病灶，疑为癌肿。今年元旦，发现腹泻，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第二天晓芳去请医生，医生嘱先将大便送去化验。结果发现有隐血，系胃出血。当天就住进医院。入院后全面检查，B超发现胆、肝都有肿块，周边不规则，是癌肿。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肝癌，且已转移到胃等处。依据超老的年龄和病情，既不能动手术，也不能进行放疗化疗，只能保守疗法。病情还未告诉超老，他本人要出院回家。于是请中医会诊并开了二个星期的中药，于十七日回家疗养。

在住院期间，我去看望超老时，他对我说，已写信告诉你他病了，还向你“告别”了。超老还对我说：“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老王、子春和我就是三个火枪手，快只剩下老王一个了。”可见他对本人的健康是很清楚的。我们对这位大陆硕果犹存的前辈很是担忧。但我们也回天无力。

我们现在拟做的：1、用中药保守治疗。传统中药，对一

部分癌症患者有效，不少严重的病例，经治疗，存活三、五年以上。我们希望超老能活到 2000 年；2、拟将电话功能改为国际直拨，让你们这两个火枪手能直接通话。

《记尹宽》已收到一本。

小周上 1998,1,18

### (七)1998 年 1 月 26 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铨兄：

本月廿一日收到超兄的“告别信”<sup>①</sup>，信未写完，未具名，无日子，邮戳日期是一月七日。离开现在快二十天了。日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有否进医院，是否真如他来信所说的那么严重，请你告诉我。

人不能永生，总是要死的，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贡献，而且能继续贡献，总希望他多活一天好一天。从感情上说，生离加死别，更是难堪的事。

得他的“告别信”前后，我曾有一、二封信寄给他，还寄

---

① “告别信”是郑超麟直接寄给王凡西的。1998 年 1 月，郑超麟住进仁济医院。医生和亲友，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他。可郑老心中清楚自己患了不治的癌症。于是他写了一封致相交七十多年的老友王凡西“告别信”。

从这封信开始，王老给我的信，都是直接寄给我的。

给他一本小册子，料均收到。下次你去探望他时，请问他一声，或问问小芳。信中有一封信是请他转给陈道同的；小册子（《谎言与真实》）是请他转给唐宝林的。倘二者都在而尚未转寄，麻烦你办一下。

我的毛病比二月前好得多，又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只是头痛依旧，以致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活着，实在毫无意义。年来眼见我同辈的朋友甚至小我一辈的朋友都先后逝去，真正感到无限寂寞。现祇希超兄的病尚能好起来，至少活到一百岁。

祝

新年安好

根上 九八年一月廿六日

又：《谎言与真实》是唐宝林写信给老超要的，因他见了香港杂志上的广告，怀疑这是我写的另一本批评他的《中托史》的小册子。

超兄近年写的文章，我这里大抵都有，只是我不善整理、保存，精力又差，不曾编出一个完整目录。你是否可以编一个目录？最好超兄尚有足够精力，能够和你合作编一个出来，寄给我。

### (八) 1998年3月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二月十二日寄来的“综述”与附言。我前些时被迫写了一篇短文（班兄英译的陈独秀最后论文的《前言》）。以致头痛加剧，引起其他宿疾，狼狈不堪。现在好了些，但仍无力写较长的信。

唐宝林最近托人到香港购买了一大批我们的朋友出版的书，可见他仍不相信《谎言与真实》并非针对他的。他对我有极大误会，觉得《陈研》不能在海外推销，也是我在捣鬼。其实把我看得太坏了，我批评他的著作，但我仍然看重他为陈研做的工作。

超兄病情好转，可喜也，但愿医生诊断有误，他所患的不是癌症。不过我们仍应劝他不要过劳，绝对不要喝酒和咖啡。可写与可不写的文字，还是不写的好。访问应该谢绝。他兴致好，有时难免过劳。

十二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上半篇发表在香港的中报月刊上，下半篇被腰斩。此文我以为老楼曾寄沪，但超兄说没有，日内当复印一份寄上，你们阅后盼转给道同。

头痛仍剧，信写得一塌糊涂，祈谅。问好

老王 九八年三月一日

### (九) 1998年8月11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超麟同志逝世的消息，想必你早已知晓，小胡也会将详情奉告的。

子春同志去世时，你哀叹三条腿的板凳断了一条腿，而今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超麟同志一去世，我们家里就断了主心骨，家业不兴，后继乏人，实甚可悲。今后，请你来信教导我。你年事已高，不敢企望你经常来信，但总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如一、二个月）能通讯一次，你也不要写得太多，只希望不要断了联系

你与超麟来往信件是最珍贵的，日后争取汇编出版，你给超麟的信都保存完好，但超麟给你的信没有留底，你可否将这批信复印寄下。超麟晚年的字很难辨认，我当尽力给以破译。

请你珍惜保重，这宝“根”力争长存，并能发芽结果。

小周上 8, 11

地址：上海北京西路 524 弄 4 号周履锵收

### (十) 1998年8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本月十一日的信，十七日就收到了。迟迟才复，因身体不好，又要勉强写了一篇悼念超兄的文章。悼文已草草写成，

有一份已寄小芳，复印本太少，不另外寄给你了。

超兄一死，我再没有一个与我同辈的朋友了。悲痛难免，但我最痛切感到的是寂寞。年轻的朋友当然有，但无法代替相交七十年的老同志的。

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周注：只是半盲）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

他给我的信，最初是由子春转达的，子春死后，他才直接与我通信。他的信写得很勤很好。可惜，我不善整理，也无力气整理，以致随便乱放，有的也许失去了。他、子春与我的文稿，已与里兹大学言定，交给大学图书馆保管。将来他们会雇人整理，编出目录。

《三部曲》何时能出来，时念。班顿君的《山火》，北京的朋友有否进行翻译，请便时告知。匆匆祈谅，祝  
安健

根上 九八年八月廿四日

### （十一）1998年10月12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八月廿四日的来示，早已于九月一日收到，你写的《悼念郑超麟》也已读到。记得你的《双山回忆录》序言中曾说：“想不到，我在回忆录中已写了悼文的郑超麟还活着，读到了我的

回忆录，还寄来了校对材料”（大意如此）。可如今你真的为老友写了悼文了。你的深情怀念使我感动不已。我复印几份寄给自己的朋友。

现在“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愿你珍重，健康长寿，发挥“枪手”的作用。

我已经打电话向北京施君询问，承告《三部曲》十一月能出版，班君的《山火》正在翻译。班君原先由超老为代理人的，现在超老去世了，不知班君意见怎样？是否同意由我作为他的代理人，与北京施君继续联系。如果这样，最好有班君的委托信（中英文均可），打交道就方便了。

超老晚年，半聋半盲兼半残，但仍坚持工作著述。超老去世后，他的几位侄儿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我对他们说：虽然我帮助老人做了一点事情，但我得益更多。总起来说，是“意因精神”使我受到教育。

老人走了，深感后继无人。唐宝林最近给我的信中说：“郑老去了，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动态》受郑老之惠最多，我担心从此难以维持下去，还好！由你、晓芳、王观泉、王凡老等热心朋友的继续热情支持，还可挣扎下去。”这位唐兄虽有一定的缺点，毕竟他是官方指定的学者，但他多年来从研究我们的文章，以及和郑老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情者，他所主编的《动态》，是唯一的一份倾向我们的刊物，所以宜给以支持的。就我来说，“本钱”太少，日后会使他失望。

《郑超麟晚年文选》已出二卷了，香港书店已能买到。我也已见到了样书。第二卷的后半部《鳞爪集》是首次面世的，其余都是已出版过的。《最后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收入第三卷。这三卷集的出版，完全是范用、罗浮二位的帮助。匆匆，祝您健康长寿

小周于 10 月 12 日

## （十二）1998 年 11 月 10 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月十二日的信同月十九日就收到了。一直想写回信，可是始终无力提笔。人实在太老了，是安息的时候了。超兄死了，我不曾流泪，反而觉得“羡慕”。宗教家把老人的死去称之为“释劳归主”是有道理的，虽然我绝不相信“主”，但释劳却是确实的。我是“三个火枪手”中最差的一个，郑、楼二兄都比我强健，他们二人几乎从不害病，我却是自从三十岁开始，一直为病魔所缠，特别是肺结核，每年必咯血数次。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寿限最长不会超过五十，谁知竟一挺再拖地拖到九十二岁，这真是韩愈所说：“强者夭而病者全”了！

一九九八年又快过去，希望一九九九年我有幸“释劳”去追随二位大哥于“地下”。

唐宝林先生于超兄逝世后给我来了一信，非常友好，我

回了一信也非常友好。但同时收到日本朋友转来的唐的著作《简答王凡西》，为他的三个论点辩护：1、老托确曾主张于一九一九年派兵出国去援助世界革命；2、说楼国华自称“陈独秀专家”是根据濮德志的文章；3、伊洛生与格位斯被捕乃根据喻守一的供词。他要求此文在日本的“托研季刊”发表。日友问我的意见，我不得不勉力答复。我特别纠正他的第三点，引了伊洛生遗孀和格拉斯当年在沪至交白克曼的信，他们都证明并无此事，我把二人的信译出寄给唐，请他老老实实改正错误，不要作多余的争辩。迄今将近一月，未得回音。我深知此人的长处与短处，也主张应与他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主张作过分迁就。头晕，不能写下去了，问好

弟根上 10/11/98

### (十三) 1998年11月4、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今天我接到北京施用勤电话，他们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由中央编译局出版，仍采用内部发行。而现在所谓内部发行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是公开买得到的。施要我与你联系，请你允许他们出版。你如认为可以，即给我来信。上款写：北京世文图书公司，表明同意出版，稿费由周履锵收转交你在国内的女儿。

来信请告诉你的女儿姓名地址电话等，便于我与她联系。  
 郑老去世后，很少见到郑晓芳，我和她休息日不同，很难见面。

如接来信后，我立即将你同意出版的信及我整理的勘误表  
 寄北京。

《三部曲》下月出书。

祝

秋安

小周 98，11，4 晚

以上是昨晚写的，临睡时又想到一些，再写几句。

你同意出版的信可写：

北京世文图书公司施用勤先生：

接周履鏞的来信，云你电话通知他，你们拟出版拙著《双  
 山回忆录》，我很高兴地同意你们出版。兹委托周履鏞与你们  
 签约，该书出版后的稿费，也由周履鏞全部转交给我在大陆的  
 妻子。

你如果委托他人，请写明姓名地址及联系办法。

《三部曲》出版后，施用勤要亲到上海。届时我打算向他  
 推荐《俄国革命史》，如能接受是最大的喜事。

小周又及 11，5 晨

#### (十四) 1998年11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前天勉强给你写了一封回信，谅已达。昨天接到十一月五日来函，得知北京世文公司有意重印拙作《回忆录》，非常高兴。只是我目前有气无力，没法考虑你信中所提的那些具体意见。给施君回信时，请你告诉他我同意让他们出版，倘需签订合约，请他们将合约先寄给我看看。

我过去在国内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过两本小书：《君王论》和《日记、书信及其他》。两书都由子春将稿子寄给朱正，出版后每次送了一千元稿酬，钱交给我的妻子。我想“世文”也照此办法算了，不需要什么合约，不知你以为如何。

兹先寄上《回忆录》（香港出版的增订本）的勘误表。问好

根上 十一月十二日

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必须一字不改地出版，这比稿酬重要得多。

昨天去看了医生，说我的心脏有毛病。

#### (十五) 1998年11月22日小周致王老们

根叔：

98年11月10日的信18日收到，是覆我10月12日致你

的信的。我在11月4日又给你一信，来信没有提及，估计当时你还未收到那封信。我11月4日的信是谈：北京施用勤电话通知我，北京中央编译局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希望我与你联系，能得到你的授权。过去出版是不重视版权的，如当时翻印你的回忆录，既不征求作者同意，也不给稿费。近来有所改变，不仅征求同意，还多少给一点稿费。你如还未覆我11月4日的信，请你即寄来同意出版的授权书，以便我与北京联系。这件事我也曾告诉晓芳，晓芳也告诉你的女儿了，如果由你的女儿出面与之联系也是可以的。

你是我们的“根”，千万不能有撒手不管的想法，但宜“少劳”。意因伯父没有完成“坎坷登百岁”，应由你继续下去。

祝

健康长寿

小周 98, 11, 22

#### (十六) 1998年11月2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18日收到你10日写的信，我于22日覆上一信。当天下午，就收到11月12日写的信。

当晚我就向北京施用勤去电话，他很高兴得知你同意由他们出书。现在已将你的来信复印寄给他，作为作者同意的依据。并与他们商定，由你的女儿与他们签约，将来稿费直接由她交

母亲。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你如精力欠佳，不必给我写信了。

我已写信告诉你的女儿，她曾与施君通电话。祝  
安健

小周上 98, 11, 25

### (十七) 1998年11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日与十二日寄上二信，后一信内附有《回忆录》的详尽勘误表，希望此信未曾失落。在那封信中，我主要是谈施君提议重印《回忆录》的事。我当然乐意接受他的提议。至于由什么机构出版，出版后能得多少稿费，都是小问题，甚至不成问题。我重视的只是下述二点，请转告。

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重印（当然要依勘误表改正错字），不要删节，更不要改动。

2、出版者不要加什么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者说明，最好删去。倘如某种理由必须加一短短说明，请先寄给我看看。

你就是我在国内“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如有疑难，可请他们直接给我写信。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晕更剧，心脏也有问题，手抖指僵不能握笔，字简直无法写了。问

好

根上 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十八) 1998年1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一月廿五日的信，本月二日收到，我曾于十一月廿八日寄上一信，谅早到达。关于重印《回忆录》事，照你的安排进行，很好。我在信中提出的几点意见，出版者是否均能接受，或接受到什么程度，请代向施君询问。我极希望他们真能重印《俄国革命史》。以前听说他们嫌译笔太旧式（“卅年代的白话文”），不知他们现在仍有这种想法否。

《山火》译得怎样了？班顿君想知道，便时亦请问问施君。我身体还好，只是年龄毕竟太大，身体任何部分都出现可怕的衰退，什么事都不能做，深觉活着无意义，但我并不悲观，更不会自暴自弃。问

好

根上 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十九) 1998年12月24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28日来信于12月10日收到。

12月10日来信于12月21日收到。

你以前给我同意出版《双山回忆录》的信于11月22日收到，我与施君通电话后，他很高兴，并希望将你来信有关同意的语句复印给他。后来我觉得你的那封信只谈出版的事，且信中有不要删改的条件，我就把原信复印给他寄去了。（同时我也曾复印寄给你的女儿燕祺）所以你提的条件，已明确地告诉他了。著作和翻译作品不同。凡译文，编者认为要忠于原文修改，我们是无法反对的。但著作的作者，完全有理由不允许删改的。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的。

北京世文公司出书速度很慢，《三部曲》交稿签约已二年，还未见书，最近才听说已在印刷。班顿的《山火》也仅说正在翻译中。所以我们也无法寄予快速出书的希望。

待拿到《三部曲》样书后，再与之谈《俄国革命史》，我最近重读了你与意因译的这部书的一部分，我认为译笔符合当今流行格式的。但人名地名的译法须改用现在大陆的统一译法。关连词“底”“纔”须改为“的”“才”。现在即将出版的纪德《苏联归来》也如此，我到时候会以此为例争取他们同意出版。

我写了一篇《意因同志》。我不会写文章，只是写下我的感受，请你提意见。年节快临，向你拜年，祝你健康长寿

小周叩上 98, 12, 24

## （二十）1998年12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二月廿四日的信，昨天（三十日）收到了。记意因文<sup>①</sup>甚好。我写的悼词是官样文章。主要是写给外国朋友们看的，不足观。

将来如真的能出《俄国革命史》，你提出的改动之处，我同意。“底”、“的”分开，本是好事，可惜未能为大众接受。

我近来身体非常差，帕金森症严重，写字几乎完全不行了。希望稍后尚能好转，勉强裁答，言不尽意，祝  
新年愉快

老王 九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 （二十一）1999年2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12月31日来信早于1月12日就收到了。

《先知三部曲》已经出版了，我于2月4日寄上一套，航空邮资太贵，所以平寄，估计得晚些日子才能到达。纪德的《访苏归来》也已见到样书。郑老走得太匆促了。他的《晚年文选》《访苏归来》和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三部书的油墨芳香，

---

① “记意因文”是我写的《意因同志》。香港“陈研”通讯上曾发表。

他都没有闻到。

《三部曲》交稿时，曾将你和多夫人的信及你的文章一并交给，希望能作为《三部曲》的附录。出版商强调这一部巨著的学术性，淡化政治性，如将你的文章附后，怕给出版带来困难，所以来信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我去问郑老，他说：为了便于出版，就不要加进去，但希望将你所指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史实错误作为注释放在相关段落的脚注。

北京的出版商，将直接寄赠一套给班顿。据告，班顿的《山火》正在翻译中。他们出书的质量尚好，但速度很慢。《先知三部曲》96年夏交稿签约，过了整整二年半才出书。这部书销售见好，书评也不错，可能对于研究托的思想，溅起一点小浪花。施君下月来沪，郑老不在了，只能由我单独商谈，我要根据你的意见坚持：(1)《双山回忆录》照港版一字不改；(2)《俄国革命史》的地名、人名等可采用目前大陆通用的译法，“底”“纔”等字可改为“的”“才”。因为是翻译作品，如果他们提出以原著的俄文版为准，对照校正我们也是无法反对的。施君俄文较好，他的父亲就是俄文翻译家，英、法文也能翻译，但中文可能稍逊。我们没有《俄国革命史》的原文，估计编译局图书馆各种版本都有收藏的。

明天就是兔年第一天了，向你拜年。祝你  
健康长寿

## （二十二）1999年2月1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天收到你挂号寄来的《先知》三卷，很高兴，谢谢。看邮戳上日期，二月四日寄出，今天收到，邮程快极。书印得极漂亮，略略翻了一下，觉得编排与译文都很好，此书我相信会发生好影响。

看了广告，发现一个小错误，说“格拉汉姆·格林为著名历史学家”不很对，他是一位小说家，并无历史著作，有机会可告诉施君。

去年十二月卅日收到来信，次日即复，谅早收到。重印《双山》事，有进一步消息否？重印《俄国革命史》有具体计划否？如有，盼告。

上信你说倘重印俄革史，编校者拟审定译文，这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不过我想提一个要求：如作较大改动，请与原译者商量一下。当年我们翻译此书，不同部分系译自不同文字（俄文、英译稿与法译稿），可商酌之处一定有的，但决不要把不错地方改错。我提此事，因香港有一位朋友拿英译本对照来读，发现那些从俄文译出的文字错了。其实是英译者弄错的。英译者伊斯脱曼的俄文极好，他的译文曾得到原作者称讚，但有时他不免出错，最“出名的”一个错误是把原文的“米勒朗主义”译成“军国主义”了。信写得很乱，字迹更是难认，祈谅。匆匆，

祝  
新春安好

弟西上 九九年二月十九日

(二十三)1999年2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收到你本月十五日寄出的信，十九日收到你寄来的《先知》中译本，当即奉复，谅已达览。

《先知》译、校、印、装都极好，好得大出我的预料，可喜也。此书销路大约不会差，希望能发生良好影响。

昨天翻到我曾指出著者对中托与陈所作的 unreal 之处，觉得译者所加的注太简单了！

有关《双山》重刊与《俄革史》重印事，上信已说了我的意见，不赘。

我身体还好，大概不会立即追随超、春二人于地下。苦的是头脑越来越迟钝，眼睛也不行了，看书祇要看几分钟，看上的字就模糊了。朋友还有几个，但能像你那样与超合作的朋友一个也没有，这是需要缘分的。眼花了。祝  
新年好

根上 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 (二十四) 1999年3月14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2月19日来信于2月28日收到，2月24日来信3月2日收到，今一并奉覆。

得知你已收到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我们来往的信函，还没有发现遗失的现象。过去郑老是很勤于给你写信的，他还很性急，不待我去誊抄就寄发。我很懒于动笔，常常信债欠了一大堆。郑老走了，他生前曾有意识地让我与他新交的学者来往，所以现在还要经常与这些新朋友通讯。我当然要尽力去做。

你对《先知》的译、校、印、装评价很高，我也将你的评语转告施君，同时也将你指出的格拉汉姆不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及附注的欠详告诉他。《先知》出版后，销售、外界评论很好。虽然不能算研究托的思想引起高潮，但至少可视为溅起一点浪花。施君等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商业行为，有利可图才会去做的，但对此思想的同情是有的。《双山》《俄革史》要待和他见面时商谈。许多事情，急不得的，但自然会水到渠成。

你过去译的《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我青年时读过。现在我处都没有。我考虑，如有机会应争取重版，你可否通知香姐给我一套（包括其他可出版的书）留存着，如遇机会将之再版。

《上海滩》杂志今年3月号有一篇《我在狱中替郑超麟买书》，复印寄上。

北京施君答充寄赠一套《三部曲》给班顿，不知收到了吗？  
《山火》仍无出版的消息。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99, 3, 14

### (二十五) 1999年3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三月十四日寄出的信及附件早就收到，请勿念。香港天地公司寄给我三套超兄的《晚年文选》已妥收，并已将其中二套转寄给德国的鲁道夫君与此地的班顿。你信上说北京会寄一部三部曲给班顿，不曾听他提起，大概未曾收到。

北京重印《双山》事，不知已实际进行末。我主张他们照当年内部印行的办法不易一字。能办到吗？目前我翻阅了一下“增订本”，觉得所加的“楼国华序”也许通不过，不知施君有未跟你提起。我希望重印时能保留，但若施君们觉得为难，我能同意把整篇序文删去，不赞成局部修改。关于《俄革史》的重印，以前我曾同意将“底”字换成“的”字，但仔细想想，“底”（所有格），“的”（形容词），在使意义充分明确方面，确比仅用“的”字好得多。可惜这一使汉字精密化的步骤，不曾为大众接受。但某些比较严肃的学术文字（例如冯友兰的著作），始终坚持这一改良的。将来你和施君面谈时，不妨提

议采用台湾盗印此书的办法，一字不改（台湾版只换了译者名字）排印，甚至影印。这不仅省钱省力，而且我相信，成绩会比改动后重排好得多。在外国，许多名著常有多种不同的译本，其中有好有坏，但各有特色。有的以对原著的绝对的“信”出名，有的以译文的“达”“雅”出名，读者可以凭各自的口味与兴趣去加以选择。超和我合译的《俄革史》我译的比较偏重“信”（甚至在文体上），而老超的译文是“三义”俱全的。因此，我很希望保重[留]原有面貌，算是这部大著的多种中译本之一，这态度不知你同意否。

我历年来翻译与著作的书，现在所存无几了。它们都是楼兄编订并出版的。每出一书，他照例寄一、二本给我，向外寄送与分派的事都是他一手办理的。因此我从未有过“全套”。[楼兄]逝世前不久，他把他的存书分成三份，送给香港的“三房”子弟，他们拿去保存或发售。现在这批书大概已所存无几了。你提的建议很好。日内我将去信香港，希望他们能设法寄给你一套。我自己从不重视这些书籍，尤其是自己写作的书，觉得无甚价值，（郑楼二兄曾批评我这个态度）。其中祇有《毛论》比较有点创见和新意，希望我生前或死后还有重印机会，留下一点影响。想谈的话还有不少，只是无力续写了。

祝

健康

根上 九九年三月廿八日

### 周履铎附注：

上面王老来信多封谈的是联系出版《双山回忆录》《俄国革命史》和班顿《山火》的事宜，具体经过是：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中译本是北京世文图书声像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出书时用中央翻译出版社名义，实际上是世文公司包销的），当时我们交译稿签合同，是由郑超麟主持，在郑家由我与世文公司的编辑室主任施用勤先生签订合同。签约后我们和施先生谈话时，还向他推荐《双山回忆录》《俄国革命史》和《山火》，让他看了样书。施君对此很有兴趣，表示回去后和经理商量，当时带去了《双山回忆录》和《山火》两本书。之后由我和施君联系这两本书的出版事宜，并不断向王老通报情况。王老对于《双山回忆录》的出版的要求：1、照香港的增订本一字不改；2、楼序宜保留，如果认为不妥，宁可整篇删去而不愿修改。经过约二年的努力，世文已经做好出版准备，《双山回忆录》的出版曾得中央编译局主审同意出版，《山火》也已请人在翻译了。但后来施君很抱歉地告诉我们，最后上级没有批准。我们想公开出版的努力落空了。后来施用勤先生也离开了世文公司，这些工作就再没有进行了。

数年后北京东方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是一套班子两个招牌）以内部出版的名义出了一套内部发行的书，黑色封面，俗称黑皮书。包括《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十几种。《双山回忆录》和香港的增订本一字不

差，楼序也不修改发表。原来是朱正先生将港本交给出版社出版的。据说书店一些说教式的政经类书很少有人买，以内部出版的名义反而好销，所以在书店上架出售（二年后禁止公开出售了），很热销。后来坊间出现盗版本，现在盗版是影印的，一字不错，价低买的人很多。王老的愿望达到了。

#### （二十六）1999年4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3月28日来信于4月3日收悉。

北京出版的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公开发行以来，据说销售情况良好，各方的反映也好，已经起了较好效果，在平静的水面溅起小浪花了。不过北京施君等人的速度太慢，《先知三部曲》从交稿签约，到出书面市，化了二年半时间，你的《双山回忆录》，自从寄去你同意出版的覆函后，至今仍未签约。一个多月前，我与施君通电话，他曾谈及：“《双山回忆录》不合他们出版社本身的出版范围，正在联系其他能够出版的单位”。现在还无下文。班顿的《山火》，也只说在翻译中，仍无出版的具体安排。

最近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托洛斯基著的《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en and his influence》，出版的书名译为《斯大林评传》。此书的出版，增加了出版《俄国革命史》的可能性。4月15日，是意因同志99诞辰，道同、孟明我等数人在晓芳

家聚庆，大家谈起《俄国革命史》，认为现在出版时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史》是你和郑老合译，联系、签约以由郑老继承人郑晓芳出面最合适，且她现任上海书店编辑，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项工作。

你来信谈的《双山回忆录》楼序的处理意见，《俄国革命史》上的“底”，“地”等修改，我一定照你的意见坚持。

台湾盗版的《俄国革命史》明显是影印香港版的，因为阅读过的记号残痕尚存。最近从旧书滩觅得一套珍本《俄国革命史》，版权页上标明，一九四〇年第一版，一九四八年再版，是48年你们筹款影印的。有了这个版本，就可以就此影印或重排了，否则用台湾版因改了译者姓名，还须兜圈子向出版商说明。但觅到的《俄革史》纸质已发黄，影印质量可能不好。最后采取什么方法，待以后再商定。

你已高龄，小字辈的我也73岁了。我的理论水平和能力低下，前几年辅助意因伯父做了一点工作，更多的是从他那里得到精神的熏陶，增强了信念。意因伯父去世了，现在又能得到你的指导，如能在今后再办成几本书的出版，使你再闻到油墨的芳香，我愿足矣。

我们没有见过面，今生恐也难能如愿当面请教，唯望在不妨碍你休养的情况下，多方面给我指导。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4月20日

## （二十七）1999年6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3日收到你3月28日来信，4月20日复上一信。近日未接来信，念念。

5月31日，北京世文公司经理袁亮和编辑室主任施用勤来上海，与我会晤二次。承他们告知一些情况：《双山回忆录》他们原计划出版，且已上报，年初中央编译局主审已同意出版，但近来获知，上头没有批准。据袁亮、施用勤谈，因今年适值“六四”十周年，国庆五十周年，强调安定，宣传出版抓得很紧，稍有不同观点的都不予批准。也许今年十月之后会有所松动，如果加入世贸组织，出版方面也会放松。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愿望，究竟怎样只能待以后再说了。

袁、施一再表示，《双山回忆录》一定要出版的。我也再次转达你的意见：①同意出版；②我可以作为你的代理人与之联系，如获出版，稿酬全部交给你的夫人和女儿；③照港版一字不改（错别字除外）；④楼序如放进去会影响出版，宁可删去，不同意删改后保留局部。他们同意我转达的意见。

《三部曲》销售情况甚好，已售出五千套。他们前年出版的《我的生平》已销售一万套。由此可见，已发生了良好的影响。由他们出版，这样的质量和影响，都是我们原先计划的自筹经费所无法达到的。

我已将班兄的地址给施君，他回京后即寄《三部曲》，并

会写信告诉班兄《山火》的译事经过。

寄上陈独秀的墨迹“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复印件。是吴孟明和我商量后寄给你的。孟明是独秀大姐之孙，吴季严之侄。他对郑老很好，我们常见面，他对你也很崇敬，并十分关心你的健康。陈独秀题字上落款为甲原先生。我们不知道甲原先生的生平。孟明说你与独秀住在武汉时，你可能就曾住在甲原先生的寓所，如果如此，盼告知其生平。

小周上 1999, 6, 15

### (二十八) 1999年6月2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六月十五日的信，四月廿日的信也早已收到了，迟迟未复，因为我所患的诸种疾病近来突然加重。头晕得无法走动，甚至不敢起立，书不能看，字更无法写。以至信债累积，让亲友们担心。现在吃药静养，希望尚能有所好转。

得独秀遗墨的影印，欢喜之至，此事本有很多话说，目前只能算了。吴甲原是我的小同乡兼朋友画家，他和丰子恺一起开过画展。我当年和他□往，在《回忆》中曾□略提及（见《双山》第270页）。写不下去了。等我精力好转后给你写详细的信。问好

根上 22/6/99

周注：此信可能是王老在病榻上书写，很潦草，字体难辨认。

### （二十九）1999年7月22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30日收到你6月22日写的信。读到你病中艰难地写下的短信，使我既感动又担忧。后来我将你的这封信复印寄给燕祺。她收到后来信说：多日没有收到你的信了。

记得楼叔去世时，你给超叔信中写道：三条腿的板凳断了一条腿了。去年你以三号火枪手的身份向一号火枪手祝寿，祈望他长寿，现在一号火枪手也走了。三条腿板凳变成了独木桩，三个火枪手也只剩下一个了。但愿独木桩深深扎根土中，毫不动摇竖立着。

意因同志逝世快一周年了。7月19日，晓芳护送他的骨灰回漳平，与贞婶、弗来合葬。我们四、五个老友目送灵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火车徐徐启动，渐渐远去，我们久久地站在月台上，感慨万千。

你曾经告诉我，已嘱港友给我寄能收集到的你的著译，但始终没有收到。请你在能执笔的时候，再写信通知港友，并请加寄一册《谎言与真实》。

祝你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 99, 7, 22

(三十) 1999年9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廿二日的来信同月卅日就收到了。当时我的毛病突然恶化，未能作答。八月间病情好转，但写字还是十分困难，以致信债山积，直到最近才能开始逐渐偿还。

你想要的书，香港朋友误会了我去信的意思，将二册《毛论》与《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寄给了我。我曾去信要他们改寄，不知他们可曾照办。不管怎样，等我身体再健朗些，预备寄几本给你。二个月前我曾请香港朋友寄二册《回忆录》给我的侄孙女（在海宁），未寄到。听说最近邮检极严，希望国庆后能放宽些。

超兄的信已请人复印了最早的一、二十封，预备寄给晓芳。

北京重印《双山》事有消息吗？头晕手抖，写不下去了，再谈。问好

根上 28/9/99

(三十一) 1999年10月3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9月28日来信10月8日收到，得知你身体稍有好转，我

们都为你的健康长寿祝祷。超伯的百年愿望，盼能由你这位三号火枪手完成。

此前晓芳曾转告你的健康好转的信息，后来她又告诉我，她的丈夫小胡近日去英国见到你，说及你近日跌伤，又增加了几分耽忧。你远在海外，我们毫无办法帮助你，照料你的生活。超伯晚年，我或多或少的帮他做些工作，也尽力之所及照顾他的生活。对你，我只能说几句祝愿的空话了。

《双山回忆录》的出版拖下来了。前几年大陆出版了许多反科学的“法轮功”之类的书籍，现在当然要大力整顿，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价值的书也受影响了。目前仍无放宽的苗头。

北京施用勤告诉我，他已给班顿寄去一套《先知三部曲》，并有一封说明《山火》翻译进度和出版计划的信给班兄，不知班顿收到了吗？

寄上“中华读书报”的《吹胡子瞪眼的老头》，作者康慨，但不知是何人。估计是一位中年人。大陆有一批现年六、七十岁的学者，现在又出现四、五十岁的中年同情者。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10月 31日

### （三十二）1999年11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十月卅一日寄出的来信，很高兴。小胡说我近日“跌伤”，这是误传。我近来身体不很好，但不曾“跌倒受伤”。班顿已离开里兹大学，现在斯干地那维亚半岛旅行。北京施君寄给他的书，是否收到，等他回来问他。《双山》不能出版，憾事，希望过几时情形会有所改变。

老超真有福，先后能有李培和你做他的合作者，让他在失明（周注：郑老只是视力极差，并未失明）后还能写出大量文章。我的眼睛还能用，只是头脑不行了，无法写系统的文字。偶有感想，随便记下一点，凡年来已积有十几万字。子春生前曾拟将这些札记出版，谁知他先我而去，这些稿子只好付之一炬了。本来你可以帮我这个忙的，可惜“天南地北”，无法合作，真是憾事！

你前几次来信所要的一些书，我早已转告香港朋友，请他们寄给你，不知他们可曾寄出，你有否收到。最近我又去信，要他们寄一本《谎言与真实》给你。你收到，盼告。

你可能知道，由子春推荐，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我翻译的二册小书：《君王论》（帝王术）与《日记、书信及其他》。当时子春是与朱正接洽的。朱正现已离开那个出版社，但仿佛仍旧经营出版事业。你与朱正有过什么联系吗？如有，并且知道他的地址，请代询问一下：是否尚有存书，以及出版者是否

准备再版。

我有几个熟人想买那本《书信、日记……》。《君王论》则印错得一塌糊涂，如能再印，必须重新排版的。不过有人告诉我，这本书印了九万九千本，在内地居然成了畅销书！未知确否。

今天精神略好，乱七八糟地写了许多，希望你能看得清楚。

问

好

老王 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 （三十三）1999年11月2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十月卅一日信后，曾复一信，谅早达。昨天班顿兄的前妻来，告诉我北京寄去大学的《三部曲》，已由大学转送给她了。望便时告诉施君。目前班顿在斯干地那维亚旅行，无一定地址。

《双山》不能出版，憾事。希望不久能“放宽”。

早几日你寄来独秀给吴甲原写的字，不知你是怎样得到的。盼告。我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如果体力能回复的话。此事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吴求独秀写此字时，我们正准备到军队中去也。（参阅《双山回忆录》有关段落）。

我身体还好，只是离能工作的程度尚远。也许根本不能再工作了。问

好

根上 27/11/99

### （三十四）1999年12月2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11月10日来信已于11月21日收到，11月27日来信12月7日收到，很高兴得知你“跌伤”是误传。

现在就你信中所询写一点。

老先生给吴甲原写的字，原件藏上海档案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藏刘海粟美术馆），《档案与史学》发表了这幅墨迹，我就是从这本杂志复印下来的，据吴季严之侄吴孟明说，他曾见过原件，颜色尺寸与复印件相同，竖写的日期二六年三月二四日，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为三月老先生还在狱中，老先生写的“三”字，上面一横偏左，实际是一、二两个字，即十二。是老先生的习惯写法。你如能写出文章请寄来，我努力争取使之发表。

超老晚年除写了大量文章，还结交了一批正直的学者，通过他们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逐渐还我们的历史真面目。超老的作用是伟大的。我接替李培帮他做些工作后，他觉得满意，对我也信任，所以有意识地让我与他结交的新朋友接触，因此在超老身后，尚能与部分学者联系。昨天我给朱正去信，询问能否买到你的《日记、书信及其他》，请他寄给我。

如果是英国朋友想买，我就寄给你，如系香港的朋友，请告知通讯处，我直接寄去。

你十日来信，谈到子春生前拟将你的偶感集出版，现在只好“付之一炬”了。我想太可惜了。所以我在给朱正的信中，请他帮忙出版此册。为了引起朱正的重视，我特地将你的来信复印附寄。现在有了复印技术，请你通知香港朋友或子春的后人，将你十多万字的偶感集复印寄给我保存，即使一时不能出版，多一份底稿也好。真的无法出版，也可电脑排版少量散发朋友。我的意见你以为如何？

你所问的陈良初、陈镜开都是我们的人，年龄比我少一、二岁，当年跟我一样是SY，也曾历经苦难。俩人以陈镜开较好，他们俩和温州另四位朋友，去北京参加十二月初开的一次“陈独秀研究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听说这次会议开得不错，对陈独秀是全面肯定的。但当局对研究会仍取淡化态度，消息也不见报。

到今天止，我还没有收到香港朋友寄来的书。

2000年元旦将到了。大陆是将这一天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始。

祝你健康长寿，写出更多有份量的短文。我虽不能像与老超相处那样随时在你身旁，但可经通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三十五) 1999年12月1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上月十一日寄上一信，谅早收到。

班顿兄因奔母丧，昨天从北欧回来了。见到北京施用勤先生寄给他的书和信，非常高兴。他原想立即写信给施先生道谢，并回答来信所提的问题，因办理丧事忙，他要我代他写封回信。

我近来身体还好，只是精力似渐趋耗竭，写字与用脑都非常困难，将此事转托给你，请你代他去信道谢，同时请告诉施先生，他无法编一份《山火》书中中国人姓名及中文参考书目的中英文对照表，原因：1、所有资料都放在里兹图书馆储藏室里，无法取用；2、他已不在里大任教，下学期他将改就威尔斯大学教职，变动期间，无法做此工作。请施君谅解。

请将上述种种，转告施先生。

又，请你告诉我：老陈给吴甲原题的字，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话还有不少，气力用完了，就此祝你

新年如意

根上 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六) 2000年1月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2月13日来信于22日收到。恰好我于21日给你写上一信，谅早已收到。我收到13日信后，立即给北京施君寄去一信，

将班兄所嘱转告，12月30日接施君电话，嘱我向班顿先生问候，班顿无法编人名索引，就算了。我询问《山火》何时能出版，施君回答，2000年内有可能出版，我又问《双山回忆录》之事，他回答暂时还无出版的希望。

我拟再向东方出版社（出《老超回忆录》和《怀旧集》的出版社）推荐出《双山回忆录》，多方试试看。

我向朱正写信，请他代购《日记、书信及其他》，并询问能否出你的随笔集（楼生前拟出的）。朱正已来信，请你将十几万字的文章复印寄他，找机会出版。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将朱正来信寄上。后来朱正又给我贺年卡，并告已找到一册《日记、书信及其他》，要我将你的地址告诉他，直接寄给你。今天我给朱正写信，他会寄上的。

请你通知子春的后人，将你的文章复印寄给我，我再将复印寄给朱正。我如能促成你的文集出版，将是最高兴的事。

专此敬祝

2000年新禧

小周于2000年元旦

（三十七）2000年1月16—2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去年十二月廿一日来信早收到。迟至今天才能作复，因为身体不好，写字困难，更不能用脑。今晨头脑比较清醒，想简

单说几个你来信提及的问题。1、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不是二六年。“二六年”指的是“民国”廿六年，不是“公历”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住在老先生的家里，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年青朋友（吴所认识的），也乘机求他的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临时作的，反映出他当时设法让我们进入军队去实际参加抗战的意愿。（此事可参阅我《回忆录》中有关段落）。本来，为此我可以写一篇文章，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2、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小书是我的一个朋友想要的，因为他最近看了《从苏联归来》，想重看一下纪德的日记（他知道我这小书里译的有纪德在二次大战时写的日记）。我有意请出版社重印此书。等朱正将此书寄来后，我会转寄给我的朋友。3、我曾请香港朋友寄几本旧书（子春以前印的）给你，可是港友来信说，这些书大多已绝版了，实在可惜。我手头每种都祇有一本，不舍得寄（尤其因为目前国内邮检太严，寄了怕遗失）。《谎言与真实》我有二册，想寄一本给你。（写到这里，头晕，暂停）。（以上一月十六日写的）。

大前天写了一张纸，停了，前几天无法续写。今晨，头痛稍癒，想把它写完，谈谈我的札记的事。从一九八九年二月起直至一九九五年三月止，我曾经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

记。因为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完全没有力气写比较郑重的文章，但世事多变，脑子里感想极多，闷积在胸，不吐不快，于是在子春的催促下，我以日记方式，写了一些看报或读书的感想，随便想到，随便记下，无论内容或文字都无什么可取之处。因此从未示人（除子春外）。也从无身后出版的打算，写到九五年三月八日子春谢世，我就不写了。在这以前，子春曾将我写的极小部分复印寄给老超，他看了发生兴趣，来信反对我将它焚毁的打算，并就某几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来信与我商榷。不过我始终不曾切实考虑将它付印的问题。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将遗下的文稿，才又想到这批札记，朋友们都反对焚毁，有人还肯出钱付印，但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因其中有些确无价值）。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他替我编定的《书信、日记……》编得极好，将来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出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废稿还能与某些读者见面。（这张纸是十九日写的。希望明天早晨能写完寄出。）

前天又勉强写了一张纸，略谈《札记》的情况，今后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好转些，拟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札记》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管了。

老超真有福，先后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合作者，使他晚年写

出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

有太多的话想同你讲，只是力不从心，写字实在困难，只好算了。祝你

身体健康

根上 二〇〇〇年一月廿一日写毕

周履鏞注：王凡西老人 2002 年 12 月 30 日逝世。我始终没有收到他自己“拟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的《札记》复印件，也许他根本无力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找到《札记》原稿下落，我写信向班顿询问，他回信说：王老去世后，他已将《札记》寄给香港的朋友了。既然已有着落，我就不管了。

2003 年下半年，香港朋友寄来王老《札记》手稿复印件和打字复印件，因为王老的手写字体特别其中有几页郑老给王老的信上的字很难辨认，寄来要我校对。这是我应做的工作，我完成后寄回香港。后来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这本札记，书名《王凡西晚年札记》。称纪念本，每册还编号，我得到的是 03 号。王老的这件《札记》终于能被少数人读到了。

我谋求在国内出版，将札记手稿和纪念本复印一份，并摘录了上信中有关的段落写信寄给朱正先生。朱先生回信说：看来王老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们二人了。现在要出书必须审批，像

王老的札记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他又说：可惜得到太迟了，如果早些时候得到，我可以将之作为黑皮书《双山回忆录》的附录不经报批发表。现在只能待再版时视情况决定了。

### （三十八）2000年2月1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1月16—21日化了五天时间写成的三页信于2月1日收到。

首先，向你请教一个问题。《郑超麟回忆录》英文版第165页 Figure 22 照片所注姓名：从左顺时针方向，王凡西，格拉斯，Hua Zhenbin, 寒君，陈其昌，蒋振东。这则注是否正确？也就是你是否是左起第一人。Hua Zhenbin 的汉名是什么？

老先生“公理与强权”发现很有价值，你是最有资格，也是唯一的能写一篇文章的人，你多次来信是有意写一篇的，我们企盼能够读到你的文章。但这次信中说：“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我们远隔万里，否则由你口述，我代你书写。现在我打算，根据你来信所谈并参考《双山回忆录》，写一短文，着重说明老先生出狱后对革命前景是很乐观的，并还积极从事活动。至于题字所深含的哲理，我就无力阐述了。

早年保留文稿，只能手抄。现在有了复印技术，就很方便。你的时论札记，由你亲自删订，然后复印寄来。如果你暂时无法亲自整理，也可将所有原稿复印寄来给我。计划出版，这是

我的一厢意愿，以目前的情况，困难重重，能否如愿，都是未知的。我尽力去做，能达到什么程度，待以后再说了。

你所说查找一九三一年或三二年申报自由谈的资料，当尽力寻觅，待查到再奉告。

寄上二篇文章。

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超老回忆录第三版后，超老曾去信建议出版《双山回忆录》，但一直没有回音。世文公司拟出版，也未获批复。东方出版社是中央出版单位，实际就是中央人民出版社，不过出“内部参考”书籍用东方出版社的名义。近日我又向东方出版社写信，询问有否出版《双山回忆录》的意向，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祝你  
健康长寿

晚辈履锵上 2000, 2, 11

### (三十九) 2000年2月26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尊前：

朋友们都祝贺你在新的—年健康。

我们远隔重洋，无法能似跟随意因伯伯那样时常接受教导，不过我还是能够经过书信，受到你的许多指导。

关于陈独秀给吴甲原的题字，我想根据你的来信及参考《双山回忆录》，写一短文，着重说明两点：1、老先生对革命前

景的乐观；2、传播进行抗战活动。致于题词深含的哲理，我实在无能力阐述。

北京施君来电话，请班兄写一篇序，请你转交我给他的信。

《先知三部曲》出版以后，社会效果很好，最近北京一份书评中，被评为十本最有价值的书的第七册。但对译者的经济效益却是极差的。出书一年了，至今还未收到稿费。好在我们为宣传革命思想出书，从不计较稿费的。至于出版社给原著者的代理人，更不会支付报酬了。请你口头将此告诉班兄。他的《山火》的原著报酬，也许会如此，此是大陆的现况，是无可奈何的。

祝

健康长寿

小周 2000，2，26

#### （四十）2000年2月2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二月十五日的来信收到多日，无力详复，只能回答你提出的几个简单问题：1、照片上左起第一人是我。Hua Zhanbin 的华名为华振彬。他不是临委之一，是负责印刷的。2、你能根据我们的通讯，写短文，在《陈研动态》上发表，很好。只是我想知道，吴甲原是否尚在世，这张题字怎么会落到档案库，是否甲原曾因事被捕，这张题词是罪证之一？万一甲原仍健在

（他比我小四五岁）。当年又确曾因此而被捕的话，那末写文章重提此事是否合适，需要考虑一下。吴祇是我的同乡兼朋友，他不参加任何政党。他只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我与他在汉口重叙时，是平汉铁路管理局的一个职员。3、你如写了文章，最好先寄给我看一下。4、靳（靳树鹏）的文章很好，有关易洛生的文章，早有人寄给我了。

乱塗一起，希望你看得清我的“蝌蚪文”。

祝

安健

根上 二月廿九日

朱正寄给我一本我译的《日记、书信及其他》，又送我一  
本他的近作《小脚、辫子及其他》

——三月二日补记。

#### （四十一）2000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寄上班顿为《山火》中译本写的小序与有关的人、地名的中英文对照表，请转寄给北京施君。

他要我给他写序，我现在连写短的字条都不行了，当然办不到，他自己写的序可用。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寄给我一本十九期《陈研动态》和一本

书，无力写回信道谢，迟几天也许会给他写一封简短的信。

问

好

根上 三月十二日

#### （四十二）2000年3月1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托人（因我无法出门）寄上班顿序及人、地名的中英文对照表，料已收到。今得他的来函，嘱改动他序言的最后几个字。兹将来函寄上，请一并转寄给施先生。

根上 三月十三日

#### （四十三）2000年3月2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29日来信3月11日收到。3月12日、13日来信于3月23日同时收到，所附的班兄的序、人地名中英对照表都收到，我已于24日寄给北京的施君了。据来信所述，班兄的《新四军》是不同于《山火》的另一本书，且已有中译本，但我没有见到。

老先生赠甲原的题字，我据你的来信，参考《双山回忆录》，已写了一篇短文，请你删改补充后寄回。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2000，3，29

你的蝌蚪文，比伯父的甲骨文好认得多，我都能够认出来。

(四十四) 2000年3月3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二、十三日寄出二信，内附班兄的短序与他给你的信，料早收到，并已将序文转寄给施君了。

序文他本来要我代写的，因我精力耗竭，无法应命。因此他自己写了。

有关老先生给甲原题字的文章，你写好了没有？前信请你写好后寄给我看一下，原因是怕一不小心，可能给吴君添麻烦。现在我想，祇要你文中说明吴与我仅是同乡与朋友关系，他主要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就不会有问题，不必先寄给我看了。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寄给我一期《陈研》（第十九期），内容相当好。你的文章，我想可以寄给他。听说任建树的那本《陈独秀大传》很好，我已托港友代购，你可能已见过。头脑昏昏沉沉，不多写了。

问

好

老根 三月卅日

(四十五) 2000年4月5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天收到三月廿九日的信，很高兴。文章很合适，我想可以寄给唐宝林，大概他会将它发表在《陈研动态》上。

文章略需补充（很少），因我这几天牙痛，影响精神，无法把一二补充意见写出来。

决定在二三天内一定把文章寄还，望勿念。

班兄的《新四军》是最近出版的，内容紧接《山火》，未有中译计划。（全书共九百多页）。

匆匆。祝

安好

根上 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

(四十六) 2000年4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发一简，料已达。今晨头脑比较清醒，重看了一篇你的文章，提了一点修改意见，此外有关吴甲原的事，改写了几句。

我想此文怕祇能发表在《陈研动态》上。

听说任建树写了一本《陈独秀大传》，你见过吗？再谈。

根上 四月七日

第三页第四行那句话，可改成如下：

给吴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这是在新的局势中，重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强调的“公理与强权”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反映他……（可能无力写下去而搁笔了）

#### （四十七）2000年4月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寄还文稿，料已收到。寄出后，觉得关于公理与强权的说明，很不够。兹再补充几句。

公理与强权二者的关系问题，老先生早在五四前后就思考过了。最初，协约国战胜了德意奥同盟，他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后来，协约国在巴黎和会表现出“强盗分赃”的丑恶行径，特别在山东问题上，决定将原由德国霸占的种种特权不交还中国而交给日本，他便对协约国的“公理”大失望，因而觉得公理没有强权便成废物了。

一九三七年的题字，事实是继承着一九一九年的经验和觉悟的。

如何把这些意思加进去，你决定。我现在连想写一句通顺的句子都困难。问好

根上 四月八日

周履锵注：陈独秀的题字：

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 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

这幅题字现藏上海档案馆，曾作珍品展出。1994年在其馆刊《档案与史学》第3期影印发表，并注明：1937年3月陈独秀在狱中题赠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我和吴孟明看到后，对其“注”存疑。吴说，当年他和舅公陈独秀住在武汉，有不少人向他索求题字，又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谈及他的朋友吴甲原，莫非甲原先生就是王凡西的朋友吴甲原。为此最好向王老求证。于是我将原件复印寄给王老。经过多次通信，确证这幅题字是1937年12月陈独秀在武汉时题赠画家吴甲原的，当时王凡西亲在现场。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经王老修改后发表在《陈研动态》第20期上。《动态》是内部刊物，发行面不广。我又将此文补充后寄给《档案与史学》，2000年该刊第五期刊发了此文。香港陈研《通讯》曾转载此文。

（四十八）2000年4月2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5日来信于15日收到，4月7日的来信和寄还的小文《公理与强权》于16日收到。我根据你的补充意见，改正重抄后于4月19日寄给唐宝林。文后又收到你4月8日的来信，因为稿已发出，我只得将你的来信手抄一份，将你提出的老先生早在“五四”前后关于“公理与强权”的思考补充内容，并

寄给唐宝林，请他补上去。至于如何加上去，我提出二种办法：1、加入你去年11月21日来信中，2、文后附加。究竟如何处理，只能由他了。

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作者赠我一册。因伯父生前，有意识地让我和他新交的朋友来往，所以伯父去世后，我尚能与朱、王、靳、任等人保持一定的联系。我得到《大传》后仅大略地翻阅，尚未仔细阅读。初步印象，觉得作者有所进步，但也有人反映，任写的没有王观泉的《陈传》那样大胆。你如果需要这本书，请告知，我当购寄。

我的学识能力有限，只能做一些具体细微的工作。如果能在你身边，也许如同我帮伯父一样为你服务，可惜关山遥隔，无能为力。

你著述困难，但从你的来信看出，你的思维仍很敏捷清楚，逻辑条理都很强，相信你还能写出有份量的篇章的。

以前你说的拟将杂文随笔，整理后寄给我保存，待机出版。你如果亲自整理有困难，可否将未整理的文稿全部复印寄给我，由我整理后再请你亲自审定。

《公理与强权》已寄《陈研动态》，我还打算投寄发行量较大的公开刊物，如能如愿，影响就大了。

《陈研动态》和唐宝林本人有很大的进步，大陆还出现一些较年轻的“陈独秀研究者”，他们思想上没有框框，写出来的文章很有深度。例如陈奎松（不满50岁的研究员）写的《陈

独秀和共产国际》，写得很好。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祝你

长寿

小周于 2000, 4, 25

#### （四十九）2000年5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铨兄：

收到你上月廿五日寄出的信，有关陈给甲原题字的说明，如能在《动态》上发表，我想已经够了。

唐曾寄给我第十九期《动态》。收到了两个多月，始终未能仔细阅读。原因是终日头晕，目力又大大退化。用放大镜看书报，竟不能持续十几分钟。前天精神略好，勉强读了唐宝林写的《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一文，非常欢喜。觉得他在党史研究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讚扬。本想直接给他写信，聊表我的喜悦，只是写作万分困难，只得算了。希望你下次与他通信时，转达我的喜悦，更希望他在继续研究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能于当年联共中央有关中革问题的二派分歧，能多少同情反对派的立场。

任建树的书我已托家人购买了。

前天寄上《托致伊罗生的九信》，已收到末？你若已有此书，收到后转送给王观泉。

题为《谎言与真实》的那本小书你有吗？此书唐宝林曾误

会是攻击他的。其实只是超和我与老彭之间的一些争论吧了。此书我这里有多余的一本。你如想看，盼告，即当寄上。

问

好

根上 五月七日

信写好，没有人来替我投邮。今天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再写几句。你那里有我翻译的《日记、书信及其他》这本小书吗？这是朱正替我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纪德的日记。现因《从苏联归来》一书的出版，而引起对纪德的注意，我想请朱正设法重印此书，你觉得如何？假使你赞成，请你写信给朱正，问问他的意见。

五月八日晨

#### (五十) 2000年5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谎言与真实》，我曾在意因伯父处读到过，我还读过你写的评陈碧兰的几篇文章，也曾读过李福仁的有关几封信和文，但我没有收藏。意因伯父走了，想重找时很不方便，所以我想有一册在手，请你将多余的一册寄给我。

你身边连一个替你寄信的人都没有，你的生活困境由此可想而知了。我与你远隔万里，更有国界阻断，完全无法相助，唯祝你珍重。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5 月 20 日

(五十一) 2000 年 5 月 30 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本月廿日发出的信，大前天就收到了，极快。得知“九信”已寄到，很高兴。

黄昌勇是上海同济大学文化艺术系的教师，一年前他在陈西滢的女儿（复旦大学的教师）那里得知我的地址。来信问我一些有关王实味的问题。现在他已写成出版一本《王实味传》，朱正给它写了序。

第十九期《陈研》上唐宝林的文章，在他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否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即能否因此而承认在中革问题上，证明托是而斯非，我是怀疑的，甚至肯定，他多半不会走此一步。相反，他可能更向右转，变成十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陈独秀晚年思想作更右的诠释，更右的“发挥”。

在同一期《陈研》上，有一篇陈铁健的文章，竟说“四一二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而是反共清党政变”（见该期 41 页），这样的见解（“反共不是反革命”）公然为屠夫蒋介石“平反”，真太不成话了。

《谎言与真实》日内当托人付邮。

问

好

根上 五月卅日

(五十二) 2000年5月□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5月12日收到寄来的《给伊罗生的九封信》的小册子，其内容我曾读过，但没有收藏此完整的册子。此次我又得细读了你写的《几点感想和说明》，对伊罗生其人有了较深的了解。年初我向刘乃光去信，请他给我寄《中国革命悲剧》，一直没有收到。最近刘乃光来信告知，他于2月22日给我寄了《中国革命悲剧》和《俄国革命史》。三个多月没有收到，估计被“好心人拿去保存”了，奈何！

5月5日收到唐宝林5月3日来信，云：“《动态》一校出来时，收到《公理与强权》稿，即尊嘱换上，现又补上王老的一段话，请放心。”至于你补上的一段话如何加进去，只能看下期的《动态》。唐来信又说：“我们更希望您和周围的托派朋友，多写一点回忆录。郑、王、彭能写“大”的回忆录，你们也可写点点滴滴式的；‘小’回忆录。《动态》特别需要这类稿子。”这位唐兄进步很大，他主持的《动态》对陈研的推动很有贡献。他搞的研讨会也很好，由“讲座”、“肯定历

史作用”、“陈与共产国际”、“推翻陈对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每次都逐步深入，下一次又转入“陈的晚年思想研究”。在陈研的队伍中，还发现年轻的人，是可喜的现象。不过大陆对“托研”还没有开展起来。

(传来的只有这一页，至少还有另一页。)

### (五十三) 2000年6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8日收到你5月30日来信，6月15日又妥收《谎言与真实》。我有此书，朋友想阅读就方便了。

我另外读过你未收集成册的文章，有批判陈碧兰回忆录的，包括李福仁给你的几封信。还有你揭批胡志明的文章。超伯去世后，借阅很不方便。在不影响你健康休养的情况下，请复印惠寄，以便友人传阅。

你5月30日信尾说：“字写得更加糊涂，希望你看得出来大意”。请你放心，我不仅看懂大意，是百分之百的认得出来。我理论水平差，文章写不好，外语也一般，但识字能力尚可，超伯晚年写的字那么难认，我也大部份能“翻译”出来。

《陈研动态》20期收到了吗？该期发表你的《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写的《公理与强权》也发表了。唐宝林稍有修改，第二封信拿掉了，你后来的补充意见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信中。《动态》上还有一篇《许俊千邀陈独秀作抗日

演讲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你当时正在武汉，一段日子住在老先生家里，也许认识许俊千。你对这篇文章评价如何，我设法与许俊千之弟联系，转达你的意见。

祝  
长寿

小周上 6月20日

#### (五十四) 2000年6月1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七日寄上一本小书《谎言与真实》料已收到。这本书曾被唐宝林误会为是批评他的，因此他曾写信给老超，说我欠缺“雅量”。为了让他放心起见，我曾寄一册给老超，要他转给唐，但超没有寄给他，祇写信告诉唐，此书与唐无关。此事经过你想必知道。超不愿把书寄给唐，理由想必是“家丑不要外扬”。其实我觉得此书所谈的种种对中共与中托史的写作是有帮助的。

任建树君的《大传》已由我的家人买了寄来。我无力读这样一部大书。不能仔细研读，很可惜。随便翻了一下，觉得有些小错误，例如把李福仁说成是“美国人”，把“西流”说成是何子瑜的别名……等我精神转好时，拟写出来，请你转告作者。对陈与托的一般态度，任比王观泉差些，但比唐好些。

《毛论》你见过吗？我自来所写的东西，比较满意而又觉

得有价值者，祇有此书，但非常可惜，它从不引人注意，捧固无人，连骂都不曾听到过，唯一曾经给它以好评者，祇有适夷与李锐耳。再谈，

祝  
康健

根上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四日

#### (五十五) 2000年7月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廿日的信收到好多天。第廿期《陈研》也早收到。唐发表《强权与公理》及《让人家去说吧》二文时所加按语相当友善，可喜也。

《谎言与真实》能寄到，很高兴。此小书我手头现在祇一本了。香港《先驱》朋友那里也许还有几本。老超不主张将此书寄给唐。

与老彭夫妇辩论的几篇文章和信，曾由老楼印了极少几本，题为“不得已的答复”。此小册我这里祇有一本了。倘你或其他朋友有兴趣，拟托人复印一册寄上。只是何时能印出来，不知，因我无力去复印铺子，必须等伦敦朋友来访时代办。

许俊千代表华中大学学生会邀请独秀演说事，发生在我到达武汉之前一、二个月。我不曾见过许君，也不曾听独秀谈过此人此事。

最近你与北京施君有来往吗？如通信，请问问他那本据说业已编好的《双山》，是否有出版与出售可能。

祝  
健康

根上 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

#### (五十六) 2000年7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14日来信于6月23日收到，7月3日来信，也在昨天收到。信函来往，一般十天左右收到。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信件书刊遗失现象。

你寄《谎言与真实》，请意因伯转交唐宝林，当时我是知道的，伯父不愿意把书寄给唐，只是写信告诉唐宝林，此书与他无关。后来听说，唐仍不放心，他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这本书。

伯父的港版三卷《晚年文选》，所有编目都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与小濮的论争，与羊牧之的争吵，都选进去的了。唯独不选与彭述之争论的文章。另一册重要的《回龙坞待访录》也没有编进去。伯父生前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收这二册重要的文章，他对我说：《待访录》的许多内容，我已写进《最后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而且后者更成熟，所以没有必要重复了。《谎言与真实》与老彭争论，毕竟是“自家”的

事，不收进了。他的态度跟不愿寄此书给唐宝林是一致的。至于更深層次的思考，他没有详谈，我也没有细问。伯父晚年对大陆仅存的人，已不以多少划分，例如他对周仁生和我很信任，我们对他也很有尊重，尤其尊敬他在那样处境下的坚贞不屈。此事也许跟他在狱中的亲身体验有关，因为在狱中批斗他最兇狠的，是少方的几个人。其他的人大都只动嘴不动手。

《陈研动态》第十九、二十期的确很好。唐兄是有进步的。伯父去世后，他当然很想得到你的支持，你如有可能寄文章或资料给他（也可由我转）。唐也曾给我来信，希望写些文章，可惜我水平太差，写不出像样的东西。

你写的几篇批胡志明的文章很有价值，迄今为止，胡的形象是一位慈祥的老伯伯。你的文章使人看清胡的真面目。如有机会，请人把这些文章发表出来。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7，15

### （五十七）2000年8月2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七月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不能早复，憾事。我身体还不算最坏，只是年纪毕竟大了，精力与气力都将近耗竭，勉强处理日常生活，便无余力做别的事了。

你信中提及的几篇旧稿，早已从故纸堆中找出来，只是无人给我拿出去复印。今天难得有位朋友来看我，请他拿出去复印了一份，另封寄上，收到后盼即来信告知，以便再寄你想要的另一篇有关胡志明的文章。

任著《陈大传》勉强翻阅完了，材料很丰富，文章也写得很好，只是他的整个态度，还是偏向老斯的。在这一点上，王观泉的陈传比她好得多。王是否仍在上海？见面时盼代我向他致意。问

好

根上 二〇〇〇年八月廿三日

### （五十八）2000年9月3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8月3日收到评彭、陈的文章一组，9月3日收到你8月23日来信。此前《谎言与真实》早已收到。这些文章，连同评胡志明的文章，过去我在意因伯父处都读过。伯父去世后，我有了这些书，有兴趣的朋友阅读就方便了。

朱正8月7日来信：“目前出版社出书，首先考虑的是利润，能赚钱的，有一点风险也出，像《从苏联归来》不但出了郑老的译本，还出了另一译本。而《日记、书信及其他》，我也认为是本有价值的好书，可是出版社认为赚不到钱，就不想出了。这事我放在心上，倘有意外的机会，就争取再印一回吧”。

此事只能听而任之了。

出版《托自传》和《先知三部曲》的北京世文公司，经理袁亮，编辑主任施用勤。过去与我联系的是施用勤，他是学者型的，译笔也好。而袁亮完全是商人，较庸俗。我与施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出《双山回忆录》、《山火》等。最近得知施用勤和袁亮分手了，施已离开世文公司。如此，他就无法与我们合作了。最近我和袁亮通电话，询问施离开后，班顿的《山火》能否出版。他答复：译稿已完成，还须审改。目前出版形势严峻，一是审批很紧，二是市场萧条，书卖不出去。他说《山火》得年底再说。如此一来，出书的困难增大了。

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和《怀旧集》的北京东方出版社，实际就是人民出版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东方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些有争议的书。数月前我曾向东方出版社写一封信，请他们出版《双山回忆录》，但石沉大海，终不予答复。（郑老生前也曾写信给东方出版社推荐出《双山回忆录》也未获复。）

寄上：陈独秀致《申报》信材料一组。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9，3

（五十九）2000年9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寄上《胡志明文》，盼能收到。原来想将它复印的，因我近日无法出门，又无合适朋友（可托他拿去复印的）来访，就此将剪报寄上了。此文不比上次寄上的那二篇，如有可能，希望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不得已的答复》除少数老友外，请勿示人。不要送给唐君。

我身体不好，写字越来越困难了。接到你最近来函后，原本有许多话想和你谈，可是终日头晕，手指不但抖得厉害，而且伸展都困难，只好算了。

很久不见《动态》，有新出的吗？希望身体还能好些，写长信。问好

根上 九月廿四日

### （六十）2000年10月2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9月24日来信和评胡的文章，于10月4日就收到了。以前寄来的书和文章都已收到。我会照你的意见掌握阅读范围的。

《公理与强权》已在《动态》上发表。《动态》发行量很小，影响不大。所以争取在其他刊物发表。请靳树鹏向《炎黄春秋》等杂志推荐，均被拒绝。我自己又投稿《档案与史学》，是4月25日寄唐宝林同时发出的。前天突然收到2000年第5期《档

案与史学》，将《公理与强权》刊出了，而且版面比《动态》好得多，美中不足是你后来补寄的陈独秀关于一战后巴黎和会将德国占领山东权利转交日本的信未寄给，所以没有加入文中。现将该文复印寄上。我同时寄了一份给燕祺收存。我还准备寄给朱正《公理与强权》。

原来《双山回忆录》已有出版的希望，现在又落空了。许多事情只能待机争取。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10月29日寄

（六十一）2000年10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五日寄上胡志明文，附信，收到否？甚念。盼告。

我近来身体极差，不能多写。

问

好

根上 十月卅一日

（六十二）2000年11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31日来信于11月13日收到，来信只写了短短的几句，

看来你的身体很差。我们远隔万里，无法照顾你。唯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我已于10月29日寄上一信，附上《公理与强权》在上海《档案与史学》刊出的复印件，并奉告你寄来的资料都已收到。迄今为止，我们来往邮件，都没有发现遗失。

《动态》21、22期一定已收到。第22期14页张同写的《一首赋诗说真情》读到了吗？大陆有一位作家吴晓，此人写了多册有关“陈独秀”的书，胡编乱造，有损老先生的形象。张同此文就是批评吴晓的。我和吴孟明认为张同“陈独秀是于1937年出狱后与杨鹏升在武汉相识”是可信的。你在《回忆录》中只提到何基丰。你可否知道当年老先生与杨鹏升交往的情况，请于身体较好时将所知告诉我们。

请你以休养为重，不必急于回信。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 11, 17

（六十三）2000年11月2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十一月十七日来信已于廿五日收到。《陈研》第二十与二十一二期，由唐君直接寄来，于廿四日收到。现在写字太困难，请你给他去信时，代为提及并转达谢忱。

《陈研》字太小，我阅读困难。评吴晓文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吴某十分轻浮，记得靳树鹏曾给过他批评。

我的健康日走下坡，随时会离开这世界，但也可能“活屍”似的再拖一些时间。（我不希望后一情况）。

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我不喜欢“代理人”这个名称，因太市侩气了）。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稍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你那里有我的《毛论》吗？如无当寄上，祝  
康健

老王 十一月廿九日

#### （六十四）2000年12月3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000年11月29日来信于12月4日收到了。

今天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回顾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感触颇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你与郑老等老一辈，都是当年重大事件的弄潮人，现在你是唯一跨世纪的老革命家。我祝愿你再多活几年，也许会见到更意想不到的变化。

你来信中对我的信任和嘱托，我是既高兴又深怕难能完成。特别目前出版关卡多多，一时不会有大的突破。不过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

你的《毛论》我处没有，且我还未读过，盼能寄我留存。朱正曾来信，云要争取重版《日记、书信及其他》，但何时实现，都是未知数。

祝你新世纪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 12, 31

(六十五) 2001年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寄出的信，一月十日就收到了。稽复[迟复？]，歉歉。节前节后收到较平时更多的信，只是无力作复，真是憾事。自去年秋天心脏病又一次突发后，体力显著衰竭，用脑、写字愈加困难。甚至行动都几乎不能了。希望不久能追随超、春二位“火枪手”于地下。

《毛论》久已包好，待寄，只是无人替我拿去投邮，寄出后希望能收到，另有一本《诗与自传》拟寄给王观泉先生。

最近看到《十评》上有人写长文批评老超《晚年文选》，署名“前戈”，不知是哪一位老朋友写的。

《陈研动态》最近有新的出版吗？祝  
安健

根上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道同写的文章《陈其昌之死》，已由日友寄给我看了，写得极好，你见到他时，请转告。

### （六十六）2001年2月2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一日寄出一信，谅早收到。那信中提及的《毛论》却一直拖延到昨天才能寄出。原因是天气坏，一直没有人替我将书送去邮局付邮。我自己近来已无法出门，一切都要依赖人了。

希望这本书能平安寄到。同时寄出一本《诗与自传》给王观泉先生，大概也能收到。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主要的文件全送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前几天收到最近一期的《陈研》，是唐宝林直接寄来的。字太密，我无法细看，大体看了一下，觉得这本杂志越办越有意思，看了很高兴。很想给唐去信，只因我有心无力，暂时写不出，你如给他去信，盼代我向唐致意并道谢。问好

根上 二〇〇一年二月廿七日

### （六十七）2001年3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10日来信22日收到。2月21日寄来的《毛论》已妥收，请放心。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你给我的信函和邮件遗失。今天（3月8日）又收到你写于2月27日的信，仅六天就收到了。

《陈研动态》确实越办越好，唐宝林进步很大，尤其在《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在大陆出版后，唐宝林从中得到启发，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你对他的致意，我会写信转告的。

目前国内出版阻力仍很大，只好尽力争取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我们抓住一个机会，终于出版，并发生较好的社会效应，实属万幸。到今天为止，译者稿费还未拿到，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

北京施用勤和他的老闆分手了。施是学者，无法忍受老闆的市侩作风。班兄的《山火》原是施君经手的。现在施离开了，也没有消息了。

我你天各一方，我无法像为意因伯父做事一样，为你服务。现在只能把你的著述保存下来，留待他日出版。

怕你牵挂，先写此信，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3月8日晚

（六十八）2001年5月6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22日收到你2月10日来信，3月6日收到《毛论》，3月8日收到2月27日来信，当天就覆上一信。快二个月了，未收到你的信，心甚悬念。

寄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摘要。全文很长，俄罗斯《独立报》用了三个半版的篇幅。国内已有译文，你如有需要，我再寄奉。

王观泉已从哈尔滨搬到上海，住在中山公园后门，原圣约翰大学附近。我和他时有见面。他将你春节寄给的精緻的贺卡塑封珍藏起来。唐宝林5月下旬来上海，我和王观泉等与他会晤，届时我要将你对唐的致意当面转告，期他将《陈研动态》办得更好，将陈独秀研究更往深层推进。

你以前询问《十评》署名“前戈”是谁。据我所知，“前戈”是广州的刘平梅。刘是与超伯父最后被释放的几个人之一。他们当面也是争吵不休的。北京施用勤去年下半后就与老闆袁亮分手了，《山火》的出版再也没有消息了。

祝

长寿

小周敬上 5月6日

（六十九）2001年5月2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五月六日的信，同月十五日才收到，邮程实在太长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我怀疑是伪造的。俄国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十月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只是少数人搞的“苦狄塔”。“遗嘱”的全文如果不太长。能复印一份给我也好。

但如果页数太多，份量太重，那就不必了。这方面的论据，我相当熟悉的。

原定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研究会”想必已举行过了，唐到上海大概为了参加那次会议。见面时盼代致意。

王观泉曾有信来，我很喜欢这个人，也许因为我们性格上有若干共同处吧。

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你见过未？写得很好。据一位日本朋友来信告诉我，它将在行将出版的一期《鲁迅研究》上登出来。

想说的话很多，可惜我的体力日见衰退，现在连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写字用脑不用提了。胡乱写几句，聊当面谈。祝

健康

根上 23/5/01

又：最近一期《陈研动态》上登载的一则有关中译《中国革命悲剧》再版的广告，说易洛生当年搜集中国革命历史资料，目的原本在帮助陈独秀写这部历史。不确，陈独秀从未有写中革史的计划。易洛生对陈独秀保持“敌意”（受刘仁静影响）。他当年在北京，搜集资料，完全因为他决心自己写一部中革史，此事可参考老托致易洛生的九信，以及我写的几点说明。你若见到唐宝林，盼转告此事。

次日补写

(七十) 2001年6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5月23日来信6月4日收到。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遗嘱的真伪，我们也持怀疑的想法，不过将之视为一种思潮，其中提及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现将全文寄上。

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后期思想研讨会”已经开过了。据说会上各叙己见，相当活跃。广州刘平梅也去参加，会后到上海住了五天。他说日本朋友佐佐木参加，会上谈到，自从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托派是合作对敌的，以法国、意大利、丹麦最好。

陈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已在《鲁迅研究》第四期登出来了。该刊第二期登王观泉的《重版“独秀文存”序》，写得很好。过去《鲁迅研究》也发表过超伯父的文章，该刊主编王世家是王观泉的老朋友，对我们持宽厚同情态度。现在也退休了。

我们过去的文件资料都损失了，连超伯父都没有。你手中的文件资料，日后由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确是能长久留存的好办法。不过国内朋友使用就不方便了。最好你移交之前先复印下来，寄国内收不到，可寄港友收存。祝健康长寿

小周上 6月8日

(七十一) 2001年6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八日寄出的信及附件早收到，请勿念。《遗嘱》才读了三分之一，因为眼睛出毛病未能读完，等眼疾好转后再告诉你我的读后感。

一星期前收到日本朋友从杭州寄来他参加座谈会的情形，这封信另有一人具名，可惜我不认识。

三天前写了上面这几行字，当时突感头晕，停笔。昨天收到日本佐佐木君从日本寄出的信，告诉我温州集会的详情，又附了照片，想必你已经知道或见到了。照片中有唐宝林，不知他过沪时，有否与你见面。

二位日本朋友，佐佐本与长崛祐造，都给我来信，并提了一些问题，可惜我身体越来越差，连写一张短条子都千难万难。此事无法可想，只好随它去了。

你见到道同吗？如见到，请转告他，他的文章《陈其昌之死》，香港朋友想发表，（声明转载自《鲁迅研究》杂志），倘他觉得不好，盼即来信告诉我。又：得知他正在写一篇文章谈“何子瑜”，此文我也想看。祝

健安

根上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七十二) 2001年8月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七月九日寄出的道同文章及你所附的信后，我有否给你寄一短筒，记不真了。我近来体力大衰退，读写都几乎不行了。大约不久会和老超老楼“见面”。

道同的第二篇长文，没有第一篇好。定稿前，最好再仔细改进一下。

普列哈诺夫的“遗嘱”我勉强看了第二遍，很难断定哪些是真的口授，哪些是他人的“发挥”。有关革命后俄国前途的预测，肯定是他人的“创作”。

《陈其昌之死》一文，我已转告香港友人，请他们不要转载。

写不下去了，祝

安健

根上 ○一年八月四日

(七十三) 2001年10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六日收到你同月十日寄出的信，邮程太长，收到后，我又无力早日作复，实在泄气。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脑和手足都已拒绝工作、看书、写字，走动愈来愈觉得困难。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先生寄赠的陈研《简报》，你若和他通

信，请代我致谢。

国内的邮检似乎对我太严。我在北京的大侄女向我讨一套《回忆》，寄出三月，未曾收到，显然没收了。今年初给海宁的一个侄女寄去二册，亦遭同样命运。

最近我从荷兰的“国际社会学院”得到中托早期的一些文献，可惜复印太麻烦，无法寄你一份。

最近得悉吴甲原早已亡故，以后有关他与老先生之间的一度往来，提及时不必顾虑了。勉强乱塗，希望你能看出大意

祝

安健

根上 ○一年十月十六日

#### (七十四) 2001年10月3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16日来信10月26日收到。这次比较迅捷寄到。

你的来信虽然写得比较简短，但能读到你的信，总是很高兴，特别这次信中说近日身体较好，希望伯父超百龄的愿望由你完成。

你写的字，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写得比“意因伯父的甲骨文”好多了。

《双山》寄不进来，国内世文公司曾有出版的意向，后来受阻。前些日子向东方出版社去信，谋求出版也无回音，只好

待加入 WTO 后再争取了。班顿的《山火》也无出版的消息。

你过去寄给我的《毛论》，《谎言与真实》等都收到了。但是去年香港友人给我寄《悲剧》却没有收到。

楼叔去世后，一批文件已交里兹大学图书馆收藏，移交前不知有否留下目录。你准备移交的文件，最好留下复印件，至少要留下目录。大陆的朋友，根本没有资料。即使意因伯父，也不过晚年收集到几册旧书和他晚年写的文稿。过去的文件都被没收了，但是唐宝林手中有不少原始资料。

意因伯父去世后，我与唐宝林、王观泉、靳树鹏等学者保持一些联系，但因我理论水平太差，无法对他们有所影响。老人相继走了，当年属小字辈的我也已七十五岁了，眼看就要后继无人，奈何！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1, 10, 30

（七十五）2002 年 1 月 7 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寄出的信，收到已经很久，一直无力作复，真是憾事。我近来身体还好，只是脑子更不能用，记性更差，手抖得更厉害，有时竟致完全不能握笔。结果与朋友的通信，大多有来无往，非常糟糕。

最近一期的陈研《简报》收到了。字太小，太密，我的半盲的眼睛无法细看。从大体看清楚的文字所得的印象，觉得很好。你如与唐先生通信，请代我向他表达敬意。我本想直接给他写一封谢函，头脑和手指都不听使唤，只好算了。

想和你谈的话很多，可惜写不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精力还能回复一些。祝你  
新年快乐

老王 二〇〇二年一月七日晨

#### (七十六) 2002年2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月7日来信于1月18日收到，逢到过年，把给你的回信拖到今天，请谅。

我已将你对唐兄的致意转告。朱正先生嘱托我向你表示敬意和问候。

上海《报刊文摘》转载一文《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摘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说的是在莫斯科开六大时，王若飞为陈独秀辩护。和意因伯父写的《记王若飞二三事》内容相近，当时你正在莫斯科，一定知道得更多。

安徽省沈寂拟编《陈独秀年谱》长卷，曾与任建树、吴孟明商谈，当时我也在座。准备将最新公开的苏联档案有关部份收进出。沈寂也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学者。

国内老朋友越来越少，我这样的当年小青年，现在已经76岁了。意因伯父去世后，就失去了核心。

朋友们都惦记着你，如有近照，请寄一张。

马年祝愿你

健康长寿

周履锵敬上

2002年2月18日

### (七十七) 2002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二月十八日的来信，同月廿八日就收到了，无力早复，祈谅。

今天勉强能写几个字，决定将手边的三个短件寄给你看：

1、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sup>①</sup>。此件写得极不完全，但对某些关心中托史的作者，也许有用。此件不要发表。

2、一篇怀念汪孟邹先生的旧文，二十多年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的，因沈寂那篇谈汪与陈的关系文章曾提及此文，寄给你看看。

---

<sup>①</sup> 王老此件中列出他自己的笔名：文元、连根、惠泉、双山、三男、凤岗、振声、木君、守一、义方、字人、严可、三原、耕莘、李书勤、张家驹。其他人的笔名并不完全。

3、一则日记<sup>②</sup>。此文请便时交给道同，因它涉及其昌也。不要任何刊物上发表，因若发表，必将引起《王实味传》作者的反击，而我现在无力与人笔战也。

祝  
安健

根上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

### (七十八) 2002年4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3月12日来信3月21日收到，很高兴读到你寄来的三个附件。

《日记一则》一定尊嘱不在何刊物发表，其实想发表也很难找到肯发表的刊物。大陆关卡很多，班兄的《山火》至今仍无音信。你是读到黄昌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的《王实味传》后写下《日记一则》。去年黄又发表了长编《王实味传》单行本，书末也附刘莹的申诉材料。超伯父生前曾对我说：“刘莹瞎说”。道同看了后说：“王实味怎不知道我家的地址吗？他去延安时把所有家具都送给我家，我们用了几十年，现在还有

<sup>②</sup> 日记一则，是谈刘莹为王实味平反写的“申诉材料”。就是王老1994年5月1日写的札记，见《王凡西晚年札记》第135页。

几件”。我和道同估计，黄昌勇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你的此件我们当然不谋求发表，但可以寄给黄本人，并把道同有力说明告诉他，供他再版时参考。我和道同的这个意见是否可取？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之前，我是不会寄给黄昌勇的。

《记汪孟邹先生》写得很真切，吴孟明读后认为可以寄给汪的后人，汪原放去世多年，他的大儿子汪无忌是华山医院名医师，四年前去世时超老还写了一首悼诗。次子汪无功退休前是育才中学副校长，与吴孟明相识，准备将你的记汪文给汪无功。

你寄来的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虽不完全，但你自己和超老的就很完整，许多笔名我都不知道。关于陈独秀的曾用名，任建树写过一篇文章，列有几十个曾用名，刊在《陈独秀大传》附录中。

祝

健康长寿

周履锵于 2002，4，15

### （七十九）2002年4月1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二月十八日寄出的信，同月廿八日收到。我身体不好，直到三月十二日才给你回信，内附三个短件，希望已顺利寄到。当时因手头没有最近拍摄的相片，未能遵嘱寄奉一张。

上星期有客来替我照了一张，兹特寄上留念。

手抖，头晕（因最近新添的高血压），实在写不下去了。

请谅，

祝

安好

根上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七日

#### （八十）2002年5月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17日来信和照片于4月25日收到。

我在4月15日寄上一信，那是覆你3月12日信的，现在一定收到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的近照。看来虽较清瘦，但“千金难买老来瘦”。大家祝你健康长寿，完成超老没有完成的“登百岁”任务。我也寄上一张一九九七年与超老合拍的照片。我这个当年的小青年，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法国大选已落幕，国内消息闭塞，仅知道有我们的三位候选人参选，得票情况不甚清楚，如有资料请寄给（英文的可不必译出）。

祝

安好

履铨上 2002, 5, 9

### (八十一) 2002年5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上月十七日寄上一张近照，未知收到否，甚念。

我近来体力急剧衰退，写字完全不行了。今天重读你五月十五日来信，我有点意见勉强写出寄上。

我的《日记一则》当年写出后即寄给黄昌勇，他没有回信，只是将它交给刘莹看。据说刘莹大怒。黄在日后写成的《王实味传》中，更作了一些不确切的“考证”（例如说我的儿子在安庆出生的，为生产筹款，我“欺骗”王实味要他译老托二章自传。）这些瞎说，不值一驳。但我如今无力写文与他辩驳，所以你不要将“一则”寄去，免烦恼。

任建树的《大传》写得极好，但也有小错，例如在一个地方，把“西流”（小濮笔名）说成是何子瑜的一个笔名。

写不下去了，问

好

老王 ○二年五月十六日

### (八十二) 2002年7月1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五月十七日收到你来信，同一天寄上一函，谅达。本拟即答复你来信提出有关法国选举的问题，不料我心脏病突然恶化，此后一直不见好转。头晕手抖，无法写字，累你空等了。

半个月前我收到王观泉兄寄来一函，内附他写的一篇短文及“陈胡二人合影”，非常高兴。本应立即作答致谢，只因无力握笔写字，未能如愿，憾甚。此事请你转告，请他原谅。

想说的话很多，奈力不从心，算了。问好

根上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一日

### (八十三) 2002年10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老弟<sup>①</sup>：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sup>②</sup>还值得保存，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

① 周注：这封来信10月19日收到，11月13日我给王老寄去一信，没有收到回信。王老于2002年12月30日逝世。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如果写完此信之后没有再写其他文字，那就是他的绝笔了。王老是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给我的信称我“履锵兄”，我很不安，写信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一直不改，唯独这一封称我“履锵老弟”，当时倍感亲切，想不到竟是唯一最后的一次。

② 周注：“二信”是曼台尔与王老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我猜想，王老旧信一定堆积“如山”，他在身体极差的情况下，找出此二信，而且说：“二信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可见王老生前始终惦记这一团结统一问题。

祝  
健安

根上 二〇〇二年十月七日

附件：曼台尔与王凡西一九八一年来往的二封信。

### 曼台尔致连根同志

亲爱的连根同志：

我刚刚读完你的书，读时情绪愈来愈激动，同时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到可怕的大苦难，全世界的托洛茨基者运动却没有能力给他们以什么援助，这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无力与孤立的一个标志。目前我能见到的，也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安慰是：今天，更正确些说最近十五年来，情形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的运动现在已越来越有能力去保卫、甚至去拯救全世界我们最困苦、最受威胁或最受迫害的同志们了。这是历史性成长的一个可靠标志。而且我相信，它会继续成长的。

你给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托派以外更多的人——描绘了一九二七——五七年期间在你们国内以及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真实事变的一幅远较清楚的图画。在某一意义内，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端。在过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已确定地为历史所谴责，似

乎因为他们在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的遭到谴责了。未来的发展将在实际上依照这一平反工作走去，而且会走到最高点，即使我们的纲领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中获得胜利。

在你的书中，曾经好几次正确地指出长期间进行派别争吵的无谓，尤其是当争论的政治实质业已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之后。但是否以为这个看法适用于目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你是否应该发挥其影响，以便和香港的年青同志以及和老彭的一派统一起来？鉴于我们目前在大陆上已经打开了缺口，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这些分裂乃是阻止我们前进的一个巨大障碍。那些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们会感觉莫明其妙的。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以我在我们的运动中担负了许多职务，以致无法学习中文。但虽如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迷恋着中国，迷恋着中国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乃至阅读了我能找到的各种欧洲文字中有关中国与中国的东西。我对中国的文明怀着极大敬意。不管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个文明呈露出它的颓败的方面，不管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之后，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贫穷，但过去它却总在一千年以上的长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甚至比俄国历史更加是不平衡发展律与配合发展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其二十年代的飞速上升，卅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悲惨暗淡，以及最近廿五年来的新的成长，综合了这个发展。

今天，经历了这所有的升沉以后，无产阶级比它在一九二七年与一九四九年的力量是不可比拟地更为强大了。它的智能，它的经验，都更加成长了。它将把自己体现为中国文明中一切伟大的与不可摧毁的事物之合法的继承人，而且它将消受世界革命至今为止的一切矛盾的教训，把这份遗产和那进入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最勇猛的一跃结合起来。我但愿，你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能见到未来‘中国之春’的最初阶段，它将远远超过‘布拉格之春’与‘波兰之夏’的。这个春天的初步征兆业已出现，关于这点，你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恩斯脱·曼台尔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

### 连根致曼台尔同志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

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少数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一九五二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瘐死于廿七年的监狱中的少数几个倖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幅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茨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二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托派统一问题的态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将近一百年。这个发展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一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雪斯基、普列哈诺夫与列宁。’（我在一九七五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邓小平派）是越来越反动。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邓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邓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一九五七的情形又在出现（一九五七年是毛泽东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些在‘大鸣

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个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邓派，要像在廿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很多的。现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邓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

## 隔海书简

1996年6月起，海峡两岸的郑超麟和胡秋原两位老人有几组来往的信函。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记忆清晰，思维敏捷，仍不断地写文章。唯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他凭意念写的字很难辨认。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有几封由我誊抄后郑老签名寄发的，胡秋原的来信也由我读给他听。他们两位老人的通信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故汇编起来，征得他们同意后，将之发表。

小周 1997.3.

### （一）缘起

大陆学者任建树编的三卷集《陈独秀著作选》收有陈独秀致H和S的信。题注为：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任建树根据郑超麟所说注明的。后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指出：孙

洪伊于 1936 年去世，陈独秀不可能给已死的人去信。而郑超麟认为他们的记忆无误，当年何之瑜携陈独秀遗稿找郑超麟商量出版，郑超麟亲睹致胡秋原和孙洪伊的信（是抄件，不是陈的手稿），编辑《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收入此信时，郑超麟和何之瑜商量决定，将受信人姓名隐去，用 H 和 S 代之。为了弄清此事，郑超麟曾托人查找人名资料，怀疑另有一同名同姓的孙洪伊。但没有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健在的胡秋原询问。两人居住在海峡两岸，互相不知地址，无法通讯。

近年来两岸可以间接通邮了。胡秋原先生于 1988 年 1992 年二次回大陆访问。1995 年，北京出版了《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胡先生自序署：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之寓，无门牌号码。郑超麟思忖，胡秋原是台湾的名人，不详细的地址也许能够寄到。于是郑超麟于 1996 年 6 月 18 日寄去一封信。过了很久没有得到回信，以为没有寄到了。不料隔了五个月，意外地收到了胡秋原 1996 年 11 月 14 日的一封长信，于是两位老人鸿雁不断，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即“S”不是“孙洪伊”，而是“孙几伊”（孙幾伊）。此外，他们来往信件中还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资料。

## （二）1996 年 6 月 18 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请恕我冒昧写信给你。

我是在去年北京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华心》的新书中得知你尚健在，以及你在台北新居的地址的，我要请教你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我们在陈独秀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一封信稿，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给胡秋原、孙洪伊二先生的。一九四八年，何之瑜发表此信，用 H 代替胡秋原，用 S 代替孙洪伊，其余没改变。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中收有此信，仍用 H 代替胡秋原，S 代替孙洪伊。

但近年有人提出问题，说孙洪伊已于一九三六年病逝，此 S 不会是孙洪伊，因此发生争论。

我是亲见何之瑜所编书的原稿的，此信原稿确实是“孙洪伊”，用代名发表此信也是何之瑜同我两人商量决定的，我至今仍认为不会错的，陈独秀信中对孙洪伊说的话是：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慨！

按由一九四一年上溯二十余年正是陈独秀在北大任职之年，那时孙洪伊正在北京当国会议员，两人通过李大钊介绍而相识是完全可能的。李大钊是直隶省人，孙李二人是邻县同乡。

陈独秀此信现载于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 567 页。

我问的，不是信的内容，我问的，只是受信人除你以外另一个人是否孙洪伊？换一句话说；我只问你是否认识孙洪伊？

是否知道他在抗战期中尚未死，并去大后方，与你相识？

这是小事，但既然引起争论，小事也须解决。今天唯有你一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盼望你能赐教，此致  
敬礼！

郑超麟 1996,6,18

### （三）1996年11月14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sup>①</sup>

超麟先生：

6月18日来示早经拜读。因增订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及常生小病，迟迟未复。各方朋友来信已一大堆，今天开始复信，我首先复先生尊示，并特别拜托一事。

我在一九二三——四年后逐渐对唯物史观发生兴趣，也便逐渐相信社会主义。一二八战争前，日本人在上海火烧三友实业社，此是日寇恐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我当时便认为，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前，必须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一九三四年我先到欧洲，一九三五年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他们编《救国时报》。我在苏俄观察将近一年之后，认为中国不可

---

① 胡秋原先生原信共9页。

行俄式社会主义，同时我也放弃马克思主义了。一九三五年末，我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首先说到我已放弃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深信中国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过收回东北以后，那些大工业收为国家所有，中国将有一新型资本主义。抗战回国以后，我看孙中山的书，他早已说到中国实业应当国营民营并进，我又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混合经济’。抗战时期，人人都讲社会主义，而又认为统制经济即是社会主义，甚至马寅初也多少如此。到了重庆以后，政府的统制，只使物价日涨。一位老朋友薛农山（又名铁珊，原是一印刷工人，后因自修，学问大进，曾写《中国农民战争史》，亦常在《读书杂志》为文，曾加入托派，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任《时事新报》主笔，请我为特约撰述，我便在该报写了《民生主义实为资本主义》。汪精卫阅之大怒，并指使一人出来控告我。此时陈独秀先生为我写信国民党中央，说我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不可以权力限制学术自由。先是在汉口，我与陈先生恰恰比邻而居，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且相谈甚欢，他是时已放弃托洛斯基主义，不过还是倾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到重庆后，在民生公司演讲《抗战之意义》，也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这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幸而汪精卫在两个月后即投敌，我得免于迫害，而国民党人办的《艺文周刊》上，也的确举行了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这是第三次讨论，当然不会有结论）。

当时陈独秀住在江津，但他文章刊出未完，即未再见，因苏俄中共提出抗议，国民党不愿为陈一人得罪苏俄中共。于是他以油印文章寄他的信友，也将他写给私人的信用油印发表。有一次他写信给薛农山，信中提到我，薛农山还拿此信给我看过。说的什么，我已不记得了。但是最近增订旧作，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竟有“给 H 和 S 的信”的节录。（160—161 页）。我便想到，此 H 可能指我，而 S 则指薛农山而言。

我何以作此推测呢？大约二、三年前，我接到安徽文献馆（？或图书馆？）一位先生来信，问先生来信中同样的问题。他并且说，根据陈先生一位亲友，伺候过陈先生晚年的人说，H 确是胡某某。问题只是 S 是谁。这位先生来信希望我能答复他。当时，我正患气管炎住医院，没有复他，而他的信现已不知放在何处，而姓名已不记得了。

我的结论是：陈先生给 H 和 S 的信，“可能”是给我与薛农山的。如果陈先生的亲戚确定 H 指我，则 S 也一定是薛农山。上句“可能”，表示我不能完全断定之意。

今先生来信，问“受信人除你之外，另外一人是否孙洪伊？”我想孙洪伊要比我年长二、三十岁，且素无渊源，不会和他共同受信。而且据先生来信，陈信开始说：“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是叙旧之信，而所引的“给 H 和 S 的信”则是论当前共产主义问题的，非孙洪伊所关心。我有一老同事名孙

几伊<sup>①</sup>，早年在北京亦有文名，我们在国防委员会每日相见，但未曾谈到陈独秀。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上述的结论。

我说要拜托先生一事者，即是如此信第6页所云，二、三年前有一位安徽文献馆(?)的人对我提出过S是谁的问题，我因病未答复他，甚觉歉然。我请先生为我写一信至安徽文献馆或其它整理安徽人物的机关，询问有无人士写信胡某某询H与S是谁的问题，问到固是有缘，即令问不到该人，如果他们愿意了解这个问题，均请先生将我此信复印一份给他或他们。不胜感谢之至，之至！特此敬复，即颂

著安

弟 胡秋原拜上 十一月十四日

#### (四) 1996年11月27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sup>②</sup>

① 孙几伊的“几”字没有辨认出来，将此信复印件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沈寂来信说：“我查找了五四时期的人物资料，发现有孙几伊，当时颇有文名。再仔细辨认胡先生的信，似是‘几’字的繁体‘幾’字。”

② 此信和《陈独秀研究动态》第9期，分装两个信封同时寄的。胡秋原只收到杂志而没有收到此信。后来由小周补寄去复印件。补寄时附告“孙x伊”经沈寂辨认并查阅了五四时期人名资料，疑是“孙几伊”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的回信。

我为了一件小事，冒昧写信给你。信发出后几个月不见回音，我以为你看了信后不屑回答了。谁知不然。你为了这件小事，竟写九页的回信。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你这个好意！

三十年代初期，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向其它政治犯借阅书刊，就知道有你这位作家。我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杂志上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我又看了你翻译的佛里采所着的《艺术社会学》，特别注意到你在此书前面的长序言。可惜，我现在太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虽有人送我大陆出版的你的《中华心》，我也不能阅读。你回答我的信还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写的信，自己也看不清，非请看懂我写的字的人抄录是不能发出去的。

言归正传罢；

你的回信解决了我的问题。

第一，陈独秀写给你的信（见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其中另一个收信人S可以确定不是“孙洪伊”了。你回信中说的“与孙洪伊素无渊源”就是铁证，陈独秀决不会对“素无渊源”的二个人回答一信的。

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一人负责，凡有人来问我这个收信人H和S是谁？我总是说：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

第二，S决不是薛农山，因为陈独秀信中说“与S先生更

廿余年不见了。”那时薛农山与陈独秀同在后方，时常见面。

第三，S究竟是谁？我为甚么会说是“孙洪伊”呢？因为我看到此信的抄件（不是陈独秀亲笔原信），其中收信人正是胡秋原和孙洪伊，而且信中说“廿余年不见了”，即五四运动中，陈孙二人都在北京，那时见面完全有可能。

幸而你回信中有几句话可以说明我的错误是事出有因的，你信中所提的“孙 X 伊”（X 字辨认不清，在来信第八页第七行第一字），被我误认为孙洪伊了，何之瑜将陈独秀的文章（《我的根本意见》）寄给你，也寄给孙 X 伊，你们二人既然相识，便共同或分别写信给何之瑜表示你们的意见，何之瑜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便写一信给你们二人。

问题在于找出这个“孙 X 伊”是甚么人？但这是另外的问题。S 不是孙洪伊已经解决了。我为甚么误说 S 是孙洪伊也找出原因了。如此，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再一次感谢你！我知道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曾写信向你询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你的回答，我要给沈寂写信。把你的来信复印给他。如果还有别人问这个问题，沈寂会去通知他们的。

此致敬礼！

郑超麟 1996,11,27

### (五) 1996年12月19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

超麟先生：

前接大示，弟曾即复两个要点：

一、陈先生信中之H可能是我，如果是我，则S一定是薛农山，不是孙洪伊。

二、又拜托先生将拙函复印一份寄安徽省研究陈先生的机关，因两三年前该文献机关(?)，曾有类似之信问我，并说H是我无疑，问S是谁?当时因他事或小病未复，甚歉。今烦先生复印拙函寄去，亦所以补过。

继而接到先生寄来《陈独秀研究动态》(9)，及12月11日来信。信之字迹不甚清楚，大意是问我是否收到先生回信和杂志。所谓杂志，不知是否指《陈独秀研究动态》，至于信，只有12月11之信寥寥数语，而对弟前信所云，无一语及其内容。

又有一点奉告者：七十年前，弟曾在汉口见过一位郑超麟先生，法国留学生，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数本，译文甚好，其后加入陈独秀派。我初接来信时，曾疑是否那位郑超麟。及念字迹清健，相信年必轻于我，一定只是偶然同名。今观来书，是九十以上之人之笔迹，使我相信就是我七十年前见到的郑超麟先生。如果所忖不误，则我们缘分真不浅也。

最后，我要乘此机会，向陈独秀先生研究会诸先生要求，由于郑先生笔法已难辨认，敬请先生等对我前信所说两点作一答复，并告我写信与我的郑超麟先生是否七十年前我所说的郑

超麟先生。专此敬祝  
新年万福，研究会诸公万福！

胡秋原拜上 十二月十九日

#### (六) 1996年12月31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十二月十九日写来的信。

记得吴国祯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调查户口，发现上海市民姓吴名国祯的，有13人（或23人）。我敢打赌，古今中外，除我之外没有人名“郑超麟”的。今天在上海安度晚年的郑超麟也就是七十年前在武汉经历革命失败的郑超麟，过了今天，从明日元旦起，我就可以告诉国人，我是九十七岁老人了。

原来你我少时曾见过一面，希望今后我们仍能保持联系，关于S是甚么人问题已经解决了（S就是孙几伊，当初发表此信时是我误记为孙洪伊）。但你我通信，不患没有话说。先从你写的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说起罢！你在此序中称陈端本为姊，可见你认识她，你能告诉我她的下落么？你在同一序中有一段论翻译的话，大意说：今天中国作翻译的人可分二派，一派主张直译，鲁迅为主；一派主张意译，林超真为主。林超真就是我，当时，我正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如果有人知林超真就是我时，一定会骂你。但近几年，我找到史料，证明了除你以外，尚有人作此对比，这人就是瞿秋白，见

一九九五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兹将此页印一张寄给你。

我前信说的杂志，就是你收到的第9期，我回答你的长信是与此杂志同时寄出的，不过分为二封信寄，想不到你收到杂志，却收不到信，过几日我当寄一份复印件给你。

收到你的长信后，我立即复印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他回答说：“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希望你能看懂将近百岁的老人写的字。祝健康！

郑超麟 1996,12,31

附件：

瞿秋白谈郑超麟：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琛所倡，原意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前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小学生之练习簿！至于超麟同志的译笔确是很好的。

《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该文集为瞿秋白自编）

### (七) 1997年1月18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sup>①</sup>

超麟先生：

连接96年12月31日及97年1月3日小周老弟寄来96年11月27日信，不胜欣喜。欣喜之一，是我接先生第二次信见字体歪斜，即料定此超麟即我当年曾见一面并读其译文之超麟。先生云古今只有一个超麟，于今是九十七人瑞，云乎不喜。欣喜之二，是先生提到艺术社会学序文，弟早忘记，及翻阅旧作，果有鲁迅与林超真并举之文。七十年前心仪其译文之人至今健在，而且通信，云乎不喜！谓曾一面者，民国十六年弟为全国学生总会编《中国学生》，常出席宣传会报，有一次先生起立发言，座侧一位朋友介绍，此是郑超麟，而且似乎说到先生之腿一时有点不便云云。<sup>②</sup>

又弟可略述与独秀先生关系。一、抗战初期弟在汉口德润里办《时代日报》，适与独秀先生为邻，曾拜候畅谈。二、内人扶家母先入川，适与独秀先生及郑学稼兄同船。三、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

---

① 原信竖书，上端有三处加写；小周老弟，此信仍请复印一份寄沈寂先生，为感。几字不错。并贺小周老弟新禧。并将此信念与郑老听。

② 郑超麟无跛脚之足疾，我问郑老，是否胡记错了。郑说：“当时患严重的脚气病，确实有些‘跛脚’，胡秋原的记忆真好。几十年后还记得。”

讲，亦有此主张。弟入川后，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在薛农山主持之时事新报上发表此项主张，汪精卫大怒，嘱人控告，陈先生致函国民党中央，谓胡之主张值得研究，不可压迫。此后陈与薛通信中常提及弟名，薛亦屡以相示，故印象甚深。四、独秀先生逝世后，重庆唯弟在扫荡报副刊为文，题为悼陈独秀先生。孙伏园见之劝改为《悼陈仲甫先生》，前弟云如H是我，S一定是薛农山。现在想来，孙几伊亦极可能，孙几伊在民初亦为相当有名作家，约长我十余岁。因当时我们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之职，对当时独秀先生横被诬蔑，深表同情，事为独秀先生所闻，故有致H与S之信，亦系当然之事。唯事隔半世纪有余，遂不能确切记得耳。而弟在拙著《一百三十年代中国思想史纲》中特引此信，当亦因其与我有关欤。

先生长我十岁，先生一代之人所余无几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寥寥可数。与先生一代之人此处尚有严灵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记得否，专此敬复  
敬贺新禧，并祈多多保重，‘超’百‘龄’而多多益善。

小弟胡秋原拜上 一月十八日

#### (八) 1997年2月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一月十八日回答我的信，收到已经多日了，因事忙，到

今天才能够回答你。

一个快到百岁的老人双目几乎失明，又只能在室内扶着桌椅行走，但还能听人读书，还能谈话，还能写字，认为做人的责任尚未到尽头，能够活动时还应当活动。

我不仅至今记得你在《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中说的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你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同情于托洛茨基的遭遇，同情陈独秀的被捕入狱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知道你是不同于当时的“左倾”文人的。前几年，我为某一问题去研究鲁迅的史料，才知道你曾为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而付出代价，即受了其它“左倾”文人的攻击。据说当时鲁迅曾用隐晦的方式为你的受攻击抱不平，即他利用一次公开机会向群众强调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贡献。

从你最近给我的信中；我又知道你在抗战初年曾公开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引起汪精卫大怒，幸亏陈独秀赞成你说的话，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想，当时自己正在发展资本主义，却反对别人提倡资本主义的决不止汉奸汪精卫为止，也决不止国民党领导人如此罢！

可惜，我抗战初出狱后就没有机会再读你的著作了。

在国民党监狱中读你文章时留下来的良好印象，使我认为在垂老之年能够同你通信是一种好事。

我已尊嘱将你最近回信复印各一份给安徽历史系教授沈寂，他回信要我告诉给他你的通信地址，我通知他了，想他也

会写信给你的。此祝  
春节愉快！

郑超麟 1997.2.8

小周注：原稿编至此，寄给胡秋原先生，向他征求是否同意发表。

### （九）1997年3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承您呼我小周老弟，令我倍感亲切，心里甜滋滋的。五十多年前，朋友们叫我小周，而今过了古稀之年了，老朋友还是这样叫我，我也乐于以此自称，概有不服老之意，不过在郑老和您等前辈面前，我永远是小之又小的小周。

我已尊嘱将您给郑老的信复印寄给沈寂先生。我还曾将你几次来信的复印件给了《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唐宝林先生和大陆研究陈独秀的学者任建树先生。

我经手您和郑老的信函，您二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感动。您对未复数年前安徽某人的信牢记在心中，并且一再表示歉意，您的如此为人，甚为钦佩。您们来往的信件的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如将之公开发表，是很有意义的。郑老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加以整理抄写，现将这些材料寄给您，请您审核，如果您也同意，就分别在两地刊物发表。刊出时除了来往信函之外，不妨配上二位近照和手迹。

郑老早年写得一手好字,直到八十高龄时还写得很清晰(见八十自寿手迹),但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他仍不断地写信,写文章。我们建议他口述或录音,由我们整理,但试了一、二次就不干了,大概是亲自动笔可边写边思考,所以执意亲自书写。他“盲写”的字甚难辨认。这次誊抄时,我原拟全用繁体汉字,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变成繁简混杂了,给校对增添麻烦了。

附上一张郑老的照片。请您寄给我们一张您的近照。我抄写您的来信,如有差错或有增删,请示知。我们在未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是不会发稿的。敬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 1997.3.9

#### (十) 1997年4月2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请转

超麟先生:

寄来文件一包已收到多日。我想先生等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首先奉复二事:

一、先生说将我们来往讨论 H、S 之信件公开发表,弟不仅同意,而且欢迎。因为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讨论。

二、弟之迟复,由于过年后有似感冒之小病。

三、奉上最近照片一张,龙钟之态,似尚不如郑老之康健也。

又小周先生年逾古稀，故弟改称先生也。专此即颂  
新春万福！

弟胡秋原顿首 4 月 21 日

### （十一）1997 年 5 月 7 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四月廿一日惠书，于四月廿九日收到，当天下午就读给郑老听，他老人家很高兴，他将您的近照，贴着鼻尖看了之后说：“胡秋原比我健多了”。郑老嘱我写信向您致谢，祝你身体健康。如果您第三次访问大陆，盼能与您欢聚话旧。

您在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对张君勱只一笔带过，而对陈独秀情有独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写了详细精辟的介绍分析。应该与您和郑老来往的书信一并发表。但《隔海书简》已有七千字。该文只能投寄大陆的期刊，字数过多就无法被采用，所以拟忍痛割爱了。但您在台发表时，如不为字数所限，尽可加进去。至于先生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我们手头无此资料，打算写信向沈寂先生索讨，如他能及时寄来，当尊嘱加入。

先生来信开首写道：“来件收到多日，我想先生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确实如此。我们不愁您迟复，而愁您没有收到。当时我去邮寄时，要求挂号，答复发往台湾的邮件不挂号。而这次先生寄来的却是挂号信。邮件也常有遗失，个中原因就无

法说得清了。所幸现在有复印技术，多一个心眼复印留底，发现遗失就补寄。

郑老决定联系发表《隔海书简》，但大陆有许多不固定的因素，有人际关系，还有其它等等，何时刊出难以确定。如在台先行刊出，请惠寄书刊或该文的复印件。

你是我的前辈，请不必客气，呼我小周或直呼姓名更好。先生如有要我办的事，请尽管吩咐。

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顿首

97.5.7

此信读给郑老听了，他叫我补充二点：1. 郑致你 97 年 2 月 8 日的信，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复信，现知你没有收到那封信。所幸小周整理的包括那封信的稿件你已收到。2. 前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九期你已收到。这一期上刊有郑超麟悼陈独秀的文章，不知你曾否注意到这篇悼文？那是当年署名意因发表于托派地下刊物。郑老的早年文章本人都没有了。该刊的编者不知从何处觅得当年的悼文。

（十二）1997 年 5 月 29 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尊郑老吩咐，寄上《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这一期上，刊登了先生和郑老的三封信。那是早先寄给《陈研》的。关于续后的书信，他们还未见到，所以编者“本期导言”有“但S是谁？可能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之话。5月22日，唐宝林先生来到上海，主持25日开幕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郑老已将全部《隔海书简》给了唐宝林先生，他们会续登的，S是谁就不会成为千古之谜的了。《陈研动态》是学会刊物，不支稿酬，但稿件可另投其它刊物。

沈寂先生已将您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复印件寄给我。沈寂告之该稿由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先生复印寄给他的，是1965. 5. 16《中华杂志》第三卷第五期第17—19页。正文尚清楚，但19页的注完全看不清。改日寄给《陈研动态》。

郑老向您问好。

匆此，敬祝

撰安

晚 小周顿首 5月29日

(十三) 1997年5月3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郑超麟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5月7日来示收到多日。

先生说我对陈先生“情有独钟”。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是当时西化派（主要是北大派）对抗战悲观，好多人参加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而陈先生却坚信抗战必胜（此点傅斯年说过）。二是在中国学界，陈先生的遭遇甚不公平。除了无言论自由之外，梁启超去世时，送葬者数千人。胡适在台去世，送葬者数百人。而陈先生在江津去世时，送葬者一、二十人而已。既然《隔海书简》篇幅有限，拙文自不必刊载。弟自《中华》停刊后，已无地盘。其它刊物，恐怕很少关心此事矣。

有一要事还要烦先生。先生问我是否注意到《研究动态》第九期郑先生悼陈之文，老实说，我亦老眼昏花，的确没有注意到。便中先生幸寄我一份复印稿，为感。

先生说盼我能三次访问大陆。但第二次在北京时中日医院即告我不能长途旅行。遥望云天，徒唤奈何，勿此敬祝先生与郑老健康长寿。

弟秋原上 5月31日

#### （十四）1997年6月12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写给小周兄并转我的两信，小周兄都读我听了，并代我回答了。小周兄还将你我二人先后通信及其它文件编成了《隔海书简》，没有他，我甚么都不能做。

记得三十年代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从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刊物中时常读胡秋原的文章，其中有同情托洛茨基和

陈独秀的话，甚至提“林超真”的翻译，以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不知道这位新作家的来历。此次为孙几伊问题冒昧写信给你，从你的回信中才知道你我二人曾在武汉见过一面。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感慨，这恰好是整整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而你也只有十八岁。

现在，你我两人都老了，但读你的信，虎虎有生气，而我则是有目不能读书，有足不能行走，行将就火了！

我的心情，你可以从我几年前作的一首词看得出来。

### 临江仙

“不是人间偏我老”（借用放翁成句）

只嗟壮志难酬，  
百年坎坷一身留。  
雪花飘峻岭，  
骤雨袭扁舟。  
遥望前程如锦绣，  
春风丽日当头。  
衰翁跋跬意何求？  
虞渊追夸父，  
渴死亦甘休。

一个人失去了劳动力，依靠社会供养来延长生命，实在没

有甚么意义。

此祝

撰安！

郑超麟 97.6.12

胡先生：

郑老对前二次未亲笔给你回信，深表歉意。这次他一定要亲书复你。现将他的原书和我的抄正一并寄上。另附上一篇郑老当年的《悼独秀同志》。

我已将你最近来信及你当年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寄给《陈研动态》，由他们选登。

祝

夏祺

小周附笔 6.12

### （十五）1997年6月26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前寄复函并附照片后，先后收到复示二件。

一是郑先生嘱寄《动态》一本。（以前并未收到）。并知隔海通讯刊出一部份。又收到有关陈先生驳斥法院“深自悔悟”之文一段，以及‘常坦’‘如虹’对联复印。自苏州审判时，章士钊律师称，陈现为共党反对派，与国民党宗旨相同，不应

有罪。陈即对法官称，我仍信共产主义，仍反国民党，章律师刚才所言不能代表我。海内壮之。弟久见陈先生字迹娟秀，而此联益见俊美，谢谢。

第二次信是6月12日郑老亲笔，周先生的释文。并附当年悼陈之文和《临江仙》的词。郑老说，七十年前我们曾见一面，且已互相知名，而今又竟两岸话旧，此真非易事。九七固艰难，八八亦不易，此缘分亦福分而来，我们那一代的人有几人能见到香港之复归乎？

郑老希望我能回大陆一行话旧，此亦我之热望，无奈医生已告我不可长途旅行。沈寂先生来信提到今年十月将有陈先生与中国文化研究会，希望我写一文。但我的一本旧作增补一年仍未及半，改日我将亲函沈先生致歉，便中亦望周先生代达鄙意。专此敬祝

郑老夏安，周先生夏安

胡秋原顿首 6月26日

小周注：苏州审判应为江宁审判。

小周附记：1997年下半年，郑超麟和胡秋原没有书信来往，1998年春节，胡秋原给郑超麟、周履镛寄来二张专制精致的贺年卡，具名胡秋原、敬幼如。给郑老的题：超麟先生夫人新年万福。给我的除题名相似外，另附笔写着：“两示及刊物均收到，因杂事及小病迟覆，谢谢”。

1998年元月起，郑老患病三次住院，7月20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十余天，于1998年8月1日去世，享年98岁。郑老去世后，我致信胡秋原先生，通报郑老去世的噩耗。

(十六) 胡秋原《悼超麟》唁文

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既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己之难再也。

胡秋原敬悼  
戊寅八月十日

附：胡卜凯致周履锵信

周先生：

家父收到您的来信，得知郑前辈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但因近日眼睛开刀，无法写字，特令我代笔，寄上唁文，请转郑前辈家属及亲友，谢谢。

敬祝大安！

晚  
胡卜凯敬上  
一九九八八月十一日

## 附件 1: 陈独秀致 S 和 H 的信

H, S 二先生:

与 H<sup>①</sup> 先生别三年矣, 与 S<sup>②</sup> 先生更廿余年了, 回忆北京之游, 真不胜慨叹!

顷见二位与 Y<sup>③</sup> 兄书, 于弟近作有所示教, 感谢之至。弟自来立论, 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 不喜空谈主义, 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 此种“圣言量”的办法, 乃宗教之武器, 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 亦未涉及何种主义, 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 乃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教训, 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 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 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 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 便反对孔教, 见到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 便反对它, 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然非弟故意如此, 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

---

① 《陈独秀著作选》原注。H 即胡秋原。

② S 即孙洪伊。

③ Y 即何之瑜。

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口而嗜之，是迷信也，倘若味道好，因其陆稿荐出品弃之，而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出，虽油印亦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独秀〔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附件 2：沈寂致郑超麟的信的摘录：

一,1996 年 12 月 11 日信：

11 月 28 日的信，以及所附胡秋原先生信的复印件和你致胡秋原先生的信（复印件）等，均收到，请释念。胡先生非常负责任，提供了他所知道的证据。不过，在第 8 页上，他提出的一个老同事，名孙 X 伊，该字实很难辨认。我翻了一些工具书，五四以来曾有一人名孙几伊的，胡先生写的似乎是“幾”字，究竟如何？如胡先生再有来信，请仍能告诉我。

胡秋原先生所謂安徽文獻館者，無此單位，但他記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沒有旁人。

## 二,1996年12月26日贺年片

敬祝新年好，身体健康！12月15日的来信收悉，您过奖了。您是我的尊长，在与您的交往中，得益匪浅。尤其是您的为人和持节之风，素为我敬重。您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我的榜样。您决不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我亦一样。但都能承认事实，实事求是。

## 三,1997年2月24信：

胡秋原先生已复了我信，他说了“补过去失误之咎”，所以立即复我了。

关于孙几伊的小传，我尚未觅得，我是从近代人名署名、笔名的工具书上查得的。关于孙几伊的生平，容待以后留意查找。一时难以相告。

### 附件3：胡秋原致沈寂信

沈寂先生：

来示昨日收到，今日奉复，所以补过去失误之咎也。前得先生信，问H、S之事。当时因在病中，未即作答。继而病愈拟复，而先生之信，不知夹在何处，未能作答。每一念及，心常耿耿。近郑超麟来信再提此事，因念他必能知道安徽注意同

一问题的人，请其查考。果然得与先生联系。此亦缘分不浅。而经过三方反复讨论，可以断定 H 是弟，S 是孙儿伊，殆无疑问。此则不浅的缘分，又解决历史问题也。

先生看到中华转载扫荡所载《悼陈仲甫先生》文及补注，甚喜。先生希望我再写点有关陈先生的文章，但由于年老力衰，我要补《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为《一百五十七年史纲》实际上只增加一章，至今尚未完稿，故难应命，不过《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中有关陈先生者有五、六处。此书系弟自印，已卖完，且其中对某君甚多批评之语，亦不便寄与先生。拟俟新版出后再寄（因可平衡）。敬请

新年万安

弟胡秋原拜上  
97年1月28日

#### 附件 4：郑老去世后沉寂的唁电

惊悉郑老遽返道山，不胜悲痛。世纪同龄，人道坎坷，命途多舛。特立独行，为人所珍，坚贞信仰，堪为楷模。十七年师友之情，风范长存。

98年8月5日

胡秋原 2004 年 5 月 24 日病逝于台北。终年 95 岁。郑超麟 1998 年 8 月 1 日病逝于上海。终年 98 岁。





周履锜，1982年



劳改场学校时期的周履锜，1985年



周履鏞退休后，1988年



郑超麟与周履锛，1997年



周履锛与郑亨、李永爵，2003年



周履鏞八十寿辰，2006年



周履鏞晚年游雁荡



周履鏞晚年游雁荡



周任辛赵清音夫妇，2003年



周任辛、王国龙、周履鏞，2003年



王凡西晚年照，2002年4月17日赠





周履锵于上海浦东，2003年，段跃/摄



# 贺寿

· 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 贺百岁

## 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绸厂女工受剥削， 反抗迫害奔革命；  
领导罢工争权益， 日寇牢狱遭囚禁。

克服困难勤自学， 学习文化攻马列；  
聆听导师受教诲， 小弟追随步后尘。

南下创业尝艰辛， 夫妻相辅信念真；  
坚贞不移为共产， 奋战宣传永不停。

貌似强大称堡垒， 摧枯拉朽一朝倾；  
马列主义受质疑， 唯独四叔讲分明。

晚年无私作贡献， 扶助后辈共前进；

坚持真理为革命，终身洁白女中杰。

人生七十今不稀，九十高龄上街游；  
遥祝寿诞祈延年，百岁期颐擎红旗。

读印大姐的《浮生八九，求真六四》，才知大姐 1915 年 8 月 13 日出生，过几天就是九十大寿。两地遥隔，不能亲贺。古人赋诗祝寿，为“秀才人情纸一张”，我不学无才，不能诗赋，连韵律平仄都不懂，只能略写几句，以志敬贺。

## 贺百岁

大姐1915年9月21日(阴历8月13日)诞生,照传统的算法,降生就是一岁,过了年就是二岁。所以今年(2014年)大姐100岁了。1915年是丁卯年,属兔。我1927年出生,比大姐少12岁,也属兔。大姐百岁了,我也年届八十八,可说已经长寿了,而且都是历经磨难活到现在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革命信念的支撑。

对大姐的百岁寿辰,我无以为贺,只写几句大白话:

兔姐登百岁,兔弟来祝贺;  
同学哲学班,深受先贤教;  
人世多变故,隔断卅余载;  
晚年通讯息,承姐常鼓励;  
只因水平低,实在少作为;

终身尽微力，我心也坦然；  
未见革命成，已见魔头降；  
世界光明景，终将能实现。

兔弟履铨敬贺 2014 年 8 月

• 解连环——悼亡

• 悼亡妻慧初

• 江城子——悼亡

• 卅年祭

• 悼亡儿

# 缅怀

· 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 缅怀李永爵同志

· 根叔——纪念王凡西同志

· 缅怀王凡西同志

· 悼念赵青音大姐

· 悼父母

· 悼弟弟

· 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记慧初病故前后

## 与周仁生同志的情谊

周仁生同志，1922年4月出生于温州，2004年1月27日逝世，终年82岁。他的去世，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莫大的损失。

周仁生同志是我的良师挚友。记得我七、八岁时进入瓯江小学读书，那时他是六年级毕业班的高材生。我的姑母周蕙芳与他同班，他们亲如姐弟，她有时带我到周仁生家去，所以七十多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但与周仁生的真正接触，是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周仁生担任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一位仅比学生大五、六岁的青年教师，却以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他平易近人，学生们与他接触，总有一种亲切感，许多人不知不觉地逐渐受到他的思想影响。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受他的熏陶，慢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的。

在我和他长达七十年的交往中，有时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有时关在同一个狱内，却彼此隔绝；较多的日子是天南地北，

音讯全无；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分离，重新聚首时，发现彼此仍心心相通。最近二三十年中，我住上海，他居温州，每隔一段日子，总能有愉快的会聚。平时也是书信来往不断。积存盈尺的他称我“小周”，自称“老周”的信，留下了深情厚谊，也有他深睿的思想浪花。

周仁生同志学生时代成绩优异，读书广泛，知识渊博。参加革命工作后显现他的宣传鼓动能力极强。他的终身事业是革命工作，而从事的职业是教书。他每到一校任教，就能团聚一批优秀的学生，对之施以思想影响，引导不少人最终成为托派成员。他可算是“工作母机”，到处“下蛋”。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受他的影响，我无法数列出来。但是共产党判他无期徒刑的罪状之一是：“残苛毒害大批青少年的思想。”把这句话反读一下，可知周仁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思想的贡献之大了。

我很难写出周仁生的整个生平，只写几点我与他交往的事。

1947年初，我到上海。此时周仁生已先我到了上海，我们又开始接近。他介绍我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杂志和一批政治理论书籍。后来带我去参加哲学班，每周听彭述之讲课。就是在哲学班，我受到了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成为一名水平不高的小托派。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48年底，周仁生在上海活动（一度到苏北靖江），他是上海托派多数派的活动分子，当时用化

名“沈念。”他曾参加1948年的建党大会，那次会议，托派多数派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周仁生参与宣传工作。

上海解放前，周仁生和林松祺南下福建，经厦大教授安明波介绍，去厦门附近海澄中学教书，后来林松祺去香港转广州，周仁生被任命为海澄中学校长。1949年底上海市共产党当局逮捕了托派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江浙临委成员及几个一般党团员，我也在其中。当时共产党主要镇压对象是国民党特务。对我们这批被捕的托派只是警告今后不许活动，不久都释放了。被释的钱川、丁毅、刘毅去了香港，我南下到了周仁生任校长的海澄中学任教，在那里一直到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大逮捕，三年内我与周仁生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处。

周仁生在福建，改用谐音周任辛，以后一直用这个姓名。

福建海澄中学，原是一个县的一般中学，周仁生接任后，以其非凡的才能，三年时间，将之办成一座在闽南颇有声望的学校，（现在是省重点中学龙海二中）培养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人材。1952年我们被逮捕后，共产党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罪状，要学生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想像中，当年的学生，一定是很痛恨我们的。可是后来我们得知，学生们非但不恨我们，反而还怀念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下落。大约在十多年前，周仁生后来教出来的一位学生考入厦门大学，他把周仁生的近况告诉已经是厦大教授

的当年海澄中学学生时，他们竟将之当做特大喜讯转告海澄中学老同学，从此当年海澄中学的不少学生与我们书信不断，甚至还有人专程到温州看望周仁生。可见“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们都被捕了。当初各人都是单独关禁的，彼此无法来往，连放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1954年下半年陆续宣判，在福建，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我和赵养性、黄禹石等被判7—15年徒刑。不久，除周仁生外，其他三人都被送到内蒙古劳改。后来到内蒙的三人调散了，我成为孤单的一人。毛泽东的共产党1952年处理托派案时是不公开的，秘密关押，秘密审判，我被送去劳改时，不许与其他犯人谈案情，我完全是孤立的，但这样反而可以不用自污，不须“触及灵魂”。

我于1979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但不许回家，仍被强迫留在内蒙劳改队留场就业，实际上是由劳改队转到劳改局管理的劳改就业单位，继续受管制，等于变相劳改。与劳改队不同的只是每月有二十来元工资。当地人称为“二劳改”，而且判刑劳改是有期限的，“二劳改”是无期的，也就是由“有期徒刑”转为“无期徒刑”。这样我在内蒙又当了二十八年“二劳改。”1961年开始，我每隔二年有探亲假，一次我回到上海碰到姑母周蕙芳，她告诉我，赵青音住在温州仁生老家，与公婆一起生活。还听说周仁生关在上海监狱。1972年周仁生获释，1979年回到温州，那以后我每隔二年回温州看望父母，

都与仁生会面。1987年，我退休回到上海，与仁生恢复接触，书信来往不断。周仁生王国龙每隔一、二年到上海看望郑超麟，郑老1948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介绍我与喻守一、黄鉴铜、李培认识。1993年李培去世，郑超麟处于无助的状态下，周仁生希望我去帮助郑老，于是我与郑老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与郑老相处的情况，我已在《意因同志》文中叙述了。

周仁生回到温州后，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及有关著作的翻译，先后翻译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二卷，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的三章，《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二卷，还译了许多短文。同时从事义务英语教育。

周仁生的不少译著，亦有我的参与。我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能独立翻译的能力，但可以帮助他校对、查找资料等。周仁生翻译《彭述之回忆录》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专用名词的翻译。彭述之的女儿将彭的口述译成法文出版，现在由法文译成中文，就会出现音同字不同，甚至相差甚远。周仁生手头又缺资料，我就为他担当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回忆录中有一节：He Minfan—湖南第一位共产党人。周仁生把He Minfan译为何明凡。但打了一个“？” 。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当然是毛泽东，哪还有何明凡？我请教了几位历史学教授，都不知道何明凡其人。后来从刘少奇三大卷年谱中查得He Minfan应是贺民范，姓名三个字都不同。类似的人地名很多有同样的错误，我尽可能的查找资料，请教

学者，给予订正。又如引用《响导》等杂志上的文章，由法文转译过来，非但不是原文，甚至连题目也意同字不同，承王观泉教授将其珍藏的《响导合订本》借我，使我得以改正。

书成后谋求出版没有成功，我想到先出电子版，我将第一二章在电脑上打字出来，我于2004年1月带了一、二章的打印件，到温州与周仁生商量。1月26日下午，我去看望周仁生，他卧在床上，精神尚佳，能与我像平常一样谈话，我询问他是否可以先将《彭述之回忆录》印几十本打印本，当时周仁生对我说：“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我向他告别时对他说道：“我过二天就回上海，火车票已买妥，明年再来看你。”他说：“明天我要到医院抽腹水。”想不到当天下半夜，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对我说的“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仁生去世后，我退掉已购的火车票，参加周仁生追悼会后才回到上海。接着我就着手完成仁生未完的工作，首先将《彭述之回忆录》第三至六章打字出来，交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印几十册征求意见本，我在上海复印了几十本，寄给学者和老朋友。想不到这项工作还起了作用，我寄给出版界老前辈范用和朱正先生的《彭述之回忆录》，他们主动推荐给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1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张小平先生和主任柏文裕先生来访，谈拟出版《彭述之回忆录》，但希望三卷一起出，要我帮他们与彭述之的女儿取得联系。现在我已

经使他们建立了直接联系，最近听说回忆录第二卷程映湘接近完成了。

为缅怀周仁生老师，我收集他的文章，编成《周仁生文存》，我写了《周仁生同志传略》和周仁生年谱，秋大姐出资，2005年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书发出后反映很好。

周仁生译毕《彭述之回忆录》后，就专注于《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翻译。这套文集共12卷，收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时期的文章，（已单独成册出版的《俄国革命史》等未收入）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出书后又发现一批托洛茨基的文章，编成补遗二卷，周仁生最后几年专门从事这二卷的翻译。周仁生去世前不久，曾来信对我说：他已译完《补遗》。对于这项译事，我一直没有参与，他也没有将译稿寄给我，我以为，他早已将译稿全部寄给香港刘乃光了。

后来刘乃光来信，才知周仁生并未将译稿寄到香港。于是我与赵青音联系，寻找仁生的译稿。原来补遗上下二卷，上卷的上半册周仁生译，下半册由仁生的学生虞争鸣翻译，下卷周仁生亲自翻译。我打听到虞争鸣可能曾将译稿输入电脑。几经周折，终于从虞争鸣处得到译稿，于是我制成了光盘寄给刘乃光，还自以为完成得很好。

2005年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英文原版，我一对照，大吃一惊。原来虞争鸣的电脑中保存的名为补遗上下两卷译稿，实际上只是上卷的上下两半部分。也就是我作为两卷寄给乃光

的译稿，只是上卷的译稿，根本没有下卷的译稿。我再请赵青音寻找，她表示实在无力了。无奈我于2006年亲自到温州，到周仁生家中，我和赵青音二人，从仁生的遗物中，终于找到了下卷的大部分译稿，其中一部分是赵青音抄正的，大部分是仁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写在学生用的练习册上，共有二十多本。可能只有赵青音和我二人能全部认清，此时，赵青音已无力再誊抄，我将之带回上海整理。我化了一年多时间与原文对照，将之输入电脑，个别缺译的部分尽可能补译出来，最后制成光盘寄给乃光，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为了纪念周仁生同志，我勉力接过他未完的工作，仅以上述几件事的完成，以志对他的缅怀。

写于2008年8月

## 缅怀李永爵同志

革命者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互相之间虽然在一起，彼此之间常不交往。我与李永爵的关系就是这样。从1947年开始，我与他曾一起听彭述之讲课，每周一次是雷打不动的，期间有一次参加叶家花园的战后托派大聚会，我的记忆那次聚会，是借用给刘乃光和印蓉秋开结婚派对的名义。后来我把此事写进回忆文章《听彭述之讲课》，永爵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参加人家的婚礼，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错了。那次是用我与罗丽萍结婚的名义。”可是“特殊的婚礼”主角却是老头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当我与永爵再次会面时，已是1987年我从内蒙劳改单位回到上海以后。永爵比我早几年回到上海，当他与妻子罗丽萍团聚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没有子女。当我重晤李永爵

时，罗丽萍已病逝了。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独自蛰居在那里。

李永爵理论水平比我高，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排练指挥歌咏，还是居委会的文体委员，专教老头老太唱歌。画艺虽不很精，但喜欢露一手，李培和秀云结婚时，永爵画了一幅“晚晴”祝贺。

李培去世后，我和李永爵轮流去帮助郑超麟。后来永爵住所拆迁，得到的拆迁补助款全部给了罗丽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与邹秀云分住两室。秀云一再对我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从不问这些事。直到他们住到一室，我也不问一辞。我每到郑超麟家，一定要到秀云与永爵家，有时在她们家吃饭喝酒，秀云总是热情相待。

帮助郑老的工作，永爵与秀云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与外界联系方面比他做得多。郑老是少数派的领袖，李培去世后尚有少数派叶春华住在邻近，可是帮助郑老的却是两个多数派成员。

在与郑老相处的七八年中，我与永爵帮助郑老是尽心尽责的。2004年我家被强迁，我家搬到浦东，离得远，郑老也去世了，我与永爵的见面就少了，只是通电话或发 e-mail。秀云患心脏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们多次住院。后来永爵病情日益严重，到2006年经多方检查，最后确诊为前列腺癌，且已到了晚期。他的最后二年，病魔缠身，在痛苦中熬过的。

永爵自从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为革命坐过日本宪警的牢，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被共产党关押了三十多年，可说一生坎坷，历经苦难，但始终坚贞如一，无怨无悔。晚年他曾笑着说，他一生有二次关键的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永爵父亲是华侨，要他留在海外，他选择了回国。另一次是1949年，他与妻子罗丽萍身在香港，他们却选择了返回大陆。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有一批已经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国解放后却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大陆，主要是当时在香港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就业生活困难，又见到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认为返回大陆可能对革命有所作为。据我所知，有喻守一、谢山、林松祺、李永爵、罗丽萍、黄禹石、陆绩、曹惠白等人。到了1952年12月共产党在全国大肃托时全部被捕，后来判刑时，非但没有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而减轻，反而以“潜回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加重，没有一个逃脱命运。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汉劳动改造。期满后还不许回家，直到1983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许回家，但没有退休劳保，每月只给45元生活费，他们幽默地说，只够喝开水的钱。生活全靠亲友援助。即使如此，他们仍乐观地生活，常说要多活几年睁眼看看世界的变化。永爵平时写些回忆文章，十多年下来积了不少篇，亲自编成一册，书名《坎坷》，已由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

2007年他的病情加重，国外朋友知道后，纷纷寄钱给他治病。一次老李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已将过去写的除收入《坎

珂》之外的文章编成一册《夕阳红》，已交香港出版，书出版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嘱我以后代他分发。又一次打电话对我说，康溪要从国外回来，到时约我聚会。2007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嘱他到上海后先找我。我立即发 e-mail 给戈兄，请他转告康溪，戈兄回信，康兄已经动身赴大陆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后，住处没有人，康兄无法见到永爵了。

我家发生变故，家务缠身，我未及到医院看望永爵。我家2008年1月2日搬家，原有的电话停机了，宽带转移还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时去世，秀云及朋友一直联系不到我。待我知道时，追悼会都开过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后来我去看望秀云，她告诉我永爵最后病况，还对我说，康溪找到医院见到永爵了，二位战友，终于见到最后一面。

近年来，周仁生、胡振东、刘平梅、周冀瓿、姜君羊、章宏业、李永爵、康溪等相继逝世，他们都是无愧的战士。老一代的相继逝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可喜的是第四国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壮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原稿，最后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后的最后一句话：“我深信……第四国际定将胜利……前进。”录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辈。

写毕于2008年9月5日

## 根叔

——纪念王凡西同志

六十多年前，连根、意因的名字，我是很耳熟的，当中国托派发生多少数派之争的时候，理论上主要是多数派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与少数派的连根和意因争论。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意因是郑超麟。1948年前，我曾见过郑超麟，亲听他跟我谈少数派的观点。我读过不少王凡西的文章和译著，但从未见过王凡西本人。1949年初他离开大陆，最后定居英国，我也身陷囹圄几十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和王老的交往，实际上只是从1996年到2002年12月他逝世止的通讯关系。

李培去世后，我代替李培帮助郑超麟老人。得知郑老与老朋友王凡西通信原是经过香港楼子春转递的。楼老病故后，郑老试着直接与王凡西通信，结果没有受阻。于是两位老人书信不断，郑老给王老的信开始都是他亲书的“甲骨文”，连他的老朋友老王也埋怨认不出来，后来有些信郑老叫我抄正和原件

一并寄去。当时郑老对我说：“你也附上几句。”我于是在郑老致王老的信中附寄问候的短信，王老复郑老的信中，有时有他给我的短筒。我估计，这是郑老有意识的安排，使在他身后，大陆上能有人保持与王凡西联系。

郑老病危，我就开始与王凡西直接通信，向他通报郑老的病情和逝世的消息。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12月30日王凡西老同志去世，留存下他给我的亲笔信四十七封（可能有几封没有保存）。王老比我大22岁，是我的长辈，我称他“根叔”，他给我的信且称我为履锵兄或周兄。他署名“根”，“凡西”，“山”等。王凡西给我的信，我视为他对我的教导，饱含亲切的真情，也谈论了许多问题。他的信我视为珍宝，但考虑到我身后亲属不会保存，我已将之寄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保存。

现在将王老给我的信，归纳为下列诸点：

### （一）王老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我和王老虽从未谋面，但信念是一致的，心是相通的。他给我的信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期盼。这主要由于郑超麟给他的信对我的赞许。如1998年8月24日王老来信说：“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2000年1月16日来信说：“老超真有福，先后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合作者，使他晚年写出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2001

年3月27日来信说：“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我争取在大陆出版《双山回忆录》，去信请他告知他在大陆的代理人。1998年11月28日来信说：“你就是我在国内的‘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2000年11月29日来信说：“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

## （二）公理和强权

1994年12月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和史学》刊出陈独秀的一幅题词手迹，内容是“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题赠甲原先生。”我将之寄给王凡西老人，向他请教。他给我的信多封是讨论这幅题词的。后来我据此写了一篇《公理与强权——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发表在《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的《通讯》和其网页作过转载，在此不重复了。

## （三）王凡西对他本人著译的态度

我早年读过王凡西的著作，大都是政论文章，译书有《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等，我经过三十多年牢狱生活之后，才读到他的《双山回忆录》

和《毛泽东思想论稿》。听说王凡西还写过文学作品和电影剧本，但我一册也没有读过。

王凡西和郑超麟一生翻译许多马克思、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们译笔忠实流畅。王老对自己的译著是怎样评价呢？王老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超和我合译的《俄国革命史》，我译的比较偏重‘信’，而老超译文‘三义’俱全的。”

《双山回忆录》是王凡西同志1957年寂寞地蛰居澳门时写的，当时只油印了二十多册，1980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这本书供内部参考（俗称灰皮书），由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大陆党史学者广泛引用。后来香港出了增订本（黄皮书），国外有了日文、英文、德文、法文译本。可说这本书由“寂寞、寒怆”变得“热消、堂皇。”王凡西和我们想把这本书在大陆公开出版。在出版《先知三部曲》的同时，我与世文公司联系公开出版《双山回录录》，出版方同意出版，并作了申报，这就有了王老指定我为他在大陆出版事务代理人。归纳王老对出版《双山回忆录》的意见：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黄皮书）重印，不要删节，不要改动；2、出版者不要加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说明最好删去；3、楼序不要删节，不要改动。如认为不便全文发表，要删节一部分，宁可整篇删去。我将上述意见提供给出版《先知三部曲》的世文公司，他们同意了，且已上报，并得到中央编译局主审同意出版。但后来告知，上头没有批准。争取公开出版没有成功。

王凡西对其本人的著作，自认为有价值的是《毛泽东思想论稿》，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自己写的书，觉得无甚价值（郑楼二兄曾批评我这个态度）。其中祇有《毛论》比较有创见和新意。希望我生前或身后能有重印机会，留下一点影响。”

王老晚年，自称已无精神写大部头或长篇的文章，但头脑还好使，对世上不断发生的事，总有所思，从1989年2月起直到1995年3月止，以写日记的方式，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版。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他希望能出版：《双山回忆录》《毛泽东思想论稿》《晚年札记》。王凡西同志的上述愿望，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大都不是我的作为。

关于《双山回忆录》，我曾与世文公司联系，争取在大陆公开出版，但最终没有成功。可是2004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而且是照香港版的黄皮书一字不差地重印，连王老担心无法发表的楼序也全文照排。可说完全符合王老的三个愿望。这主要归功于朱正先生将香港版的黄皮书提交给东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秀平先生。

东方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出版内部书刊时用东方出版社的牌子。据一位人民出版社的人士说，用“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反而好销，能赚钱。《双山回忆录》

出书后听说销路很好，坊间很快出现廉价的盗版书。现在的盗版是不用重新排版的，与正版的一字不差。估计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了。这可是有心植树树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封面呈黑色，俗称黑皮书，王老的《双山回忆录》有了四个版本：原始油印本，北京灰皮书，香港黄皮书，北京黑皮书。此外还有日、英、法、德多种外文译本。

王老期望我替他出版《毛泽东思想论稿》，我实在无能为力了。但是香港和台湾的朋友，集资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论稿》，印刷甚好，王老的愿望实现了。美中不足是不能在大陆公开销售。大陆还未发现盗版本。估计此书的出版少人知晓。

至于王老寄予我的第三个愿望，要我整理他的《晚年札记》。2000年1月16—21日来信说：“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将遗下的稿，才又想起这批札记，…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将来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出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乱稿还能与某些读者见面。”

我一直盼望王老能将《札记》原稿寄来。2002年12月30日王老在英国里兹逝世。我因始终没有收到《札记》稿子，去信向英国班顿询问。班顿复信告诉我王老的《晚年札记》稿子已经交给香港朋友了。既已有了着落，我就不过问此事了。

2003年8月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林致良先生寄来王老的《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和电脑打字件，嘱我校对。王老写的字，自称“蝌蚪文”，其中还有几件郑老给他的信，那是“甲骨文”，打字的年青朋友确难认清。我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如果在王老生前得到原稿，我会给以整理和删节，然后寄给王老亲自审定，现在王老已经去世了，我就不能自作主张删节，所以基本上照原稿。只对其中一些有关尚在世的人员的交往记述，怕对其有所影响，暂时隐去。香港朋友根据我的校对，出版单行纪念本。我得到后又复印了数十册分寄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与朱正先生联系，将《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香港出的纪念本，以及王老给我的有关信的复印件寄去。朱正先生收到后给我来信说：“王老将他的《札记》托付给我你二人了，我当尽力。”他还谈到目前单独出版有困维，因为要审批，几乎是不可能批准的。如果早些日子得到此稿，将之作为《双山回忆录》的附录，到能够出版。现在只能待再版了。

王老的愿望已经基本完成，以此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 （四）多少数派问题和王老给我的最后来信

1952年12月22日，共产党把大陆所有的托派一网打尽，全部投入监狱。共产党就不管你是多数派或少数派了，都污称为“托匪”。当权者都对我们“一视同仁。”我们之间无形中就没有多少之争了。1979年获释后，年迈身残的郑超麟依靠

原少数派的李培的帮助继续战斗。李培去世后，郑超麟不依靠原少数派的青年叶春华和郑良，反而依靠原多数派的李永爵和周履锵。可见多少数派的隔阂已烟散了。

我晚年与郑超麟的亲密接触中，郑老从来不与我谈及彭述之，连他那册批评彭的《谎言与真实》也不主动让我看。后来我与王凡西的通信中，发现王老晚年几乎与郑老持相同的态度。如2000年9月24日王老寄我一批资料，包括揭批越共和胡志明反托的罪行，也寄来批评陈碧兰的《不得已的答复》，王老一再嘱咐，《不得已的答复》“除少数老友外，请勿示人。”总之我发现，郑王俩老都承认彭述之是坚定的革命家。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我们托派内部的争论，不愿告诉外人。

2002年10月7日，距王老2002年12月30日逝世仅差二个多月，王老给我寄来一信。信很短，全文录下：

履锵老弟：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还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2002年10月7日

此信 10 月 19 日收到，我随即给他回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复信。年底，传来王老逝世的恶耗。所以这封短信是他给我的最后的信。我无法知道，王老写完此信后，有否再动笔写下其他的文字，我看到的王老遗嘱，也是口述丰丰代笔的。所以也有可能这封信是王老的绝笔。

以前的来信都称我履锵兄或周兄，只有这一封改称我履锵老弟，我倍感亲切。随信附来的他认为值得保存的特寄给我和其他朋友看看的信，是 1981 年王老和曼台尔的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王老重病中从他堆积如山的信件中，艰难地找出来，可见老人对托派组织的分裂的担忧和对统一的期盼。

## 缅怀王凡西同志

——谈王凡西同志二十多年前的建议

王凡西同志逝世二周年了，我翻出王老生前给我的信，读到 2002 年 10 月 7 日他写的一封信写道：

履锵老弟：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2002 年 10 月 7 日

此信只有三句话,11月13日我给王老复信,没有收到回信。2002年12月30日王凡西同志逝世,这封短信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二信,一封是1981年2月25日曼台尔致连根(王凡西)的信,另一封是1981年3月6日连根致曼台尔的信。

王老在去世前二个多月,已是病魔缠身“有气无力”。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特地从堆积如“山”的旧信堆中翻出二十一年前他与曼台尔的二封信,寄给我,并嘱咐我给其他朋友看看。王老对此二信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了。我以为这二封中所述的,就是王凡西老同志对我们的嘱托,可算是他的政治遗嘱。

曼台尔给连根的信说:“你是否应该发挥其影响,以便和香港的年青同志以及和彭的一派统一起来?……这些分裂乃是阻止我们前进的一个巨大障碍”。连根给曼台尔的信叙述了从哈佛图书馆最近得到托洛次基于1929年至1939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将之译成中文寄香港发表,并写了短序。王老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次基所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又说:“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现在距此二信写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我因身陷囹圄三十多年，现在又闭目塞听，对香港组织的现况一无所知。但从王老特地艰难地翻出二十一年前的旧信，寄给我和其他朋友看看，推测王老当年的建议和愿望没有得到实现。

我早年是彭述之多数派的成员，1987年离开劳改单位回到上海后，长期与郑超麟同志相处，帮助他做些抄写等事务性工作，后来又与王凡西同志通讯达五年之久。深深体会到，郑王俩老没有因我原是多数派，而有所隔膜。我发觉郑老对我的信任，远超过住在附近的原来少数派的几位同志。王凡西来信中，多次哀叹无法得到我的帮助，并称：“你是我目前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我晚年与少数派几位领袖相处中体会到，虽然他们与彭述之的当年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例如还写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始终认为彭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极力反对将他们之间的争论公之于众。例如郑超麟一再反对把批判彭述之的小册子《谎言与真实》公开发送。唐宝林从香港的书目中知有《谎言与真实》一书，误以为是批评他的文集，写信向郑王俩老索讨此书，后来王老寄了一本给郑老，写信嘱我寄给唐宝林，但郑老扣下不让寄，只写信告诉唐宝林，说明此书与他无关。又郑超麟出版三卷本《晚年文选》，编目是他亲自编定的，《谎言与真实》没有收入，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收入，郑老说：“这是我们家内的事，不要公开”。王老也是取同样态度的。2000年9月24日，他寄给我《不得已的答复》时，嘱咐：“除少

数老友外，请勿示人”。由上举的例子，可知郑王俩老，都是反对将他们批彭的文章向外扩散的。

郑王俩老对彭的回忆录有所批评，认为有自夸之处，我倒认为，无论何人写的回忆文章，难免有可挑剔的地方，今天我们完全不必对之苛求。毕竟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王凡西和曼台尔二十四年前提出的建议，希望香港几个托派小组织统一起来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人微言轻，且不了解情况，对此不敢妄发意见。我只是将王老临终前寄来的希望给朋友们看看的二封信，连同此小文发给同志们，如果能从这二信中有所思考，就是对王老的最好缅怀了。

周履锵于 2004 年 12 月 30 日

注：（此文不要发表或上网）

## 悼念赵青音大姐

周仁生同志 2004 年 1 月 23 日逝世，他的夫人赵青音同志也于 2008 年 12 月 2 日逝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赵青音同志是西施故里诸暨人，她的心灵之美是赛西施的。

青音自幼丧父，她的母亲艰难地把她和一个妹妹抚养长大。她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干部，生活优越，但对丈母娘并不好。仁生回温州后，把青音的母亲接到温州赡养。我再次见到青音时，仁生的父亲已去世，青音侍奉婆婆和母亲两位老太太。后来仁生和青音都亲自给两位老人送终。

七十多年前，我和仁生就相识。那时我和他都是温州瓯江小学的学生，不过他比我高五年。六十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绍兴诸暨等地被日本占领，许多学生开始流亡，当时政府为收容这些学生，办了一些临时中学。在瑞安龙川一个小山沟里的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就是其中之一。赵青音和我都是那所学

校的学生，她比我大几岁，我们曾在豆灯下情同姐弟似的共读。周仁生在这所学校任英文教师，我们受仁生的影响，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到了上海，1947年周仁生和赵青音结婚，我和赵青音都参加托派多数派的SY组织，成为理论水平很低、工作能力不强的托派。1949年底，周仁生、赵青音、我及我的妻子钱慧初，都在福建海澄中学任教，共同生活三年。到了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大逮捕，我们同时被捕判刑。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我获刑七年，赵青音五年，后来周仁生被押到上海，与郑超麟、尹宽、喻守一等关在提篮桥监狱，我被押到内蒙古劳动改造，赵青音在福州劳动改造，从此我们天南地北，彼此音讯全无。

在福建被捕时，周仁生和赵青音的儿子仅二岁，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由一位好心的妇女领养。1956年赵青音提前释放。她当然知道周仁生被判了无期徒刑之后，今生的团聚是没有希望的。只要她与周仁生离婚划清界线，还能重返学校教书，否则就是无着落的活守寡。赵青音毅然选择了后者。她从福州去海澄，找到儿子，母子二人经过千辛万苦，到了温州周仁生的老家，从此与公婆生活在一起，代替周仁生孝敬父母，抚育幼子。加上工作无着落，其艰难就不必说了。最使她难受的还要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后来被安排到街道办的集体合作单位画帘社当临时工，有很微薄的工资。

1966年之前，虽受到歧视，生活还算正常。文革开始后，

处境就困难了，成为被专政的四类分子，开始是在单位受批斗，后来居民开批斗会，赵青音被拉出来批斗。使她最伤心的，有几次把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拉出来陪斗。好心的同情者大有人在，但他们不敢出声，只能投来同情的眼神。而一些品行恶劣的邻里，借机欺侮她们，霸占她的房屋物品。赵青音所受的苦楚，笔墨是写不尽的。然而赵青音始终默默地忍受着，她内心的信念不变，坚信仁生是对的，她宁可牺牲一生幸福，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1972年9月，周仁生等仍被关押在狱中的12人获释放，仍在青东农场受管制，但可接待家属，赵青音曾领着婆婆，带着儿子到农场与仁生短暂团聚。1979年7月仁生恢复公民权，回到温州老家，虽然一家挤居在破旧的老屋里，但总算全家团圆了。

我流落在内蒙古荒原三十多年后，到了温州，再次见到赵青音的情景，在脑际始终抹不去。那时仁生已经回到温州。青音躺在小天井一间小偏屋（可能是旧灶间）的破床上，因为她的恶邻居欺侮她，手臂被打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青音是一位很坚强的人，我从未见她流泪。那次她见到我，突然泪涌出来。这是受到冤屈遇到亲人时的真情流露。

周仁生回到温州后，当然不能再跟人谈托派思想，但他以另一种形象呈现其人品，除了从事翻译外，同时办温州独一无二的义务英语培训班。大陆改革开放后，学外语之风盛行，各

种收费的英语班像雨后春笋涌现,不少英语教师因此发了大财,可周仁生的英语班是公认水平最高的,开始不收费,后来才少量收费。他是以高超的学识和品行树立形象,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仁生回家后,赵青音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她成了周仁生译著的第一位读者,又是文稿的校对和整理者。他的所有文稿都是赵青音娟秀的字体抄清的。经她手的光大部头的书有《先知三部曲》、《彭述之回忆录》、《托洛茨基文集》补篇上下卷等,总数超过数百万字。她是默默地、无声地作出她的贡献。

最近上海吴基民先生出版一册《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书中有一篇谈温州托派的几个人的遭遇。谈到曾猛的妻子秋君,王国龙的妻子刘曼庄,周仁生的妻子赵青音和周履镛的妻子钱慧初,认为可以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夫人相比。当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夫人放弃舒适的贵族生活,追随丈夫到流放地一起过苦难的生活。其实赵青音等人具有对丈夫无限忠诚的品德之外,还多一层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周仁生去世后,赵青音与常人不同,除了悲痛之外,不断地自责,多次对人说到,她没有照顾好仁生的生活,未能使他多活几年,为理想再做出贡献。这几年她郁郁地生活,反复自责,还不断地说牵累儿子的成长深感不安。她在耄耋之年去世,可说是高龄寿终,但我们仍为痛失这位好同志而伤心。

亲爱的大姐，你虽然没有见到革命的成功，但你播下的种子总会开花结果的。

## 悼父母

父亲周彦和，1907年5月12日（四月初一）生，1987年1月3日（十二月初四）亡；

母亲徐静梅1908年3月7日（二月初五）生，1997年2月13日（正月初七）亡。二人都出生于温州城内，也亡于温州城内。

温州是一个商贸城市，我家世代经商。我不知道曾祖辈之前是作何生意，只知道祖父辈兄弟三人，却在温州城开了三家钱庄，属于颇有经济实力的商贾。我的祖父在我出生前去世了，事业由我父亲继承。由于经营不佳，后来钱庄倒闭了。二房钱庄一直开到抗日战争时期，三房的钱庄到解放后才关闭。父亲没有置办房地产，只有流动资本，后来做过多种经营，经济起落不定。但总的说来，全家过着中等的生活水平。解放后成份定为工商业者，可既无工业也无店铺。到了老年，始终没有劳

动保障。

母亲的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并开一间中药铺。母亲不识字，我不知道她在娘家叫什么名字。（好像叫 meichai，不知是那两个字）她与我父亲结婚后，就用“少奶奶”等称呼了。自从育了我以后，我的名字就成为她的名字了。左邻右舍及亲友，都叫她“履锵妈”了。至于后来用的姓名“徐静梅”，似是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时父亲给她临时起的，连她自己也不一定认可，也不被亲友所知。母亲只知育儿持家，为人随和，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

我的父母 1949 年后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们含辛茹苦供我和弟弟上大学，可是后来给他们带来不尽的苦难，我因参加托派而身陷囹圄，丝毫没有尽到为子赡养父母的责任。弟弟大学快毕业时，却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也对家庭无所帮助，父母只能艰苦地渡生。直到后来，我和弟弟的情况稍有好转，父母才过上稍为安定的生活。

父母一生平庸地生活，平庸地逝去，现在就平庸地安息吧！

写于 2008 年

## 悼弟弟

父母育我和胞弟履煊二人，无女，姑母的幼女过继来后取名周欣。二叔二婶育成履铭、周蝶、履峰三人，她实际上生育五胎，履铭之前有姐弟二人。第一胎小妹生下后数日就夭折，可能还未取名。第二胎弟弟，取名履淦，约一岁半死亡。现在想来，早年生育请接生婆来家接生，脐剪不洁，小妹可能死于破伤风；小弟是死于肺炎的。如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都不会早亡。

按族谱，我辈为“履”字辈，所以我们诸兄弟取名履锵、履煊、履淦、履铭、履峰。五人中数我老大，如今我将年届耄耋，可是比我年轻的弟弟，都先我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小弟履淦早亡，在我的脑际，只留有一个活泼可爱婴孩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叔二婶迁到上海，弟妹履铭、周蝶、履峰到上海小学读书。1947年我也到上海入大学读书。我因参加反蒋学生运动，1949年4月26日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在旧法租界巡捕房，当时是达人中学校舍，不许亲人接见，只许送物品。一天，叔婶领着弟妹三人，给我送食品。我们三百多名大学生，被分关在教室内，大小便须排队到楼下的厕所，经过院子时从铁栅门外是能看见的。那次我上厕时，突听门外喊：大哥！大哥！我转身一看，履铭、周蝶、履峰扒在铁栅门叫喊。此情此景，我永世难忘。后来我南下福建，1952年肃托时我身陷囹圄，在边塞内蒙古劳动三十多年，待回到上海时，得知小弟履峰已去世了。原来履峰身体甚好，念书时正值空军招收学员，他体检合格，政审被涮下来了。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国家计划委员会城市设计院工作。那年头正是因“人祸”而饥饿的年代，粮食不够瓜菜代，冬天北方各单位都窖藏土豆白菜，履峰单位挖窖时塌方，正在挖土的履峰被埋身亡。二婶因幼子刚参加工作于1961年11月5日意外身亡，身心受打击甚大。

胞弟履煊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前，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毕业后被派送到北方煤矿劳动，经常下井。处在那种环境下，只能借酒消愁，而当时喝的都是劣质烈性白酒，因此肝脏受到损伤。右派平反后，回到家乡温州工作。不久终因肝疾转成肝癌，于1987年2月2日年仅53岁就抛下老母妻女，英

年逝世。

2004年10月29日，弟弟履铭，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履铭忠厚老实，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考入全国闻名的上海中学。高中毕业高考只被一所不是特别有名的大学录取，他心有不甘，在家自习一年，第二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大学本科四年毕业，但清华的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六年，相当于读完研究生的时间。毕业后服从党的号召，到了大西北。那年头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履铭虽分配到中科院西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头几年并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下放劳动，下乡参加四清，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但他在困难的情况下，仍与几位同志一起，从事研究，终于在一项课题，取得优异成绩，并得到奖项。

文革结束后，高教事业复兴，履铭调到杭州浙江工学院（现名浙江工业大学）任教，从此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带研究生。1998年退休后，还发挥余热，1999年受聘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副主任，为之做了几年开创性工作，2003年3月受聘在浙江高教自动化研究所从事开发教学软件。正当还能再工作十多年的时候，就病逝了。英才难得，他的逝世，对社会是一损失。

纵观履铭的一生，他的工作和成就，自有他的单位和师生评说，我从我们家庭的角度来说，他孝敬父母长辈，尊重兄长，爱护弟妹，慈育下辈，他一生勤奋工作，忠诚宽厚待人。总之，

履铭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美德。

我一生坎坷，遗憾未能日常侍奉父母叔婶，父母临终我亲自送行，二婶病危时侍奉数日，生死是自然规律，晚辈送别长辈是正常的，而比我年轻的弟弟四人，相继先我逝世，悲情难掩。

履锵写于 2004，10，31

附录：履铭追悼会上工作单位的悼词摘抄：

周履铭同志近四十年一直奋斗在科技和教育

工作第一线，治学态度严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承担的多项科研项目曾先后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航空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国防工业办重大改进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1983年调入浙江工业大学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研发项目，并先后获船舶总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全国计算机应用项目二等奖等奖项。

# 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记慧初病故前后

1981年2月3日（阴历除夕前一天）开始，慧初病情转危，已不能进食，依靠药物和补液维持了十天。2月13日晚由我一人陪护，吃过晚饭不久，慧初对我说：“心跳很快”，我测了她的心跳次数，每分钟一百四十多次。我马上去请值班医师。医师诊断后，立即抢救。由于病情恶化，我打电话叫大烨赶快到医院来。他们到了后，医师对我们说：“病情很严重，有可能今夜就过不去”。经医师积极抢救，终于渡过了一夜。

14日上午，我叫大烨通知学校，中午学校的领导人来了，后来相继来了许多师生。慧初的神志不清，对来人已不能清楚辨认。

下午，慧初高烧达40度以上，神志异常。当时正给她输液，她手脚乱动，无法自控，只能由我和大烨按住她的手臂。慧初吵闹着要坐起来，多次用微弱的声音叫我：“你抱抱我，你抱

我坐起来”。后来我抱她起来，她靠在我的怀中，就安静下来。为了使她卧下，我装做很吃力气喘的样子，对她说：“你看，我已经吃不消了”。她见我气喘，点点头，让我把她静卧下来。

14日晚我和大焯、君娣陪伴慧初，她的亲妹妹慧才和她的内侄媳汝瑛也在医院，这一夜我们五人始终伴随在慧初的病榻前。午夜后，危象频频出现，慧初呻吟了约半个小时，眼眶饱含着泪水，过后气息微弱了。医师的听诊器始终按在她胸部，医师最后听诊确实，告诉我们，病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看表，是15日凌晨4时03分。我们忍着心中的悲痛，替慧初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内衣。“质本洁来还洁去”。慧初心脏停止跳动后很快就瞑目，我托住她的下颚，让她张着的嘴闭上。慧初全身衰竭，非常消瘦，但脸部仍显得很安详。

15日上午9时许，我和大焯、君娣将慧初的遗体送上去龙华火葬场的灵车。我们含泪饮泣目送灵车离去。

19日下午3时30分在龙华火葬场中六厅开追悼会，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亲友二百多人参加。学校领导致悼词，对慧初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给予很高的评价，学生代表发表了发自肺腑的沉痛讲话。大家向遗体告别。

“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2月23日，我和大焯去龙华，取回慧初的骨灰盒。新分到的房子慧初仅住了一个月，现在让她的骨灰安放在房中。

1981年5月25日慧初逝世百日纪念

## 解连环

——悼亡

昔时遗照，  
睹容颜如旧，  
芳魂永杳。  
记年时邂逅校园，  
却惊长裙短袖风华茂。  
一见倾心，  
何须倩冰人月老。  
但两心同誓，  
不畏艰辛，  
共抒怀抱。  
果真世途险恶，  
念狂风屡起，  
比翼分飞：

更十载艰辛抚幼。  
纵破镜终圆，  
离多聚少。  
一纪星沉，  
空想像音容缥缈。  
问可有来生践约，  
相逢仙岛。

今天是阴历正月十一，慧初逝世十八周年了。我不会诗词，仿填前贤词以寄托哀思。

1999年2月26日

## 悼亡妻慧初

慧初啊！你离开我整整十九年了。这些年来，我随时随刻都沉缅于深深的怀念之中。我曾独自徘徊于我们同窗共读的武进路师专旧址，游荡在我们相依谈心的虹口公园的草坪之上，还去寻觅反动派关押我们的场所。往昔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脑际再现。

我们由认识，相爱，及至你冲破阻力，随我南下结为夫妻。婚后三年，我身陷囹圄，你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下，政治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承担起抚育孩子的重担。当时你期望我服役期满后能得团聚，可残酷的现实使你的期望落空，得来的只是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的短暂相会。随后无休止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你身心备受摧残。这一切都是受我牵连，可你无半丝怨言，从不反悔与我的结合。你坚信我是革命的，我的信念是对的。你随时鼓励我，支持我。你爱我，父母爱我，晚

辈也爱我。可是只有你最了解我，我失去了你，失去了一位最了解我，无限爱我，为我不惜牺牲一切的人。

在我的心中，你是一位最完美，最纯洁，最伟大的女性。

当年我们从福建回沪，你怀抱未满周岁的幼子，我提很简单的行李，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家档。经过你三十多年的含辛茹苦的努力，把孩子抚养成人，操办完孩子的婚事仅月余，你就撒手人寰。你走后一年出生的孙女，如今已是脸型有几分与你酷似的大姑娘，三年后出生的孙子，也长得跟我一样高了。你如能活到现在，我们举案齐眉，儿孙绕膝，该多好啊！

你是1981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十一逝世的，公历与阴历日期每年是变动的，所以每年有二次你的忌辰。而今年2月15日与正月十一是同一天，如此重合是少有的。

我你有共同的信仰，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不相信来世。在你遗像前点几柱香，放一束鲜花，上坟时纸灰飞扬随风而去。这一切不过是寄托哀思，诚是“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我们生前聚少离多，待我就火，残灰也许能长眠同穴。但死后之有知无知，得见不得见也卒难明。无限之憾，呜呼哀哉！

2000年2月15日，庚辰年正月十一，慧初逝世十九周年，书此以寄哀思。

## 江城子

——悼亡

廿年生死两茫茫！常思念，自难忘。携孙登山，  
千里扫墓坟。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幻梦犹依稀，叙同窗，忆共枕。待我辞世，  
残灰葬同穴。来生得聚不得聚，卒难明，不思量。

1981年2月15日（正月十五）慧初去世，当时我思忖，过不了几年，我将随慧初同赴黄泉。孰料到1991年。我仍活在人世，当时抄录苏轼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志怀念。悠忽又过了十年，2001年1月24日（正月初一），携慧初去世后出生的孙女周丁慧、孙周丁力，登翠薇山，祭扫慧初墓。我已年迈，由孙辈搀扶上山。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亲自扫墓了。我吩咐孙辈，待我死后骨灰与他们的奶奶合葬。

袁枚祭妹文写道：“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我何

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的有知无知，又卒难明也。”前人能作此感叹，唯物主义者本不相信天堂地狱。企望死后团聚，无非是空幻的愿望而已，骨灰合葬或洒海，又有何区别呢？

1947年在上海求学时结识慧初，后成为患难夫妻。在校明窗共读，1949年4月26日同被国民党逮捕，投入铁窗牢室：1952年冬至日，又分别在沪、闽陷入囹圄。不论明窗或铁窗，已是三度同窗了。在最艰难的岁月，慧初始终无怨无悔，乐观豁达，忍辱将儿子抚养成人。在条件稍有好转时，就撒手人寰，未能见到二十年的巨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过去泼在我们身上的污水，逐渐被洗刷了，仅以此告慰亡灵。

2001年1月25日

## 卅年祭

妻慧初，八一年，辞人世，生死别，常思念，三十载。  
忆往昔，同窗读，参学运，反老蒋，遭迫害，共铁窗。  
下闽南，结连理，育幼儿，执教鞭，播思想，植桃李。  
五二年，大肃托，同被捕，陷囹圄，明铁窗，三度共。  
我塞外，尔独守，信念坚，志不移，抚儿长，嗜艰辛。  
曾指望，我刑满，回家转，我到期，强留场，愿落空。  
文革中，受批斗，伤身心，得錮疾，儿成家，尔谢世。  
零七年，儿大焯，拆迁害，英年逝，母子聚，碧云天。  
我年迈，将就火，吾死后，葬同穴，能聚否？卒难明。  
我无才，笔笨拙，书三经，不成律，略表示，缅怀情。

钱慧初，1929年4月14日出生于上海青浦，1981年2月15日（正月十一）在上海逝世。

1981年我还是内蒙古劳改农场的留场就业人员，是场办中学的代课教员，正值长寒假，我得到“恩准”回家探亲。慧初住院的二个多月，我日夕陪护，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不能再手术了，她也自知不治。临终前一天，她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几句使我心酸的话，她说：“我死在你身旁是幸福的”。又说：“你太辛苦了，你要保重”。三十年了，这几句深情的话，始终在我脑际迴绕。慧初去世后，我心灰意冷，思忖不会活多久。熟料过了十年，我仍活着，二十年还活着，当时我写了《廿年生死两茫茫》，以誌纪念。料想不到我又多活了十年，于是写了如上几句。我还能再活十年吗？那时就会是《香销玉沉四十年》了。

我的前三十五年前，被困在劳改队，一个老朋友都没有，外界信息也不知晓，对革命毫无贡献。1987年我六十岁，被视为年老无用了，放我回家。1987年我回到上海后，逐渐找到了老朋友，晚年还多多少少做了一些工作。盘点后二十多年的作为，似比前三十五年较好。曾帮助年迈志坚的郑超麟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见拙著《意因同志》和《隔海书简》；郑老去世后，与旅居海外的王凡西书信联系，见《悼根叔》；周仁生从事的翻译工作，我也从旁给以辅助，如找资料、抄写、校对等。仁生去世后，我续成了他已完成十分之八九的译著《彭述之回忆录》《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下卷》，并将之校对打字出来。去年，还与吴孟明、林致良合作，把陈独秀托派时期发表在托

派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从已很难辨认的残存油印刊物中整理出来编成《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总之，生活得比过去充实了。今后还能干些什么？总得不枉活下去。

周履锵写于 2011 年 2 月  
(《陈独秀晚年著作选》已于 2012 年 12 月由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出版)

## 悼亡儿

我的独子周大焯，1951年7月22日(六月十九)出生于厦门，2007年5月10日(三月廿四)逝世于上海。2006年，我年届八十，当时写下遗嘱，指定大焯于我死后，将我的骨灰送到温州和他的母亲合葬。不意大焯反而先我去世，现在由我写此悼文了。

1952年夏，我和妻钱慧初携未满周岁的儿子大焯返回上海，钱慧初留在上海新群中学任教，我再去福建，当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和慧初在福建上海二地同时被捕。第二年慧初获释，先在市二女中，后调五十九中学任教。我在人间消失了三、四年后，他们才得知我在内蒙古劳改，从此慧初和儿子大焯相依为命，慧初忍辱负重，独自承担起抚育儿子的重任。后来慧初得知我判刑七年，他们期盼我期满后回家团聚。1979年12月22日，我服刑期满释放，但被强迫留场就业，不许回家，

当年也不准请假探亲。无奈，慧初在1961年1月携大焯去内蒙古看我。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要在南京下关过渡，然后转乘三次火车，路上走了六、七天，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孟姜女千里寻夫。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离平齐铁路江桥车站约四十里，他们动身时给我发了电报，江桥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站，晚上连照明都没有。我到车站接他们，一连二天都没有接到，第三天晚上，火车到了，在漆黑的站台远处，我听到慧初和大焯说话的声音，我马上奔过去，终于接到了分别已八、九年的母子二人。当时慧初对我说：大焯很懂事，路上还会照顾她。

我所在的劳改农场办有员工子弟学校，正缺师资，知道我妻钱慧初是中学老师，动员我把她接到内蒙，所以那几天的生活安排得不错。那个寒假是父子分别八、九年后的首次团聚。

1962年1月我回上海探亲，1963年7月，慧初又携大焯到内蒙探亲。那时我已被调到学校当代课教员，他们这个暑期就住在校内。大焯那时小学五年级，整个暑假与我的学生在一处，有时去钓鱼，一次钓来一面盆的鱼。

大焯聪颖，从小与妈妈住在校内。妈妈是物理教师，大焯爱好电子，从装矿石收音机、一管机开始，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独立装六管收音机了。大焯好钻研，也好将整机拆卸，这样却练就了一身手艺。

文革时大焯读初三，后来到皖北插队，1976年5月才返回上海。为照顾患病的妈妈，没有继续去读书。在工厂当一名

普通工人。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VCD、DVD、摄像机、数码机。大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可凭他的刻苦钻研，在修理电子产品方面，都能跟上每次的产品换代。近年来电脑和网络普及，他完全由自学而入门。在电子修理方面，大焯几乎无所不能。单位的有些人，叫他“周工”，其实他既无学历，也无职称，本人也无意冒充，只是因为单位里有些技术问题，正式的工程师无法解决的难题，大焯能解决。

2002年我家居住的北京西路进行旧区改造，当时动迁布告写明是建商品住宅，部份居民天真地想，既然是商品住宅，当然是出售的，于是要求回搬，愿意拆一还一，超过部分花钱购买，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想不到上海官方与开发商早有一律不许回搬的密约，不少居民被迫走上抗争道路。大焯也为维护权益，用过去钻研技术的心思，买了许多司法的书籍，认真钻研，居然达到粗通的程度。他联合沈婷等人，将开发商周正毅告上法庭，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他们没有想到，我国目前司法名为政治服务，实为腐败服务，为权贵服务的，结果是每场官司必输，虽然如此，大焯仍依法抗争，并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从有关部门取得大量资料，证实周正毅的非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的上海东八块拆迁事件。详细情况，沈婷著的《谁引爆周正毅案》有了记述。实际上当

局最怕老百姓依法抗争，于是执法者非法镇压守法者。从那时起，大烨和我们全家受到与奸商周正毅相勾结的当局的打压，周大烨夫妻二人被拘留三次，房屋被强迁，大烨身心受到损伤。

2007年1月14日夜又遭抄家，并被拘留，因此诱发了他的胆和胰腺病突发，于2007年3月5日发病，5月10日身亡。从医学上讲，大烨是死于急性胰腺炎，其实是因动迁受迫害而死。大烨去世后，外界反映强烈，网上也有“周大烨被迫害致死”的文章，那些日子当局很紧张，不断找君娣商谈，有些人劝她停尸抗争，我们全家商量后，考虑到上有俩位老人，下有未成家的小孩，忍痛接受了调解。

我的弟弟没有儿子，大烨是我祖父以下唯一的孙儿，是我们家庭的主梁，大烨的去世给全家带来极大的困难。孙儿女虽已成年就业，但未成家，尚不会理家，我已年迈无力，家庭的重担都落到儿媳君娣的身上。现在她强忍悲痛支撑这个破碎的家。

2007年6月



## 自撰简要年谱

- 1927年旧历4月19日(阳历5月19日)

出生于永嘉城区(现温州市鹿城区)金锁匙巷三号。上辈世代经商(温州话称生意人)。

- 1934年8月——1939年7月

温州瓯江小学(现广场路小学)1—5年级学生。我入学读一年级时,周仁生是该校六年级学生,比他年长的我的姑母周蕙芳和他同班,常带我去他家,因此我从小就认识周仁生。

- 1939年8月——1940年7月

温州康乐小学(现瓦市巷小学)6年级学生。毕业。

- 1940年8月——1943年7月

永嘉中学初中学生。毕业。  
从初二开始,读了《大众哲学》等通俗读本。初步知道有唯物论和唯心论,做人应有革命人生态观。

· 1943年8月——1947年1月

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和温州中学高中学生。高中阶段三年半，中间日军占温时停学半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临中停办，并入温州中学。

1947年1月温高毕业。

周仁生曾在三临中教英语。他与我开始有师生交往。

· 1947年1月——1947年7月

在上海准备考大学。再次遇周仁生，他用托派思想影响我，带我去参加哲学班。听了彭述之讲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思想等课程。

我接受了托派思想。于1947年6、7月间经周仁生介绍，参加了中国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我和沈云芳（周仁生表弟），阿陶（女，立信学生）三人一个支部。

· 1947年8月

我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该校是战后上海新创办的培养中学师资的学校。学费和吃饭都是免费的，学生大都是贫寒子弟，校内民主空气较浓。

· 1947年8月——1949年7月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学生。

同时入师专的有温籍学生十多人，其中有两人是在温州参加SY的，于是我离开原来的支部，与温州来的二人组成SY师专支部，选我为支部负责人。在校期间，SY支部成员及同情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争民主、反内战学生运动。

1949年4月26日，上海国民党政府逮捕大专学生，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全市共逮捕352人，师专被捕15人，托派SY周履镛、周仪及同情者钱慧初三人被捕。（详情见1996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的《黎明前的斗争》，被捕学生名单见1949年4月27日上海《大公报》）。

· 1949年8月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停办，并入南京大学。师专学制三年，其中二年上课，一年实习，我已进入实习阶段，也可到南京大学继续学习，我办了南京大学休学证，但以后没有去入学。

· 1949年10月（或11月？）

共产党取缔托派活动，托派多数派江浙临委成员被捕，我不是临委成员，也碰巧被捕。被警告今后不许再活动。被捕者大都第二天释放，只有二人关了十多天释放。此后上海托派组织不存在，我再没有与托派发生组织关系。

· 1949年12月——1952年12月

福建海澄中学教员。

海澄中学校长是周仁生，当时他的姓名用谐音周任辛。

· 1952年12月22日——1959年12月21日

在押犯人。

因是中国托派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SY 成员，被判刑七年。

其间在福建狱中关押了两年多，1955 年 4 月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先从事修筑集二铁路、包兰铁路的路基土方工程。1957 年底调保安沼劳改农场，在犯人技术室从事水利工程设计。

· 1959 年 12 月 21 日——1987 年 7 月 20 日

劳改单位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

1959 年 12 月 21 日刑满释放，但不能回家，强迫留场就业，每月 18 元工资。隔二、三年有一次探亲假回家与亲人短暂团聚。

因为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尚有可利用之处，在留场就业的 28 年内，基本从事脑力劳动。第一年继续做水利工程设计，后来调到中学当代课教员，教数理化。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逐出学校，到场办造纸厂做机械设计。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了，又调回学校，专教高中数学。经济待遇有所改善，口头上也被称为“老师”，实际刑满就业人员的身份不变。

· 1987年7月20日

年满60岁了，申请退休，得到批准。退休时正赶上全国教师评职称，我被授以中学数学高级教师职称。

· 1988年10月6日

回上海落户定居。

晚年曾帮助郑超麟做文稿抄写等事务性工作。联系出版了《先知三部曲》。整理周仁生翻译的遗稿《彭述之回忆录》，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整理周仁生和虞争鸣合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留待和文集一起出版。与林致良、吴孟明合编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承王观泉之托辑录法国巴黎《救国时报》污蔑中国托派和陈独秀为汉奸的资料，编成《立此存照》，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

· 20 □□年□月□日

死了。结束了曾与世隔绝了 35 年之后，又过完了无所作为的一生。

2014 年 10 月

